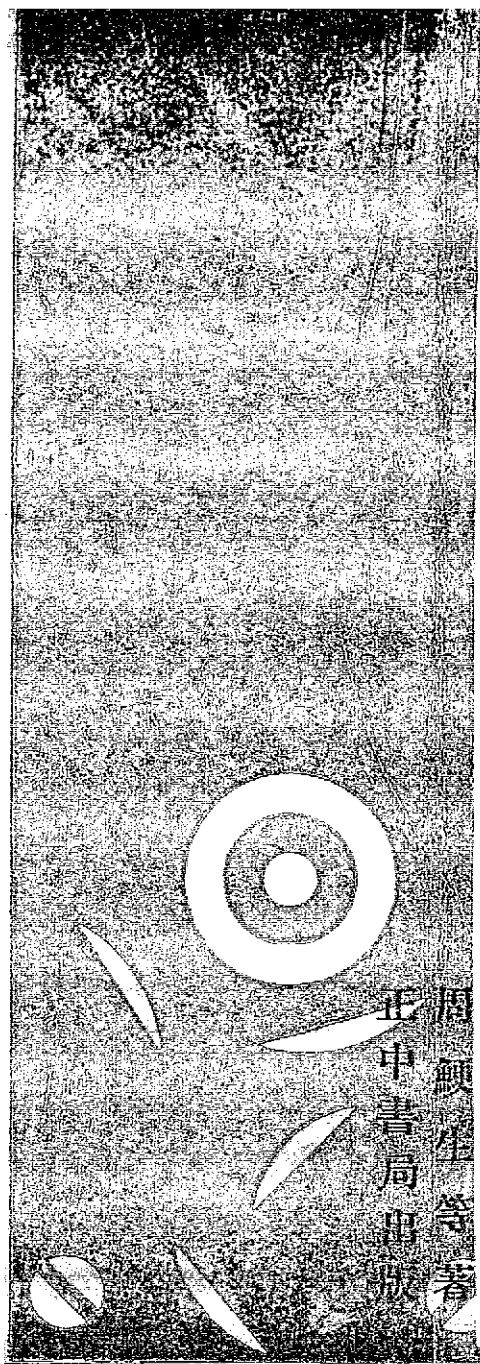


近代各國外交政策



外交叢書  
周鯁生等著

近代各國外交政策

南京正中書局發行

578  
349  
2



3 1799 6697 7

## 編者序言

國家正和個人一樣，都不能離羣而索居。國與國間既然發生了關係，就不能不講求外交之道。要維持一個國家的生存和保障一個國家的安全，須靠武力，當然不消說；但除武力以外，同時又非靠外交不可的。所以簡單說來，外交就是國家爲着對外求生存而不能不運用的一種手段。外交的意義既是這樣嚴重，外交於國家的命運，既有左右的力量，則所謂外交云者，無疑的決不會草率從事，或者甚至於盲目而無定向的。各國外交必有其一定所遵循的步驟和途徑，此即所謂外交政策。至於決定一國外交政策的因素，大概是很複雜的，如民族的特性，歷史的背景，地理的環境等爲最顯著最重要的幾點。

坊間關於縱的敘述如歐洲外交史等著作，年來出版很多。但是橫的敘述即如各國外交政策一類作品，尚不多觀。實則各國外交史與各國外交政策兩者是互爲因果及相輔而行的，如欲澈底明瞭外交史實的爲什麼，這樣一演變，非先研究各國外交政策的真相不可，祇因各國固定的外交政策，常常會不期然而然使歷史公式化地演出。反之，如欲了解各國外交政策的成因，

亦同時非探求各國的外交史不爲功，因爲各國的外交政策，亦根據其歷史的背景而決定者居多。因此之故，關於近代各國的外交政策，實爲有志探討外交者所急待研究的科目，外交評論社有鑒於此，遂有編行本書之舉，藉以滿足智識社會上急迫的需要。

這裏所蒐集的都十五篇。我們事前先行估量了作者的特長和心得，再分別請各人擇題執筆的，所以深信彼來比較的完善。至於作者都是國內著名的教授，諒讀者早經習聞，用不到多所介紹的。其中除創作以外，又將國外有關係人物所親撰的幾篇論文，請人譯出，以供讀者進一步的參考。

至關於中國過去的外交政策，及其對於列國外交，究竟應採什麼方針？我們預備另編一專冊加以研討，大概不久也可列爲外交評論叢書之一，敢向讀者預告者。

總之，本書之刊行，在國內尙屬創舉。如能藉此喚起國人對於外交之注意，和引起國人研究外交的興趣，則我們編輯本書的旨趣，庶幾得償於高一了。

陶澍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序於南京

# 近代各國外交政策目錄

編者序言	(一一—二二)	陶 燧
英國外交政策之解剖	(一一—二二)	周鯁生
美國對華政策之核心	(二三—二八)	耿淡如
最近美國外交政策之轉變	(二九—三六)	徐景薇
史汀生論四年來美國外交政策之基礎	(三七—五二)	方鍾徵譯 OSBORN 著
日本對華外交政策	(五三—七〇)	高宗武
廣田弘毅論日本外交之基礎	(七一—八二)	沈鍾靈譯
蘇俄之外交政策	(八三—一〇四)	楊幼炯
蘇俄外交政策概述	(一〇五—一一八)	徐公蘭
拉狄克論蘇聯對外政策之基礎	(一九—四〇)	Karl Rader 著 李 翠 譯

戰後法國外交政策·····	(一四一——一六〇)·····	袁道豐
戰後德國的對外政策·····	(一六一——一八六)·····	賴希如
德國斯脫萊斯曼時代之外交政策·····	(一八七——二〇六)·····	袁道豐
戰後意大利外交政策·····	(二〇七——二一六)·····	周 還
小協約國的外交政策·····	(二一七——二三八)·····	袁道豐
波蘭外交政策·····	(二三九——二五四)·····	JANOWSKI 著 楊宗淦 譯

# 近代各國外交政策

## 英國外交政策之解剖

周鯁生

說明一國的外交政策，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為對外政策大抵具有時間性，而隨執政者之人物政見為轉移。關於英國的外交政策，尤其有此感想。第一，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國，領地遍全球，對外關係複雜，因之，外交政策亦不免有多方面的差別。從地域上分別，英國便有對大陸的外交政策；對美洲的外交政策，以及近東或遠東的外交政策。其次，英國的政治是議院政府制，而向來議院中有輪流握權的兩大政黨，對於國政各抱有顯明的政綱，在對外關係上亦常表現着政策或傾向的不同。例如對於近東問題尤其土耳其帝國處分問題的政策，自由黨和保守



黨向有不同的傳習，曾經特別表現在俄土戰爭中格蘭斯頓（Gladstone）的主張與保守黨狄斯雷利（Disraeli）內閣的政策之衝突上；而在歐戰結局議到土耳其帝國問題的時候，在英國政治界仍然可以看出傳習的爭點。又如歐戰後對於蘇俄關係，一方面保守黨取敵視態度，他方面則工黨採取友善的態度；在保守黨內閣之下對俄決裂，而工黨內閣對俄復交。如是則英國外交上似乎可以分出保守黨政府的政策，自由黨政府的政策，以及近來新起的工黨政府的政策。所以籠統的講英國的外交政策，真是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不過細察英國外交政策，全部的精神，究竟不是一貫的宗旨，永久的目標，或共同的特徵，爲向來外國觀察者，乃至英國人自己所共認的。英國政治家嘗聲言，「在對外關係上無容黨爭之餘地，」一九一一年德法間摩洛哥事件中，反對黨首領巴爾福（Balfour）爲政府聲援，有此宣言，也就是這種意思。

## 二

然則英國外交政策的宗旨、目標、或特徵，又是怎樣的綜括起來，約有五點。第一是帝國主義，

第二，是大陸均勢，第三，是海上霸權，第四，是和平，第五，是實利本位。

近代英國的帝國主義，當溯源於五十餘年以前狄斯雷列的政策。十九世紀中期，英國在自由黨首領格蘭斯頓一派所謂「小英格蘭派」(Little Englanders)長期主政之下，注重於內政改革，對外持消極主義，在國際關係上英國的威望頗不振。保守黨新興的領袖狄斯雷列一派，人則不滿意於格蘭斯頓一派的消極主義，漸思採積極的對外活動政策。一八七四年保守黨在總選舉制勝，便是狄斯雷列政見的制勝，而英國新帝國主義的時代開始。狄斯雷列的保守黨內閣六年之間繼續從事帝國主義的發展政策。一八七五年有從埃及收買蘇彝士運河股票的豪華；次年通過英女王加稱「印度帝后」新尊號的法案；逾年更有合併南非的杜蘭斯哇(Tlaskavaal)共和國的暴舉；而更重大的一步尚在一八七七年俄土戰爭中之干涉行動，那次為英國東方帝國的利益，不惜冒對俄戰爭的危險。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的結果，狄斯雷列乃得於從柏林凱旋時誇稱「榮譽的和平」(Peace With Honour)因為英國不費一兵一彈打破俄國的近東政策，而又從土耳其索得塞布魯斯島(Cyprus)以鞏固英國地中海的勢力。從

此以後，帝國主義在英國社會如此的深入人心，就是所謂「小英格蘭派」的格蘭斯頓也不能完全擺脫那個新勢力的支配；在一八八二年英國居然於格蘭斯頓的自由黨內閣之下，派軍干涉埃及亂事，造成永久佔領埃及的地步。

最可注意的是，西黎 (Sealey) 教授所著的英國的發展 (Expansion of England) 一書，以闡揚英國歷史的使命著名者，於一八八三年出版，即時大受公眾歡迎，說是兩年中銷出八萬部，而著者則依羅士倍里 (Lord Rosebery) 的推薦，獲授「爵士」榮號。羅士倍里自身當時原是自由黨要人之一，預定為未來的內閣總理，在一八八三年適從世界周遊返國，獲讀西黎之書而大感動。他於是脫離舊派自由黨的傳習，變成帝國主義的信徒，而於一八八六年及一八九二年兩次格蘭斯頓內閣中長外務，於一八九四—五年自己為內閣總理的時候，得着實行這新信仰的機會。羅士倍里的變宗，正以表示帝國主義已經超越了狄斯雷利的保守黨員的範圍，而侵入自由黨的圈內。到二十世紀開始，帝國主義已經成了英國對外政策上一貫的宗旨。保守黨的張伯倫 (Joseph Chamberlain) 固然是帝國主義的急先鋒，而自由主義的古雷

(Edward Grey) 又何嘗不是帝國主義者。南非戰爭是保守黨政府的事業，而戰後的建設則依自由黨政府的「聯合」政策以收功。在一九〇五年以後，自由黨長期執政時代，一方面英本國與殖民地的結合益見鞏固，而有一「帝國會議」的新制度做連鎖，雖則張伯倫一派保守黨主張的帝國聯合或特惠關稅政策已經依一九〇六年的總選舉受着致命的打擊。而在他方面，則英帝國在海外的勢力，無論在非洲，在近東，或在遠東方面，都有極重要的發展。在歐洲大陸，則英國訂結了英法協商及英俄協約，完成對抗德帝國的大團結。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如果說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則英國的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至少也要負一部分重大責任。

就英國而言，所謂帝國主義“imperialism”實有兩重的意義：一方面的意義是英國特有的，即英國與殖民地的增進，英帝國內部團結的鞏固；第二則是一般的意思，那就是說，對外政治的經濟的發展。實則兩者常是相關連的。有時對外的發展，原意是為帝國各部分交通的安全利益設想，例如近東政策和埃及的佔領便是以英本國與東方屬地，尤其印度的交通安全為目的，而日英同盟的續約，也顯到印度領土的安全。南非戰爭則是為南非殖民地（Cape Colony）

利益及支配非陸南北直通路線（Cape to Cairo）政策而引起。而在他方面，英帝國內部的團結的加緊，可以增加對外發展的力量，形成世界政治上更大的勢力，更不待說。戰後國際聯盟成立，英國在形式上推崇國際組織，而實際的政策仍未脫却帝國主義的宗旨，一方面，在國聯委任統治制之下，反而變相的屬地式殖民地，在非洲及近東方面大部的增添；埃及的控制，亦并不因承認埃及獨立而喪棄，傳統的自由貿易主義，疑變乎有被保護關稅政策代替的趨勢。同時則帝國的團結，共同利益的增進，也依定期的帝國會議及互惠關稅政策而謀實現，雖則南非聯合的反帝國傾向，以及愛爾蘭的反抗態度頗動搖英帝國的基礎。近來英國工黨的得勢，似乎也不會根本改變英帝國主義的傾向。在工黨領袖執政權之下，帝國主義的勢力，仍然活躍於政治上，則依最近哇太華（Ottawa）會議的帝國經濟政策的決定可以證明。那個廣大的英帝國，不論它是什麼，如英國人所說的「無意中得來」（Acquired in fits of absence of mind.）抑或是有計畫的事業，究竟任何一黨一派當權總沒有願意或甚至於拋棄或任其分裂的；同時帝國勢力的鞏固與繼續發展，仍然是英國政治上的大目標。所以我們敢說，帝國主義乃繼續為英

國對外交政策一貫的宗旨。

### 三

大陸均勢亦是英國對外政策上一貫的目標。英國以島國的地位，久已不作大陸發展之想，但因其隔大陸僅一衣帶水之遙，在國防安全上不能漠視大陸的事情。自英國人看來，任何一強國支配歐洲大陸，尤其支配所謂「低國」(Low Countries) 即荷比，同時便是威脅英國海岸的安全，而必不可不竭全力以打倒它。質言之，英國的利益在維持大陸的均勢。誰是大陸最強的國破壞均勢的，英國必連合其他大陸國家共同抵制。英國在十六世紀中曾經打倒西班牙，在十八世紀初頭抵制路易十四世。依同樣的理由，在十九世紀初頭，英國支持歐洲聯軍與拿破崙作持久戰，到了二十世紀，則她又成爲對抗德意志帝國的大團結之中心。歐戰以後，均勢政策繼續維持。一九二五年羅卡諾公約的訂立，萊茵地帶的保障以及德國的加入國際聯盟，在英國都認爲回復大陸均勢的要件。戰前德意志帝國是大陸最可患的強國，戰後則又要防制最強的法國。

蘭西來破壞均勢。巴黎和會以來，英政府不但對意大利頗表親善，而且有時公然袒護德國，而抑制法國及其與國（如波蘭）之所為，其維持大陸均勢的用心，可以想見。

#### 四

至於維持海上霸權，則更是英國傳統的政策。從近世紀開始以後，英國為爭海上支配權力，曾經次第和西班牙、荷蘭以及法蘭西爭鬪。在十九世紀中，英國在海上的優勢確然樹立。歷任政府，不論是保守黨或自由黨當權，莫不以維持那個優勢為政策，交通要路的控制，海軍根據地或屯煤地的佔有，最強大的海軍軍備的維持，便是他們主要的用心。關於海軍的實力，英國多年採行所謂「兩國標準」（Two-power Standard）主義，意在使它的力量足以對付世界兩個強大海軍國的聯合勢力（後來減到一〇對一六之比例，即比較一強大海軍國再多百分之六十之力量）。對於凡敢對英國海上權力挑戰的國家，都視為仇敵。十九世紀末年以後，德帝國擴張海軍之新運動，直接威脅英國的海上權力，便是二十世紀初期英德衝突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歐戰期中，英國充分發揮其海上勢力，得戰勝之功；戰爭結局，德帝國海軍全部消滅。同時則美國海軍的崛起，復動搖英國海上的優勢。華府會議妥協的結果，英國承認美國海軍軍備的平等，不過他那支配海上權力的根本政策，究不因此而拋棄。實際上，英帝國的海上優勢，迄今仍未推翻。所謂「海上自由」，不但是戰時英國的敵國或中立國的口號，且至今仍倡於美人之口，這也就是對於英國海上霸權政策之一種抵制。

## 五

英國人亦常說英國政策的大目標是和平。這話出自英國人口中，似乎是偽善的說法；不過從客觀的見地看，那個平和的目標，也是事實。從一八一五年拿破崙戰爭結束以至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整整的一百年間，英國雖不斷的有侵略弱國的戰爭及鎮壓或征服殖民地屬地的遠征軍行動，但真正對強國的國際大戰爭，則除一八五四年開始的克里米亞戰爭外，英國絕未參加過。而且克里米亞戰爭則猶是許多英國政治家所不贊成的。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每值歐洲有



大戰爭，英國都極力避免捲入漩渦，而維持中立。即在二十世紀初頭最緊張武裝和平之局面下，英國雖然一方面從事海軍競爭，組織協商團體，而他方面則仍力求避免戰爭的擴大。在歷次的國際危機中，英國的勢力都用在和平的維持上；就是到了歐戰快暴發的關頭，英國的外長古雷猶在為平和努力。英國政治家說德法未開戰之前，英國總不肯表示助法對德的態度，就是惟恐激發德國戰爭行動，也許有一面的真理。歐戰以後，平和仍然構成英國政策的大目標，而謀依國際聯盟這個新組織以實現，所以國際聯盟的擁護和利用，構成英國對外政策的一重要部分。英國何以要拿平和做目標？自然不能說她是完全為平和而求平和。英國的平和政策自有他的特殊理由。於是問題便歸到英國的特殊國情上。

一國的對外政策的決定，與國情有大關係。上述英國政策的諸種特點，便是英國的幾種特殊國情而發生的。因為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國，而自治殖民地又有其半獨立的地位，除了英本國的利益外，尚有帝國全體及各部分的利益，所以她的對外政策，常須考慮帝國內部的關係。加之，英國為商工業最發達的一國，自然傾向於向海外發展，以競爭銷場，原料及投資地。其

結果始成近代英國帝國主義的特殊形式。又因為英國是一個島國，依工商業海外活動以生存繁榮，而其領地遍於全世界，所以她要支配海上權力，要維持海軍的優勢。又因為英國雖是島國而逼近歐洲大陸，容易受大陸勢力的侵襲，維持大陸均勢，便是安全的保障。最後，英國是列強中所謂「飽了」的國家，世界上最好的殖民地，最重要的通路地點，幾乎都已為英國人所佔有。他們的努力，重在保守；同時對外商業的重大利益，不宜於發生戰爭，所以英國的對外政策，自然傾向於平和。

## 六

在英國對外政策裏面，尚有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實利本位主義，實利本位，最足代表英國外交全部的精神。英國人在世界上被稱為「開鋪子」的國民，事事採行「開鋪子」的實利主義，對於英國的外交，更可以適用這個譏評。本來一切國家的對外政策，自然都以本國利益為前提，但是像英國的外交那樣可以完全擺脫感情，不講邏輯，而專論實利的，似乎也屬罕見。遠事且

不說，但就歐戰後的近事而言，也可以到處看出英國那種實利主義的外交精神。對於墨、潘、未、乾、之、凡、爾、塞、和、約、的、賠、款、條、項、她、可、以、不、督、責、德、國、履、行、而、寧、願、修、改、爲、的、是、要、使、德、國、恢、復、繁、榮、爲、本、國、貿、易、留、銷、場、爲、爭、奪、俄、國、市、場、起、見、對、於、英、國、統、治、階、級、資、本、家、一、般、嫉、如、蛇、蝎、之、蘇、俄、可、以、於、恢、復、國、交、之、前、先、行、成、立、通、商、關、係、卽、就、遠、東、政、策、說、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外、長、張、伯、倫、關、於、對、華、政、策、的、言、言、居、然、能、不、固、執、條、約、的、權、利、而、肯、主、張、修、改、條、約、以、遷、就、中、國、國、民、運、動、的、新、情、勢、不、能、不、說、也、是、出、於、一、種、實、利、主、義、的、精、神、如、是、則、英、國、的、外、交、政、策、在、一、方、面、固、不、免、有、不、貫、澈、的、譏、評、而、在、他、方、面、其、富、於、彈、性、而、能、收、臨、機、應、變、之、功、效、則、亦、是、不、可、否、認、的、長、處、然、而、從、外、國、的、立、場、看、英、國、這、種、性、質、的、外、交、畢、竟、是、最、惡、辣、可、怕、的、一、種、戰、前、德、帝、國、外、交、的、惡、辣、露、在、外、面、英、國、外、交、的、惡、辣、則、藏、在、骨、子、裏、所、以、同、是、帝、國、主、義、者、德、帝、國、成、了、世、界、戰、爭、的、罪、魁、禍、首、而、大、英、帝、國、則、長、站、在、「平、和、自、由」的、大、旗、之、下、

## 美國對華政策之核心

耿淡如

任何一國的外交政策，必基於其國家的利益，此為一定的原則。國際間外交局勢，雖雲波詭譎，縱橫捭闔，似不可捉摸，然試分析其利害，權衡其輕重，亦可得其進展之途徑。請舉一例：英國在十九世紀外交政策基本原則之一，即為維持土耳其帝國之領土完整。英國為欲實現，一八五四年同俄血戰於克里米亞，一八七八年準備與俄再戰。英國之熱心扶助土耳其，非有愛於「東方病夫」，實以俄國一旦佔領君士坦丁，勢將控制黑海至地中海之海峽，於是東通印度之航路，必受其威脅。但自英國佔領埃及及後，得蘇彝士運河之控制權，英國覺其至印度之路，已稍安全。二十世紀情勢變更，為英國腹心之患者是德，而俄國之危險，已非昔比。德皇威廉第二高瞻遠矚，企圖與英爭海上霸權，並建造保達鐵路（Bagdad Railway）直達印度之中心。於是德國原為英

國之友，而變爲勁敵；俄國原爲英國之敵，而成爲與國，此非英國外交之「朝秦暮楚」實以英國利害之重心已轉移故耳。

英國之近東政策與美國之遠東政策，頗有相似之點。二者俱以本國之利益爲前提，而中土二國曾得苟安於一時。英國維持土耳其之領土完整。美國亦主保持中國領土完整，門戶開放。英國志在保護東通印度之航路，維持地中海之霸權；而美國意在打破「獨佔」，獲得市場；太平洋之海權，菲律賓之保障，又爲其遠東政策之動力。滿洲可以巴爾幹半島比擬，而日本之「西進政策」與俄國之「南開窗戶」彷彿相似。所不同者，土耳其復興已告成功，而哀我中國，依然爲他人刀上之魚肉耳。

美國遠東政策之發軔，英國實有以促成之。美國孟羅主義之宣佈，出於英外長肯寧（Cairning）之建議。門戶開放政策之成立，亦導源於英國士紳政客之鼓吹。一八九八年 Sir Michel Hicksloach 在英國衆院聲稱：「英政府決定，無論如何，維持中國之門戶開放。」（註一）同年 11 月 1 日 Sir E. Ashmead Bartlett 亦在衆院申述：「維護中國領土之完整，爲不列顛貿易所

必需。遂即動議維持中國領土之獨立案。同時英國外交次長 Lord G. N. Curzon 列舉政府之對華政策：(a) 維持中國之完整與獨立，(b) 保護條約上的權利，(c) 實施貿易平等之原則。(註一) 一八九九年海約翰發出門戶開放牒文前數月，Lord Charles Beresford 由華返英，道過美國。自三藩市至紐約，沿途向主要商會，演說中國之情形，並勸導美國同英共維持門戶開放政策。(註二) 英政府何以不宣佈「門戶開放」而促使美國爲之，其理甚顯。英國在俄德等強搶「讓與」時，亦曾染指，奪得租界。盜劫之人，宣傳私產之不可侵犯，其誰信之。海約翰曾爲駐英大使，深知英國外交底蘊。故於九月六日，發出門戶開放之牒文，其得英政府之贊助，蓋可知矣。

## 一

但美國主張中國之門戶開放，領土完整，亦自有立場。遠東貿易之利益，實爲其政策之發軔點。遠東之最大市場，在於人烟稠密之中國，美政府早已認清，自不願坐視列強分割之，而封閉其門戶。一八九六年美人在華設立之公司，約有四十所，僑民約一千四百三十人，僅次於英，而約十

倍於俄。航運事業發展極速。一八九七年，美國至華之船舶及噸位，居於第六位；至一九〇〇年，躍至第四位。運售中國之商品，以棉油兩項爲大宗。一八八七年，美棉運入中國者，約值五、三三一、二五一金元；一八九一年輸入煤油三九、三四八、五七七加倫，約四倍於俄。總計中國全部之外人貿易，美國在進口貨方面佔九%，出口貨方面約一一%，約佔進出口全數一〇%。以其他各國比之，進口貨之價值，美佔第三位，出口貨之價值，美居第二位。（註四）所以當一八九八年一月間，國務院未有表示對華政策前，美國商人請求紐約商會設法促進政府保障美國在華之主要利益及條約的權利。紐約商會遂上書總統，請求保護。波斯頓三藩市等商會，繼起響應，共促政府之注意。

當列強搶奪租界，劃分勢力範圍時，美西間正戰雲密布，美國無暇顧及。迨戰事平息，一八九八年巴黎條約成立，菲律賓已移轉於美，美乃移其視線於中國。是時美政府不特須維護在華之經濟利益，且須保障菲島之安全。其方法謂將步俄德法之後塵而爭奪「讓與」乎？美參院勢必反對；抑袖手旁觀乎？亦勢有所不能。所以採用門戶開放政策，圖得利益均沾，貿易平等之機會。

一面以菲島爲根據地，可保護美國在華之利益；一面以維持中國之完整，可減少威脅菲島之勢力。此項政策使瓜分中國之陰霾，一時消除；而美國之貿易得以自由發展。然陰謀破壞門戶開放政策者，此伏彼起，接踵而來，以迄日佔東北，乃達於頂點。

### 三

美國對華外交以維護門戶開放爲準繩者，已數十年矣。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亂時，八國聯軍入據北京，列強重圖瓜剖中國。七月三日，海約翰表明美政府之態度，通告各國，謂：「美政府之政策：維持中國領土行政之完整；保護友邦以條約、公法保證之權利；並保障在中國各部公平貿易之原則。」此又重申門戶開放領土完整之主張。時俄國圖佔滿洲甚急，欲據滿洲爲其保護領土。和議後，駐滿俄兵，延不撤退。威脅中政府訂立密約，允許俄國獨佔東北之權益。美提抗議，英日締結同盟，以遏抑俄帝侵佔滿洲之野心。此乃所以引起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日俄之戰。一九〇五年三月，俄軍大敗於瀋陽，德皇卽一面乘法國暫處孤立之勢，干涉摩洛哥事件；一面企圖干涉日



俄戰事，以期繼續分割中國之領土。美總統羅斯福洞知門戶開放政策又遭危險，即運用靈敏的手段，施行雙管齊下的政策，同時警告法德，調解日俄。（註六）結果日俄媾和，締結朴資茅斯條約，俄國南滿之權益，轉移於日，而門戶開放之原則，亦載入於和約中。後日俄祕密商議，俄將以前中俄訂立之密約，交於日本。依此項密約，日本即要求南滿鐵路區域之絕對獨佔的行政權。復以一九〇七年之日俄諒解，兩國同意相互維持滿洲的特權。由是日本更進而破壞中國門戶開放之原則，而美國亦不得不設法以防止之。一九〇八年，日美間訂立魯特高平協定（Root-Talkahie Agreement），日本承認各國在華工商之平等機會，並同意維持中華帝國之完整及獨立。美國猶以為未足，於是國務卿Knox建議滿洲鐵路國際化之計劃，以未得英法贊同，而又遭日俄反對，故全歸失敗。（註七）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威迫中國承認。美國向日本曾提出嚴重之警告，時歐戰方酣，日本又與英法俄意四國，締結密約，承認其在華之特殊權利。一九一七年復以藍莘石井協定，使美國亦入其彀中。「美國政府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之利益，尤其於接壤日本所領之地方。」美承認日本之「特殊利益」日本即曲為解釋，以為中國從此「非

完全獨立之國家，而爲日本之保護國。」石井在美各處演說，亦聲明日本適用極東之孟羅主義，如有第三國侵害中國之時，日本必干涉防護之。（註八）美政府鑄成之大錯，後於華府會議時自出糾正，締結九國公約，重申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一）尊重中國之主權、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二）給予中國最完全無妨礙之機會，可發展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三）各國用其勢力，以期切實設立，並維持其在中國全境商務工業機會均等之原則；（四）勿得在華利用情勢，求得特殊權利，以減損友邦人民之權利並暗中危害各友邦安全之行爲。」門戶開放，領土完整之原則，得國際條約之保障，中國亦正式承受該原則之約束。當時美代表團在國務卿休士頓之下，將此約呈報總統時，嘗謂：「現信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經由此約，至少成爲一種事實。」（註九）美政府以外交的手腕，維持門戶開放政策，似可達於成功之途。

#### 四

然國際政策之實效，未可僅以條約測之。條約之效力，基於「遵守」與「制裁」。若一方無

遵守之意，他方無制裁之力，則所謂條約者，即等於具文，尙有何效力之可言。日本侵佔我東北，以武力封閉東北之門戶，摧毀中國之領土完整，撕破條約，蔑視公法。舉世輿論指斥之，則充耳不聞，國聯反對之，則宣言退出。信口譎言，欲以一手掩盡天下之耳目，果有何法，以對付之耶！

美政府自潘陽事變發生以來，對於維護門戶開放政策，不可謂不力；其努力於東亞和平，遠甚於國聯諸會員國。首先向日本抗議者，美政府也；首先發表「不承認主義」者，美政府也；集中艦隊於太平洋者，美政府也；一再演講指斥日本之行動者，美國務卿史汀生也。美國務院自一九一八年至本年三月，共發九次牒文，敦促中日兩方，停止戰事，尊重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其中五次，送於日本一方。又復不接不離與國聯合作。曾派日內瓦美領事 Clibber 四次出席於國聯行政院。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行政院在巴黎開會，美駐英大使道威斯往與行政院會員接洽。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美政府宣佈「不承認主義」，即凡違反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所造成之情形，或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均不予以承認。二月二十三日，史氏復致參議員波拉函中，申述美政府維持九國公約之意旨，認「凡爲整個世界、福利之計，劃決不能忽視中國之福利與保障。」理直氣壯，詞嚴。

義正，似應有相當的效力，稍戢侵略者之野心。然事實乃大謬不然。美國一月七日之藤文發，而錦州於二月三日陷落。國聯調查團東行之際，日本進攻上海，焚燒閘北。調查團報告將宣佈前，日政府承認傀儡政府，以表示已成之事實，以難國聯。十九國委員會報告書通過後，而日本竟退出國聯，進佔熱河。美國政策，未見成效，誠何故耶？

美政府維護其遠東政策，大部依非戰公約。史汀生氏曾予以新解釋。史氏認為根本上戰爭為非法，「戰爭不復為國家義務權利之淵源。」公約雖承認自衛權，然自衛權不得由一國自己決定之。「苟有一國，憑藉保護本國人民之假面具，以掩飾其帝國主義之政策，其假面具必將揭破。」（註七）公約含有彼此間之商權，即公約有被違犯之危險時，「一切國家即商權其應如何努力，使此公約偉大莊嚴之和平目的，見諸實效。」史氏復於演說中，述中立之說，已成過去。隱示美國不復堅持其「中立之權利。」國聯採用經濟抵制，制裁侵略國時，美國亦可放棄其貿易之權利。即非戰公約之效力，果如史氏之所昌言，然無實力以擁護之，其何能濟以九國公約之破壞，而欲以非戰公約維護之，是所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耳，於事奚補？

其次，美政府宣布之「不承認主義」，國聯於三月十一日，亦接受此項原則。但所謂不承認主義者，僅一消極的方法，設無積極的方法以繼其後，則無甚效力。一八二〇年 Troppan 會議，奧俄普宣佈：不承認由非法的手段，完成領土之變更。終未能阻止歐洲之革命及拉丁美利堅共和國之建立。一八八九年，第一次美利堅會議，通過決議：「設有仲裁條約，在戰爭威脅之下，割讓領土，概作無效。」（註十二）一九一五年美國五月十一日之牒文，申明不承認日本對中國之「二十一條」要求。（註十三）消極的不承認主義之效力，微乎其微。充極其量，不過使爭執之問題，懸而不決。換言之，滿洲偽政府不得變為法律上之政府。（Government de jure）謂胡佛主義即可維護門戶開放政策，失之過遠。

美政府之遠東政策，未見實效者，另有原因在焉。對於國聯，終未有深切的合作；對於俄國，外交關係，未曾恢復；復以戰債問題與英法兩國發生齟齬；凡此皆削減外交壓迫之力。史氏在其四年來美國外交政策之基礎一文中，述其外交策略：（一）遇國際間重要之事件，採磋商的政策；（二）以磋商的方法，減低與國聯的歧異與衝突之恐懼；（三）鼓動世界有效的輿論。（註十三）

僅抱此磋商的態度，而從未有深切合作之表示，無怪其了無成效也。

## 五

美政府其將如英國之維護其近東政策而以武力與日本相角逐乎？否。美國在遠東之利害關係，不若英國之在近東之密切。英之視印度認爲帝國之命脈，而美對於菲律賓則異於是。在此遠東局勢緊張之時，美國會竟撤消總統之否決，通過菲島獨立案，已可見見美人對於遠東之觀念。然則美將放棄其門戶開放之主張乎？是又不然。美國之對華政策，全視貿易之利益而定；矧美之在華貿易，日有進展。其佔中國出口貨的成份，在一九一三年只有九·三%，一九三〇年，增至一四·七%。又所佔中國的入口貨，一九一三年六%，至一九三〇年增至一七·五%。（註十四）其政策的根本條件，未有變更，決不放棄其主張。由是而論，美將如何維護其對華政策乎？依美人 Buell 分析，不出三途：（註十五）（一）獨立的政策，繼續援用非戰公約保有行動之自由；（二）孤立的政策，調停中日間之衝突，如有一方不從，則袖手旁觀視機而動。前項政策之無效，已昭然若

揭。後項政策，則等於暫屈服於日本之霸權。(3) 國際組織的政策，美國爽直的與國際合作，維持世界之和平。以國際組織其負阻止戰爭及制裁侵略國家之義務。如是得收衆望易舉之效，而無孤掌難鳴之苦。美國將爲國際組織之一員，無須徘徊却願，趨趨不前。至於國際組織政策，亦有二途：(1) 美國另組新國際組織，獨立或並行於國聯，實行非戰公約。(2) 美國與國聯確立負責的關係，美國應表示對於制裁侵略之態度。是則美政府與國聯合作，恐爲其維持遠東政策之最有效之方法乎？

國聯現於強國控制之下，美國與國際合作，須先得英法對美之諒解。戰債、關稅諸問題，應如何解決，不得不有以協商之。換言之，歐美之糾紛未解，對於遠東亦無一致之可能。此即羅斯福新總統召集各國領袖，在華府談話之用意乎？

羅氏就任伊始，即宣佈其外交政策，基於國際條約及國際合作。尊重國際條約，則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當在維護之列。注意國際合作，須先清理歐美糾紛。英法等代表，已先後蒞美；中日等代表，亦接踵而至。白宮談話，以討論經濟問題爲主，但經濟問題與遠東問題，已成難分之連鎖。近報

戴英法美談話結果，已稍有趨於一致之端倪。故羅斯福於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宣佈願意參加訂立諮詢條約，共同抵制指定之侵略國家。以後美國雖保持其行動之自由，然國際每有爭端發生，而國聯對爭端中之侵略國決定斷絕關係使之孤立時，美國當即表示其對此事之態度。

(註十六)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美國務卿赫爾發表就任後第一次演說。聲稱：此時條約義務，爲人藐視，條約神聖，橫被蹂躪之國際局勢，必須終止，而代以國際健全的新關係。此爲美國外交政策顯著的變更。(註十七) 近「英法美對於遠東問題意見接近，使日本處於四面楚歌之中，前途非常可慮。」(註十八) 美國對華政策之關鍵，在於國際間之能否合作。其主持之中國門戶開放，領土完整，原由國際之協助而成立，如以獨力維持勢有所未能，力有所不足。以後門戶開放政策之命運，須視赫爾所稱之健全的國際新關係如何耳。論者每以日美趨於妥協爲可慮，謂偽國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餌，以誘致美國之妥協，使美國不復堅持其不承認主義。依現勢觀之，美國政府必不爲所動。日本以亞洲孟羅主義爲號召，意欲驅除白人之勢力，則白人當深覺日本勢力在大陸膨脹之危險。美國現無變更對華根本政策之理由。如有變更，或將在資本主義與其



產主義殊死戰之時乎。

一九三三，五，十，上海。

- 註一 J. W. Beshford, China, An Interpretation, Appendix 14, p. 609.
- 註二 戴爾登 The Background of the American Open Door Policy, (thesis), pp. 23-24
- 註三 J. H. Latan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1565
- 註四 美國財政部統計局報告譯引自戴爾登論文(見註二)P. 15-16:
- 註五 Journal of the Asiatic Association, II, (1902) pp. 122-23.
- 註六 J. H. Latane, Op. cit. 570-71.
- 註七 劉孝帝國主義論(中國史上卷) pp. 351-52
- 註八 同上書下卷 pp. 99-100
- 註九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史汀生致波拉爾
- 註十 史汀生非戰公約演說詞
- 註十一 Moore,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VII, p. 316
- 註十二 Foreign Relations (U.S.) 1916, p. 146

十三 Henry L. Stimson, "Bas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Past Four Years,"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38.

註十四 本刊第三卷第四期八十七頁

註十五 H. L. Buel,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reprinted in *The China Weekly Rev.*, vol. 64, nos. 4, 5, 6.

註十六 四月二十七日哈瓦斯電(見四月二十九日申報)

註十七 二十九日華盛頓電(見五月一日申報)

註十八 四月三十日東京電(見五月一日申報)



## 最近美國外交政策之轉變

徐景薇

### 一

當美國脫離英國宣告獨立時，毛羽尙未豐滿，乃表示與世無爭，閉門自治，遂採取所謂孤立主義，不干涉主義的外交政策。繼而實力漸充，乃擴充其片面的不干涉歐洲政治之主義，而成爲雙方的，相互的，各不干涉主義——美洲不干涉歐洲政治，歐洲亦不應干涉美洲政治——此卽所謂門羅主義是也。

門羅主義爲不干涉主義，因而創海上自由主義，以貫徹其絕對中立與自由貿易之主張。又轉而爲對華之門戶開放主義，此中自有其一貫的主張。凡此門羅主義也，海上自由主義也，門戶開放主義也，均爲美國外交上的傳統政策；其中尤以門羅主義爲此諸政策之源泉，故尤爲重要，尤爲神聖而不可侵犯。美國人之視門羅主義，亦猶宗教徒之視聖經，爲其行爲上不可或違之金

科玉律；威爾遜手訂凡爾賽和約，創立國際聯盟，而卒致功虧一簣者，不啻由於門羅主義從中作梗之所致也。

一

門羅主義之轉變，不自今日始，自Polk Olney Cleveland等之一再解釋，而其內涵遂一變再變，以致盡失其本來面目。門羅主義為不干涉主義，為保障美洲政治獨立之主義，因而中美 南美諸國初極歡迎之，利用之，以為其國獨立和發展之基礎。嗣因美國憑藉門羅主義，以行使其警權於中美及南美諸小國，於是拉丁美洲諸國同生反感，向之歡迎之不暇者，今乃嫌惡之矣。國聯盟約第二十一條謂：『門羅主義為維持和平，而與盟約內任何規定均無所牴觸。』因而拉丁美洲有踏盟不敢加入國聯者矣。凱洛格解非戰公約曰：『門羅主義乃完全建立於自衛權之上，而此權已包含於公約中矣。』（見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七日凱洛格答參院問）因而美洲小邦，有不欲批准公約者矣，而全美國際會議中，對於門羅主義之抨擊，更屢屢見之。年來世界經濟恐

慌之劇烈，與夫軍備擴張之暗鬥，更使美國深感國際間政治上及經濟上連鎖關係之密切，於是此孤立的門羅主義，乃不得不再轉變，以適應時勢之需要。

羅斯福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致五十四國之中請書中，最是令人注意之一節爲：「在軍縮全部時期之內，世界和平，必須保障，余因此提出一第四步驟，此步驟與忠實履行以上之提議，相輔而行，並與現行條約符合。即世界各國應參加一莊嚴而確切之不侵犯公約，暨重行莊嚴聲明，其限制及減少軍備之義務，并在簽約各國能忠實履行其義務時，各自承允不派遣任何性質之武裝軍隊越出本國國境。」所謂「各自承允不派遣任何性質之武裝軍隊，越出本國國境」一語，便爲美國外交政策轉變之證，向之以美洲盟主自命，而行使警權於全美國者，今乃自動的表示不遣派軍隊越出國境，放棄其對於美洲其他各國之警權。美國此種表示，實爲變更其傳統的門羅主義，使之適合於時代的環境。蓋在非戰公約訂立後，欲更進一步的維持和平，實不能不有此不得遣派軍隊越出國境之限制，一則可以使侵略者無可施其技，二則可以使拉丁美洲諸國，解除一切誤會，而不再有所顧忌。三則日本不能再藉口非驢非馬的「亞洲門羅主義」，而實

行其侵略行爲。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內瓦軍縮會議，美代表台維斯所發表之宣言，更能證實美國外交上傳統政策之轉變。台維斯曰：「（一）和平受威脅時，美國準備與其他各國商議，以期避免衝突；（二）各國商議後，確認某國破壞和平，並決對侵略國採取必要手段時，如美國同意於各國所下之判斷，則各國公同恢復和平之努力，美國決不採取任何行動，使之失敗；（三）以維持忠實裁軍爲目的之監察制度，美國贊成之，美對監察制度之樹立，準備予以援助，對監察制之實行，亦準備參加，惟以爲監察制度，須求其確有效力，能自動運用，並長久存在；（四）美以爲軍縮常設委員會之權力，當加以充實，俾能以有效方法監視軍縮公約之實施；（五）美國堅以爲領土現狀，必須維持，並主張由國際上相約，禁止各國派遣軍隊至本國領土外。因此規定侵略國之定義如下：即凡國家違反條約，而以武力侵入外國領土以內者，爲侵略國；（六）美對於一切重整軍備事，均予反對，又主張軍備強大之國家，亦應裁軍，其法均於廢止攻擊性質之軍器，並採納英國軍縮計劃中，於軍器之各章，美所以如此主張者，因各戰敗國軍備，既受條約之縮減，則以契約相互之義務，各戰勝國，亦應縮減軍備，至防禦軍事所需之限度爲止，俾與戰敗

國縮減後之軍備，不相上下。此美國所深信不疑者也。美國之願與各國諮商，美國之不採任何行動以阻礙各國恢復和平之努力，即爲放棄其孤立的傳統政策，放棄其海上自由之主義。美前國務卿史汀生氏，於上年八月八日在紐約外交協會之演詞，亦曾明示的及暗示的爲此種表示。至於『裁軍監察制度之實行』、『軍縮公約實施之監視』、『禁止各國派遣軍隊至本國領土以外』等主張，實與其向來之互不干涉主義和行使警權於美洲各國之政策——即歷來美國外交當局之所謂門羅主義者，有莫大之牴觸，亦有莫大之轉變。蓋在今日時勢之下，門羅主義已由地域的，局部的性質，嬗變而爲世界性的，維持和平之主義矣。

此種轉變之起源，亦非甚新，一九〇七年第二次海牙和會，美國前總統羅斯福且爲召集人，威爾遜總統參加歐戰，且謂爲和平而戰，謂爲維護其海上自由主義而戰。國聯盟約，雖因民主共和兩黨內部之爭，而未批准，然而手訂盟約者，却爲威爾遜，盟約第二十一條明言門羅主義與國聯盟約並無牴觸，由此可見門羅主義轉變之甚，今日擴大之程度已如斯，今後轉變之方向亦可預測矣。



## 三

海上自由主義，亦由不干涉主義蜕化而來。美國之加入歐戰，乃以此爲號召；美國參議院之反對批准國聯盟約，亦以爲盟約第十六條之制裁，是使其海上自由主義破壞無餘。然而自非戰公約簽訂以後，一般學者認爲從此海上自由主義應有所變更，蓋非戰公約既罪責戰爭，則嗣後美國不復能主張絕對的自由與中立權利，而供給違約者以戰爭上之種種需要，以助其惡。（參閱拙著非戰公約與世界和平第一一九頁至第一二〇頁）自史汀生於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發表其演詞後，足使吾人覺此解釋之不誤。（參照外交評論第一卷第四期拙作美國對於東北事件之態度一文）最近台維斯在日內瓦軍縮會議發表之宣言，更可證實美國海上自由主義之更變。其言曰：「各國商議後，確認某國破壞和平，並決對侵略國採取必要手段時，如美國同意於各國所下之判斷，則各國公同恢復和平之努力，美國決不採取任何行動，使之失敗。」此不啻明言美國決不妨礙國聯盟約第十六條之行使；於英國海軍爲裁制侵略國而實行封鎖時，美國

決不藉口海上自由而破壞之。此種轉變，均爲美國由孤立的獨善政策，轉而爲國際的合作政策之表現。雖限於傳統思想，僅能爲消極的不破壞，尙不能積極的有所作爲，然能向國際合作的路上走去，未嘗非一極可注目之事。

#### 四

美國對華之門戶開放主義，亦與其門羅主義有相互之關係。門羅主義，爲保障美洲國家之土地與獨立，門戶開放主義，爲保障中國領土與行政之完整。自門羅主義之轉變，由地域的，局部的性質，變而爲世界性的維持和平主義，故今後美國之對於門戶開放主義，或將更努力保持勿墮，以爲維持遠東和平的唯一方法。一九二二年之華盛頓會議，使門戶開放主義，多一層條約上之保障，且更爲具體化；日本侵略東北以後，美國前任國務卿史汀生於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復參議員波拉函中，曾詳述維持門戶開放主義之必要，並以九國公約中之門戶開放主義，爲『反對強國侵略弱國的根本政策』。此更足見門戶開放主義，與門羅主義，同樣的被視爲保障

弱國之主義，而爲美國堅持到底之傳統政策。史汀生曰：「本國政府，以太平洋之一的資格，向持以下見解，爲其政策之根據：即相信中國人民自有其光明之前途。並相信以公正忍耐及相互好感諸原則，與中國人民相周旋，必能得最後之成功。吾人深悉彼國政治家發展其國家與政府所負責任之重大。彼國進步之遲滯，與其締造負責政府之困難，早爲海約翰氏及休士氏暨其他當代人物所料及。而亦爲門戶開放主義所應遭遇之阻礙，在華盛頓會議代表各國之政治家，均曾謂應假中國以時日，俾成就其發展，吾人實表示贊同，且將準備即以此爲吾國將來之政策。」見史汀生復波拉函。足見門戶開放主義，美國將堅持到底。惟美國今日之主張維持此主義，與昔日海約翰氏之創此主義，其意義顯有不同，即海約翰時代之所謂門戶開放主義，其目的重在利益均沾，其後亦僅爲保持均勢之工具；至其最近意義之轉變，則吾人認爲與門羅主義有同一之趨勢，即將被視爲維持遠東和平之唯一方法也。此則吾人所尤當澈底明瞭者也。

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南京。

## 史汀生論四年來美國外交政策之基礎

方鍾徵譯 美國前國務卿 *Stimson* 著

余著此文之用意在於闡明胡佛政府外交政策之一般目的。本文所欲談及之範圍，只限於政治之安定與和平之維護，對於經濟問題，則略而不詳。爲使讀者明瞭胡佛政府所採取之政治上每一步驟之目的起見，余將說明胡佛政府之哲學與信條。

胡佛政府有一主要準則，即以歐洲大戰之經驗已使世界文明各國，尤其是工業發達之文明國之輿論，對於戰爭心理演生一極明顯之轉變點。吾人相信由大戰期中之「以戰止戰」口號所激起之反戰心理，不但明示世人不欲再許戰爭之僅爲過渡性質，且必欲尋一永久而且有益之工具，以制止戰爭之爆發。吾人相信此種心理轉變必能影響一切經濟事實演進，而爲立定新的國際努力之永久基礎。前世紀之機械發明以及繼起之工業組織與社會組織之變革，其全部影響與戰爭之關係，至是始大顯著。歐洲及北美諸重要國之自滿心理已較前大減，彼此間相

互依賴之關係亦日益增強。工業國人民依賴遠地供給食品及原料之需要既日見增強，此一份文明社會人士之反戰心理遂更加明顯。在另一方面，機械進步所給與現代軍隊之破壞性視昔尤烈，因有此種變動，戰爭給與人類生命及文明之危險程度亦隨之日形嚴重。各國思想領袖昔已普遍承認現代文明對付現代戰爭之能力過於微弱，而羣謀尋得比較進步之對付方法。彼等嘗盼能以解決私人爭端之和平與司法手段以爲防止國際爭端之工具。自吾人所已述及之演進原素觀之，此種盼望之實現機會，蓋已距今不遠矣。

惟欲實現此種盼望，仍有許多窒礙在焉。戰爭給與文明之威嚇，僅有高度發達之工業化國家方能體悟，此等國家雖爲世界各國之領導者，但其數較少。運用和平與司法手段以解決爭端之學說，以及各國應有自動約束其挑戰行爲之必要，仍不爲多數人所理會。大地之上，忽略戰爭危險之種族，實較惡恨戰爭之人爲多。然而事實決難否認，今日之世，各國政治經濟，息息相關，縱使戰爭爆發於在世界上毫無重要地位可言之某一地方，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他各地文明，亦將直接間接受其影響。

自表面上觀之，防止戰爭及用較少破壞性之國際機關代替戰爭之必要，雖為一部份人所承認，但大戰經驗促使各國之極端國家情緒異常發達，以致解決方法仍難尋得。目下國家主義固已猖獗至極，但此究係感情衝動之臨時產物，必不能視為解決戰爭之永久工具。惟吾人得自大戰之經驗，則以任何地勢優越，資源豐富之民族，如吾美國者，亦終難閉關孤立，不與外國交往。蓋以近世科學發明，日新月異，貨物流通，彼此互賴，致使吾人得自他國之生活享受不甘遺棄，耽於受用，惟有努力推進世界和平耳。

上述事實與原則已表示美國外交政策之將來任務在於贊助並發展和平機關之擴張，組織。惟此種情勢不足以證實美國定須廢棄其維持秩序與防禦外侮之合理的海陸軍備方告有效，誠以美國軍備原無所損於他國之安全與和平機關之鞏固也。

當胡佛政府於一九二九年秉政時，過去十餘年來各國之努力於安定世界政治者，約可分為二類：其一為消極制止擴張巨額軍備，其二則為積極創造國際新關係，其表現於事實者為國聯盟約，一九二二年之九國公約與四國協約，及巴黎非戰公約。

第一類之唯一進步爲海軍建造之限制。在一九二二年之華盛頓海軍軍縮條約內，五大主要海軍國均欲以確切而且建設之步驟，限制其主力艦之建造。然而，彼等注意於此而忽略於彼，會後八年之中，各國竟競爭建造主力艦以外之軍艦如巡洋艦。此種敵視行爲已將英美兩國一同捲入漩渦，引起兩國輿論之嚴刻譴責。自習慣與傳統言之，英美兩國常爲安定世界商務與和平之領袖，故此項敵對行爲非特爲各海軍國間完全終止海軍競爭與敵對之一重要問題，抑且關於其他間接及心理上的改造點，尤爲重要。蓋此一問題，於相互協調及共導羣倫之進展上必大有裨益，目下擾攘世界之欲其趨於安定，胥賴乎此。

胡佛履任總統之後，立以解決此問題爲己任。國聯召集之軍縮會議預備會於一九二九年四月在日內瓦集會時，胡佛總統卽曾授意美國出席代表吉布遜（Gibson）在預備會席上發表關係此問題之演辭；當時吉布遜之提議極爲麥唐納之工黨政府所讚納。英美兩國政府既有此一致之意見，當卽更進一步，以相互友好與精誠合作之精神，尋研此問題之詳細解決辦法。夫忍耐與恬默之談判爲一切國際會議成功之先決條件，此乃公認之真理，欲爭論問題之歸於一

致，與敵對利益之化成融洽，決非在公開辯論中所能獲得。此一國之輿論每非彼一國之爭辯所能誘變，故在國際會議正式集會時所發出之宣傳，其作用常能僅使對方首領之態度更爲深潛而已。抑軍縮之可能性常以解決某項政治問題爲成功之前提，故政治問題之解決，必先於軍縮，而非附於軍縮之後者。所幸英美兩國對於海軍主力艦之平等，已尋得原則上之洽意；至於國防戰具之巡洋艦問題，雖多爭執之點，然已經一九二九年夏間數月之長期磋商與耐性研究，故終能獲得滿意之允諾。俟英相麥唐納被邀赴美，兩國極端主張者感於麥相之人格與雄辯，一切不滿遂盡冰釋。

一九三〇年一月，海軍會議召集於倫敦。英美兩國代表團隨即獲得海軍實力之協意，經過詳細談判之後，彼等又獲日本代表之同意，於是此三大海軍國代表遂在倫敦簽訂海軍協定。此項協定雖因意法兩國之不予允諾，而稍有缺憾，但三大海軍國既已完全同意，法意之梗已無關宏旨矣。夷狄協定所以未得意法之同意者，在於法意兩國之海軍問題與若干歐洲特殊的政治問題有關，非若英美兩國之能在事先消除一切爭點；抑此種政治問題之性質純屬歐洲者，僅恃



## 美國外交，決難解決。

倫敦協定之訂立能使英美兩國政府之精誠合作更形鞏固，終胡佛政府時代，兩國政府之能亦步亦趨，協同共謀其他問題之建設的進步者，蓋純賴有此良好之諒解。此種好感，為促進富有建設性質之其他工作之第一步驟，以故吾人極盼其能永垂弗替。

在胡佛政府以前，已經完成之第二種世界政治安定工作，為國聯盟約及巴黎非戰公約之簽訂。國聯盟約之運用，在十餘年來頗著成績，而處置歐洲問題，尤著功效。根據盟約規定，不幸一旦發生戰爭威嚇，各會員國應即被召集會，企謀調解，或派員調查，擬具報告。在某種情形之下，此法頗能制止戰爭。此外，國聯尚有按期召集之各項常會，各國代表之言論與行動亦能形成一種趨勢，合力解決爭議，以預防戰爭慘禍。因有上述種種方法，歐洲各國遂能以合一之精神，力謀避免戰禍之爆發。

美國於一九一九年即表示不欲加入國聯，美國之決定此政策，蓋因美國人民素來不願干與歐洲大陸情事，國聯既以歐洲各國為主體，其主要目的在於解決歐洲問題，美國人民不欲其

政府加入國聯。此外尚有一原因，即許多美國首領不滿於國聯之運用盟約，以各國共同力量制裁違反盟約之國家。胡佛總統對於此事亦表示不滿，渠對美國傳統政策遵奉甚謹，雅不欲使美國參與任何制裁行動，致獲不可知之將來結果，處處留意於保持任何國際事件之獨立判斷。惟在另一方面，渠對於有關於美國利益，或危害世界和平之事件，則時刻準備欲與各國合作，俾能發生道德上之制裁力量。

一九一九年之決定及隨與發生之政治行動，幾使美國與國聯領導下各國之合作關係完全疎隔。吾人不但不至於牽入國際漩渦，抑且漸成完全孤立之形勢。此種趨勢對於維持戰後之世界安定，頗多窒礙。蓋因維持世界和平之一切工作，不但不能獲得美國之有力的道德影響，且使國聯會員國時常顧慮美國之將反對國聯政策，以致減削國聯力量。此中不便及危險，實為識者所共見。

一九二八年在柯立芝總統時代，巴黎非戰公約宣告訂立。因有此項公約，世界大多數國家遂能聯合於盟約之下，否認運用戰爭以為實行國家政策之工具，彼此並且充用和平手段以

解決一切爭議與衝突。在胡佛繼任總統時，此約尚未盡經簽約國全體之批准，因此約本身之缺乏強制力量，當時論者遂多以具文視之。

胡佛總統及其僚屬對於此約之觀點，完全與普通批評者不同。彼等自始即認此約已經立下能使美國以其全力促之成爲健全法律制度之基石。故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美國批准此約之日起，苟遇此約之意義或功能發生疑問，胡佛政府即以堅決之態度力爲解釋，務使此約成爲世界公認之一活法律。根據此種觀點，胡佛總統乃與英相麥唐納於一九二九年十月在拉匹丹 (Rapidan) 河畔發一聯名宣言，聲稱「吾兩政府不但承認非戰公約爲一種善意之宣言，抑且認爲一種積極義務，俾使國家政策悉依公約之精神行事。」

前政府認爲此種解釋能使非戰公約成爲美國促進世界安定與和平之一有力工具，且以此種任務之完成，無所礙於美國人民所反對之捲入外國牽累漩渦及以強力提倡和平之本旨。事後，美國政府抱定此種政策以對付非戰公約之態度，一貫不變。因此，當一九二九年中俄兩國在北滿發生軍事衝突時，美政府即以非戰公約爲基礎，致牒於五十餘簽約國，請其勸告中

俄當局採用和平手段以解決一切爭端，再如一九三一年中日兩國在滿洲發生軍事衝突，且將此案提交正在日內瓦開會之國聯行政院時，美國政府亦以非戰公約為基礎，與各國直接會議，討論此案，並以合作與鼓勵，贊助各國立下維護和平之基石。此種努力之結果即為設立李頓調查團，提出解決此案之報告書，形成國際合作之明顯步驟。

美國政府更以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之通牒將非戰公約變成否認任何暴力結果之政策，此項政策於一九三二年三月為國聯大會所一致採納，成為擁護國聯盟約與非戰公約之最有力量政策。迨乎晚近，非戰公約又以同一方法用為阻止國聯盟約及非戰公約之二簽約國，秘魯與哥倫比亞因里特西亞 (Leticia) 問題而引起之戰爭之有力輿論。關於此事，美國政府在非戰公約義務下所採取之行動完全與國聯行政院決議一致。故此二大公約對於形成反對破壞和平之世界輿論，厥功甚偉。

因有上述數次行動，美國堅持非戰公約含有強制力之解釋遂成為世界安定之建設政策之基礎，其影響所及，約有下列各點：

第一，樹立明確之協商政策，俾美國政府得於任何緊急事件發生時與各國政府洽謀對付辦法。吾人凜於世界和平呼聲之高，既與國際義務之神聖不可侵犯，不惜衝破前此孤立政策之混陣，時以美國之正當力量影響各國之行爲。

第二，美國與國聯間之隔膜，甚至於衝突，賴以完全消除。自是之後，國聯轄下各會員國可免顧慮美國態度之將與彼等決議相左，放心暢所欲言。

第三，因有上述二種結果，有效之世界輿論，不但易於集中，且其效力亦大爲增強。以過去事件言之，此項一致輿論一經構成，破壞和平之毒焰常能立爲滅滅。

上舉主要結果之獲得，端賴非戰公約之含有能使世人滿意，克盡其本旨之毫無疑義解釋。此種解釋一經各國接受，立生強制力量。

前政府既以堅決態度領導各國維護世界和平，更以同一觀點表示其對國際法庭之信賴。美國政府在胡佛總統領導之下曾簽一國際法庭依附議定書，請求參議院予以批准。吾人之意深以國際法庭所貢獻於世界之最要效益，不僅在於各國提交審判各項爭端之解決，抑其判決

將即演成爲一和諧而且有效之國際公法制度，此意義上之裨益於世界和平，尤爲廣大與永久。

大戰以後，有關於世界安定與改組諸任務之重要問題大多發生於遠東，此數問題均與美國發生直接關係。保持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原則，自一八九九年以後，即爲各國共同承認之「門戶開放」政策之拱心石。大戰終結之後，此政策又經出席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之遠東主要關係國加以確認，明白載在九國公約。當此之時，中國正在努力建設自由主義之民國，不幸大戰期內，中國內戰適起，威嚇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事相繼發生。九國公約適在此時簽訂，故遂立刻成爲切合時宜之自束盟約，使各簽約國對華關係之行動不能越乎重立遠東和平基礎之一般原則以外。海軍軍縮協定之訂立，與限制主要海軍國不得在太平洋領島上或特定地點建造要塞與海軍根據地之能獲得滿意結果，亦以此項安定計劃爲其促成之主要因素。故就表現於華盛頓會議所訂各項條約言之，美國政府之目的完全在於保持各國在華之既存利益；至於達到此目的之手段，美國政府之意，自然反對採用武力，而冀簽約各國能自約束行動，毋得損害中國之發達，並妨礙其他簽約國在華之合法利益。

一九三一年秋間之滿洲軍事行動及其他事態發生以後，一九三二年一月在上海附近施展之更大規模軍事行動繼之而起。第一次軍事行動之發作已使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原則發生問題，第二次軍事行動則更予簽訂九國公約各國之在華利益以重大損害。上海之戰，現代戰爭之危險與破壞並不限於只予中日兩國人民以生命及財產上之損失，各國人民之居留於此世界最重要口岸者，所受損失之鉅，亦不勝計算。

關於此事，美國政府曾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致中日兩國政府之通牒及同年二月二十三日國務卿致參議員波拉之公開信，說明其對此事與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與夫遠東一般形勢之態度。三月十一日，受理中日爭議之國聯大會又以一致之決議（日本當然除外）通過：「凡用違反盟約或非戰公約所採用之手段所造成之任何形勢，條約，或協定，國聯會員國均不欲加以承認。」

不承認原則至是遂正式包含在國聯盟約之中。三月十一日之國聯大會決議為去年十二月以來歷次日內瓦會議之討論基礎，此項決議雖因會員國之各個態度未甚鮮明而未能發生

任何實施，然其法律性之足以維護各國在華利益，則毫無疑義可言。吾人猶憶，當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日軍撤離上海之時，東京外交部發言人曾以日本政府之有此決定，乃欲遵照世界輿論並以「終止加諸日本身上之舉世憎憤」爲言。上海事變之結束不能認爲滿洲事態發展即將終止之先兆，吾人早已料及，固不待事實證明而後知也。

說明前政府外交政策之主要目的與哲學，不能不述及其對拉丁美洲所抱之態度。因地域之接近，拉丁美洲之於美國，不論其在財產方面，抑在國家安全方面，其關係之重要均非美國人民所敢漠視。中美洲土腰與加勒伯海中諸島爲出入巴拿馬運河必經之要道，乃美國國防生命線上之有力鎖鍊。惟雖如是，美國仍以其維護世界和平利益之同一標準爲對拉丁美洲情事之一般原則。

胡佛政府自始即以堅決之態度，推進美國與拉丁美洲各國間之良好關係。胡佛政府之拉丁美洲政策，可自其公正與友好之蓄意，及其盡量避免採取武力干涉，或有意榨取各國政府及其人民之利益之具體表現見之。吾人曾以最迅速之方法召同駐泊聖多明我、海地及尼加拉



瓜之美國艦隊，承認尼加拉瓜國內各黨派之行動，使其漸能練習自治，建立自由選舉組織而成之新政府。吾人曾一再聲明不願採用武力壓迫以索回投諸數國之美國商業借款。吾人曾在國際公法允許之下，贊助墨西哥政府裁定傾覆該國政府之武裝革命。吾人曾重立先代遺習，承認力能掌理其國內政務之新政府，且以最迅速之方法給此新政府以財政上之扶助，俾能立即安定其國內經濟狀況，徐圖恢復國家元氣。吾人曾與拉丁美洲各國合作，努力恢復察科（Chaco）及亞馬遜河之秩序。吾人曾完成塔克那（Taraca）與亞里加（Arica）之調解。至在社會及文化方面，吾人已使拉丁美洲各國成爲吾人之文化好友與商務良伴。當胡佛當選爲美國總統時，渠曾漫遊南美，訪問各國當局，使彼等對於胡佛政府所抱政策之畏懼與不安爲之完全冰釋。其後，吾人亦曾招待墨西哥、巴西及哥倫比亞三國之當選總統，待以國賓之禮。吾人曾使美國各大學術團體與拉丁美洲各國作有系統之交換或研究，且在許多科學與福利改進事業之國際會議上，正式代表彼等參加討論。以上各種行爲深使拉丁美洲及世界各國明悉美國之唯一目的在於推進彼此間之良好感情與人類進步，而非在於權取與掠奪。

胡佛政府對於和平組織與世界安定之工作及目的，已具如上述。此種國際工作，實以各國之互相信賴與好感爲其成功之主要原素。適宜和平機關之組織有助於此良好精神之表現者，關係至爲重大。

雖然，吾人在過去四年間之努力奮鬥，固嘗因世界經濟不景氣而歷盡挫折矣。吾人相信，重要之進步基礎，今已確立，吾人之繼任者當能比較吾人更有建樹，使此基礎更形鞏固也。（載美國外交季報一九三三年四月號）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八日譯於首都



## 日本對華外交政策

高宗武

### 一 日本外交政策之概觀

若提起日本外交政策，我們就不免有談虎色變之感，像今日的日本外交政策——尤其是對華外交政策——其態度之兇暴，手段之酸辣，在目前任何外交政策中，都不容易找出來的。然而我們若翻開日本的歷史來看，在安政元年（一八四五年）神奈川條約以前，日本史上簡直找不出「外交」兩字。在美國教士丁韜良（William Martin）之漢譯惠頓氏萬國公法（Whit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輸入日本之前（註），日本人真的無法了解國際公法為何物？乾脆的說一句，若無美國彼理將軍（Commander Perry）的威嚇通商，則日本今日在國際上的地位，或許不會這樣。這八十年日本外交政策之翻手作雲覆手作雨，我們不能不說他有長足的進展。

(註)日本幕府末年，外國兵艦藉隊而來，當時外國人之到日本，其目的首在通商，所以開口即談根據國際公法，彼此修約通商，但幕府外交當局，誠不知國際公法為何物，畏首畏尾，莫名其妙，而國際公法之研究，遂因之而起，歐美法制思想之輸入日本，實自國際公法始。當時日本雖已有一二冊荷蘭文之國際公法書籍，然對日本外交界之最有貢獻者，莫如我國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出版之美國教士丁韋良氏漢譯之萬國公法，維新初年大隈重信之所以能成外交家之名者，確受此書之賜，作者魏德日本憲政史專家吉野作造先生云，彼時日本人士方感國際公法之奧妙難解，一見萬國公法，雀躍欲狂，朝野人士，無不以先睹為快，一時「萬國公法」四字，遂傳為學界中之唯一新名詞，外交家、政治家之視為金科玉律者，自不待言。

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的外交，也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實在無政策之可言。直到明治維新，國權逐漸恢復以後，日本的外交政策，纔確立起來。日本外交上一貫的傳統政治，在一九二一年英日同盟廢止以前，要算是聯英政策了。我們看大英帝國竟能拋棄其三百年間，以孤立為光榮的傳統政策，而與一人種各異的東亞新興國家相握手，日本外交政策之高人一等，與日本人在外交上之努力，可想而知。中日戰爭之後，日本因與帝俄的利害到處衝突，曾取極端的仇俄政策，當

時日本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分作「親俄論者」與「親英論者」兩派。親俄論者的主張，以為俄國在東方勢力，根深蒂固，若以強俄為敵，驅逐其在東方固有之勢力，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好與之妥協，先擁護朝鮮的獨立，以待來日。親英論者的主張，以為俄國併吞滿洲朝鮮的野心，昭然若揭，在這個時候，若與俄國親善，乃一時苟安之計，非所以維持東亞和平之道，且英國那時候正與南非構釁，無暇東顧，日本若與之締結同盟，以抗俄國之遠東侵略，實為萬全之策。當時的日本政治家，如伊藤博文、井上馨等是屬於前者，桂太郎、山縣有朋等是屬於後者。後來伊藤內閣，以財政問題，遂至瓦解，第一次桂內閣於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年）六月成立。因桂太郎、小村壽太郎等之努力，及伊藤博文等之犧牲成見，從旁幫忙，日本方面多年期望的英日同盟，遂於明治三十五年（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在倫敦正式調印。於是日本、因、聯、英、政策，既告成功，仇俄、政策，便更其變本加厲了。

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無論日本的政治家、外交家、學者，都異口同聲地說是朝鮮爭奪戰。中日戰爭之後，中國在朝鮮的勢力，被日本驅逐殆盡，在當時阻礙日本併吞朝鮮者，唯有俄國、日

本之仇視俄國，可想而知。英日同盟的動機在日本方面，可以說是完全對付俄國的。日本早想一鼓作氣，完成其大陸政策。當時阻礙日本推進大陸政策者，首在俄國，日俄開之勢不兩立的情況，極爲明顯；然而日俄戰爭所以在中日戰爭十年之後纔爆發的原因，無非日本一方以本身力量，尙未充實，一方以外交佈置，尙未就緒，我們看英日同盟締結了不到兩年，日俄戰爭馬上爆發，就夠明白了。日俄戰爭在日本外交政策上的意義，可以說是第二次朝鮮爭奪戰，或者可以說是進一步的吞併朝鮮動作，所謂大陸政策的基礎，即建築於此。日俄戰後，日本得到意外的勝利，遂以爲俄不足畏，乃由仇俄政策，一變而爲防俄政策，此外對法對德對意，因利害較淺，所謂一貫的方針，在局外者殊難揣測，其中可以看出來的，是唯依國際形勢，因時制宜，以達其外交上出奇制勝的目的，如從前桂太郎之聯德，去年芳澤謙吉之拉法，都是日本外交上之老套手段。美國呢？原來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國家，他的建國基礎，完全築在「自由」「平等」兩大原則上，在日本維新的初期，他對日本曾表示過相當的同情，對日本取消不平等條約，首先表示贊同的就是美國，所以日美關係，在初期的時候，並沒有十分衝突的地方，一八九九年九月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的聲明

書出世之後，美國的「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和日本大陸政策的衝突，始逐漸表現出來，尤其是從美國移民律頒佈，華盛頓會議以後，日本的仇美政策，日甚一日，最近又因英日間的態度，以國聯及中日問題，漸生裂痕，又向仇英悅美這一條路上走，現在日本的言論界對英已下總攻擊，英日間今後的關係，或者益形複雜，至於美國是否會落日本的圈套，與之相睦，當然是另一問題。

以上所述的是日本對列國外交政策的系統，但我敢說無論他們所用的種種策略內容如何，一言以蔽之其目的，總不外乎侵華，換言之日本外交政策的中心，無非是「對華蠶食主義」，什麼叫做「對華蠶食主義」呢？就是積極的擴張日本在華政治的和經濟的權益，消極的擁護其所謂既得的權利，以螞形的軍事形勢，劫取滿蒙，進窺中原，以實現昔日大隈軍信所懷抱做中國統監的野心。簡單的說一句：「對華蠶食主義」既是日本外交上根本的目的，而對其他各國的或聯或仇或迎或拒，都不過是實現這目的的政策，目的是固定的，而政策則隨時變遷，可是無論政策變到如何程度，其根本的目的，却始終如一，換句話說：無論伊藤外交，陸奧外交，大隈外交，



加藤外交，幣原外交，田中外交，以及內田外交，其對中國始終是抱着「蠶食主義」的野心，從來沒有一絲一毫一分一釐變更過，這是有過去的歷史，可以證明的。

## 二 日本對華外交政策之史略

「同文同種」「共存共榮」這一類的口頭禪，凡是和日本交際過的，或去過日本的人，總天天可以聽得到，見得到的，然而事實上究竟如何？當然是我們所應該注意的。現在且把日本對華政策的史略，來介紹一下，那末，二二八的慘案，以及今日平津日危的來源，就容易明瞭，所謂「同文同種，共存共榮」的真偽，也不難辨別出來了。不必說，中國近世的外交史，是一部國恥史，而這部國恥史中，尤以關於日本方面的為最甚而又最多！茲限於篇幅，也只好寫其概略。

若論日本和中國的交涉，誰也知道是開始很早，據一般人的推測，都說起自周末戰國的時代，若根據書籍中的記載，則起自我國秦時，不過那時候的日本還是一種部落，並沒有統一國家的制度，無國交之可言，及到後來國家統一完成，兩國在朝鮮半島一帶，互相接觸，中國的制度文

物，大概是由這個時代傳過去的，這是中日交涉的第一期，而朝鮮在中日兩國衝突的地域，在這個時候，已經明顯的表示出來，今日日本侵略中國的途徑，也可以說在這個時期已經決定了的。朝鮮所處的地位，既如上述，所以日本若侵略朝鮮，等於侵略中國，日本侵略朝鮮的野心，表現於文祿九年（一五九二年）豐臣秀吉之征伐三韓，日本人秀吉為東方的拿破崙，其在日本武功上所占的地位，可想而知，今日日本的大陸政策，濫觴於秀吉之征韓，更何待論。秀吉之後，明治初年西鄉隆盛（日本明治維新三傑之一）又高唱征韓論，當時日本國論，分做兩派，西鄉等主張征韓，岩倉具視等反對征韓，日本維新史上著名的西南戰爭，亦因征韓論與反征韓論而起，後來雖因西鄉戰敗，征韓論一蹶不振，然而征韓論的精神，未曾稍衰，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以及繼之而起的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就是征韓論的精神復活，我們看一時曾被指為大逆不道的西鄉隆盛，現在他的紀念銅像，竟聳立於東京之上野公園，從遺臭萬年，一變而為流芳百世，可以說是再明白也沒有的了。

中日兩國的關係，固然發生得很早，然而近代式的國交，只可以說是肇始於一八七一年（

同治九年）九月十三日所訂的第一次中日通商條約，若據這條約的內容看來，中日間的地位，還是對等的。但是在這通商條約之前，日本已開始其對華侵略政策，日本對華外交政策是一種「對華蠶食主義」，在上文已經說明過，第一次被日本所蠶食的地方，就是我國的藩屬琉球羣島。日本明治天皇於一八六八年登位後，琉球王即承認日本爲上國，一八七九年日本正式滅琉球，改琉球爲縣，中國政府當時不欲以武力爲外交後盾，遂坐視琉球之滅亡，雖有左宗棠主張放棄天山南北路以保守琉球羣島，但終於無濟於事了。

繼琉球事件而起的，有一八九三年的甲午之敗，一九〇〇年的甲午之危，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條」之差，一九二八年的濟南慘殺之痛，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以及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今日的平津危局，都是日本侵華事件中之聲華大者，或者可以說是日本對華外交政策的具體表示。近幾十年來中國人一年三百六十多天中，天天是呻吟於日本的侵略政策之下，這六七十年來的日本對華外交史，就是一部對華侵略史，中國在日本侵略壓迫之下，除了割地賠款以及喪失種種的權利之外，所有獨立國的尊榮，幾被日本蹂躪而殆盡。她侵略的手段，一天

進步、一天、侵略的野心、一天、擴大、一天、侵略的方式、一天、兇猛、一天、我們若從目前的局面、回溯到過去幾十年的日本對華政策，我想即使日本入本身，對我這種結論，也必三頌其首。

### 三 所謂大陸政策者

日本近代的政治過程，是由民族主義一變而為國家主義，再變而為帝國主義，凡留心日本政治者，都看得非常清楚，所以這大陸政策也在其政治過程之中，到此刻已達極盛的時期了。在豐臣秀吉之後，明治維新之前，俄國的勢力逐漸南下，日本方面頗受壓迫，日本志士遂主張「防北」，所謂開發北海道的政策，就是由此而起，這北防的政策，也就是北進大陸政策的第一步，北進的道路，不用說是跟着神功皇后，豐臣秀吉而來的傳統政策，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征服高麗，侵略滿洲，瓜分中國，那末他們可以拋棄其島國生活，而入大陸，所謂大陸政策者，即取義於此。在明治元年，日本自身還毫無力量的時候，已經有幾個狂士，主張日俄聯盟，瓜分中國。自尾崎行雄的支那分割論出世後，日本對華侵略的野心，正如春筍怒放，而中國滿清政府的無能，和朝鮮末

年政治之腐敗，適予這大陸政策以發展的好機會，所有中日戰爭，日俄戰爭，西伯利亞出兵，濟南出兵，以及今日非法佔領東北，其出發點都是基於此北進的大陸政策。

關於大陸政策的內容，和目的說得最透切的是田中義一的奏摺，田中奏摺說：「將來欲制中國，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爲先決問題，這是與日俄戰爭的意義，大同小異，然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倘支那完全可以被我征服，其他如中小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處，必畏我敬我而至於降我，使世界知東亞爲我國之東亞，永無向我侵犯的大膽，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亦卽我日本帝國之生存上所不可不做之事也。」可見日本的大陸政策，是稱霸世界，征服世界的政策，他們所主張的厲行鐵道政策，經營滿蒙，操縱貿易，並欲於最近期內拋棄三島，實行遷都朝鮮以遂其擷取大陸的野心，他日受此大陸政策影響者，決不僅是我們中國一國呢？

推進大陸政策的直接機關，除了在東京的拓務省之外，在滿洲的有南滿鐵路公司，關東長官，領事館，所謂四頭政治，就是指這種機關而言，就中以南滿鐵路公司是日本北進大陸政策的

大本營因爲日本在滿洲的經濟力量，完全在此。去年日本以四頭政治，欠缺統一，乃派遣武藤信義大將爲駐滿大使，兼管關東廳長官，關東司令官，南滿鐵道公司，使從前各自爲政的四機關之力量，集中起來，所以現在執行大陸政策的機關，已達極完備的時期了，這咄咄逼人的大陸政策，現在方藉此強有力的新機關正在着着進行中。處於被侵略地位的中國，實在是來日大難，苦心正多呢？

#### 四 日本各政黨之對華政策

對華政策，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就、是、日、本、人、本、身、也、說、對、華、政、策，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樞、軸，換、言、之，對、華、政、策，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根、幹，對、其、他、各、國、的、政、策，是、枝、葉，是日、本、外、交、之、因，對、華、政、策、而、轉、移，猶、枝、葉、之、隨、根、幹、而、轉、移、一、樣。日、本、議、會、中、最、重、要、的、問、題，除、了、預、算、案、之、外，要、算、是、外、交、問、題、了，我、們、若、檢、閱、數、十、年、來、日、本、外、交、部、長、在、議、會、中、的、外、交、政、策、演、說，可、以、說、有、百、分、之、九、十、九、是、關、於、對、華、政、策、的，故、對、華、政、策、在、日、本、外、交、政、策、中、所、占、的、地、位，蓋

不難想像者。

日本外交政策的名詞，有所謂「幣原外交」、「協調外交」、「定石外交」，又有所謂「中外交」、「自主外交」、「軍服外交」，前三者是表示柔弱的外交政策，後三者是表示強硬的外交政策，從來三宅坂（日本陸軍部所在地）的陸軍部是代表強硬外交，霞關（日本外交部所在地）的外交部是代表輾弱外交，政黨方面呢？現在姑拿政友會和民政黨來比較，原敬作首相，內由康哉作外相時代的政友會是輾弱外交，當時在野的憲政會（現在的民政黨）是強硬外交，後來到憲政會上台的時候，政友會便也猛烈的攻擊他是輾弱外交。反之政友會變成強硬外交論者，總之政府、黨總、是代表輾弱外交，在野黨總、是代表強硬外交，這差不多是一種慣例，後來幣原外相和田中外交的不同，若嚴格的說起來也不過是這樣。

我們打開日本各政黨的政綱來看，關於外交政策方面的政綱，總不容易發現的，此中可加以兩種的解釋：一種是一國的外交政策是非常秘密，各政黨不肯輕易發表，也意中事，一方面是各政黨所主張的外交政策，在實質上並無多大區別，不過推進的方式，略有不同而已，例如大陸

政策既是日外交政策的根幹，各政黨對這政策的根幹，不會有什麼變更。所以他們的異點，至多也不能超出這政策推進的方式。若就政策推進的方式而論，過去二大政黨之對華政策，民政黨比較政友會爲緩和，所謂幣原外交是代表前者，田中外交是代表後者，其他凡是右傾的政黨都是主張積極政策，左傾政黨的外交政策，則比較和平，不過這左傾政黨的勢力，在日本政治圈中，素極薄弱，尤其自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左傾政黨的勢力，被法西斯派消滅殆盡，即有一二尚得存在的無產政黨，亦都是仰法西黨的鼻息，而高唱其「滿蒙權益，應歸無產政黨。」所有日本無產政黨的對華外交政策，也不難在此處窺破了。

## 五 內田之軍服對華政策

九一八事變爆發於若槻內閣幣原外交時代，或者九一八事變可以說他破壞幣原外交的舉動，但是幣原仍欲於「事態不擴大」方針之下，維持他的外交生命。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日本政府所提出五大原則，內遭軍部的反對，外不容於國聯，遂致毫無結果，乃至錦州事件，釀



江事件，天津事件發生後，舉凡日本軍部的對華政策與幣原所聲明的「事態不擴大」的原則，愈趨愈遠，換言之，幣原外交的魂魄，已消磨於南陸相、金谷參謀總長、武藤教育總監三巨頭的軍人外交過程之中了。

取幣原外交而代之者，是政友會的犬養外交，不消說，他是田中外交的繼承者，他的對華政策的特色，就是主張急進積極武力侵略，他之不利中國，原在我們意料之中，我們看犬養外交的第一件成績，就是佔領錦州，繼錦州事件而起者有一二八上海事件，所以犬養的外交，已完全是代表軍人行事的。

上海停戰協定簽字了沒有幾天，日本國內發生法西斯蒂運動，犬養被刺，政友會內閣，因之瓦解，繼之而起的就是齋藤的超然內閣，齋藤組閣之後，經過許多接洽，才將原任南滿鐵道的總裁內田康哉拉來作外務大臣，內田作了外務大臣之後，其對華外交上的措置，全仰荒木陸軍大臣的鼻息，震關的強硬外交態度，甚至有駕三宅坂而上之之勢，所以內田外交日本人都呼之爲「軍服外交」，說他這位外務大臣，是穿着軍裝去辦外交的，這無非是表示他的外交態度強硬

之辭，從前幣原外交之主要人物爲永井松三（駐德大使）、吉田伊三郎（土耳其大使）、重光葵（前駐華公使）、佐分利貞男（前駐華公使在箱根自殺）、松島肇（駐意大使）此外如駐美大使出淵勝次，外務省歐美司長東鄉茂德，外務省通商司長武富敏彥，駐比大使佐藤尚武，駐英大使館參事齋藤博，都是傾向於幣原外交的人，或稱之爲傍系的「幣原閥」。而幣原外交中，尤以重光葵、東鄉茂德以及故佐分利貞男三人爲最重要的分子。構成內田外交的重要分子爲外務省亞洲司長谷正之與情報部長白鳥敏夫兩人，滿洲事件爆發的時候，日本外務省的主要人物都茫然若失，不知所措，獨白鳥、谷兩人起而打破幣原的「事態不擴大」原則，與軍部協議，變更外交的方針，一般人說幣原於九一八後所以驟變其態度者，也是白鳥和谷兩人的力量。

內田作了外務大臣，造成功白鳥敏夫和谷正之兩人的黃金時代，內田的軍服大概是他兩個人給他穿起來的，製造「滿洲國」退出國際聯盟，白鳥敏夫和谷正之兩人，都是幕後的重要的人物，而白鳥等何以態度如此強硬，則完全由鈴木貞一中佐，及陸軍部軍事課長永田鐵山少將兩人的關係，此外受政友會森恪的支持，其影響也不算少。本來日本外交政策的重心雖在中

國，而外交上的對象，則在歐美外交上的一舉一動，都視歐美各國的聲色，但經白鳥和谷正之所主持的內田外交過程之後，真的走到「自主外交」這條路上來，所謂「自主外交」者，表示在外交上不受任何一國的牽掣，換言之：日本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其他各國的態度，和國際間的種種輿論，都可以置之勿理，我們看內田外相笑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書，等於一張舊的留聲機片，他的漠視國際正義，由此可知。所謂內田外交的精神，也在此處赤裸裸地表現出來。內田時常告訴人說：我們的對華政策，不必拿什麼「生命線」，「自衛權」，「擁護特殊權利」等口號來作自己的護身符，或外交上的修飾辭，我們只管拿我們單刀直入的精神作去就是了，所謂「內田外交」，即是這單刀直入的外交。

## 六 結論

從前德國的俾斯麥以鐵血外交名於世，結果造成功歐洲大戰的慘敗，今日日本內田外交，和德國的俾斯麥外交，如出一轍。我敢斷定日本未來的危機於最近之將來，總會降臨的。中國呢？

似是這種過程中的犧牲者，但是所謂犧牲將犧牲到什麼程度，還未敢揣測。總之，我們此刻雖是他人的組上肉，然而只要自己振作起來，凡事沒有絕望的。我雖曾斷言日本的危機不久就會降臨，但我又何嘗忍言中國如老是醉生夢死，將來的危險恐怕有過之無不及呢！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作



## 廣田弘毅論日本外交之基礎

日本外相廣田著  
沈鍾鑿譯

### 一

現在推進帝國外交之要着，首在養成「滿洲國」之健全的發達，日本因一九三〇年（昭和六年）的滿洲事變，而到了一個大轉變的時期，故今日日本國民，應以世界大戰後歐洲各國，舉國一致努力戰後經營同樣緊張的精神，去擔負當前的大業。昔年關東大地震發生之時，人心的緊張，空前未有，而事過境遷，即漸形弛緩，試以最近情勢觀之，似有此種同樣的傾向，此點吾人實應下最大的戒心。

在社會上常常聽到「非常時」的呼聲，但處此非常時期的日本國民，應安心為國家富強而努力，首先援助「滿洲國」之建設，並實行經濟的提攜，以確立東亞和平的基礎，實為當務之急。

「滿洲國」若能走上健全的發達之途，則滿洲事變以來，使一時惡化的世界各國，在遠東方面，緊張的空氣，可漸次緩和，並使各國理解「滿洲國」之存在，為遠東和平上不可缺少之要素，從而逐漸增進通商的關係，進行對滿投資，而滿洲問題，自然可消滅於無形。

外交的基礎，總之須賴國力的充實，現代日本國民最應注意之事，即為明瞭日本的現狀，因此在此社會各方面，有再行加以檢討之必要。

試以農村現狀觀之，由來日本是被稱為瑞穗之國，年慶豐收，曩昔因積極開拓未墾之地，卒漸漸達到增加米產的計劃。最近因米產過豐，農村現狀却陷於困苦的狀態，這究竟是何種原因呢？如果農村問題，終為米價問題，則對於米價調節的米穀交易所，何以不加注意？

再以日本經濟界情況觀察，股份公司之運用，果為適當否，其中果無濫用法人資格之賦與，及有限責任之特權否？一方面獎勵國民勤儉貯蓄，而銀行中，常有休業及關閉，經營保險契約者，一遇保險公司的信用失墜，即困苦焦慮，甚至厭世自殺。更試觀事業界方面，雖有很大企業能力的新人物，然因資金缺乏，終不能有所作為。

復觀社會狀態，現在日本有多數從學校出來的畢業生，都得不到職業，日鑿多數國民失業之憂慮，又將如何解決呢？

又日本四五十年來，均採用歐洲的議會制度，近來有識之士，發表種種關於國家問題者，頗不乏人。假使其人是屬於某黨派的國民，必視爲這是「某會人物的議論」，或視爲「那是某黨人物的意見」。諸如此類，這種現象，誠不無遺憾。從前明治大帝所詔示的五條誓文，「使官武一途，庶民各遂其志，俾人心不倦」，又「廣開會議，萬事可決於公論」，即在表明廣攬天下之人才，使聽多數的意見，以實行政治爲旨趣。帝國的憲法，亦係依據此旨趣而制定的。關於人材登用的方法，帝國議會議員的遴選，另設選舉法規定，按選舉一語，出於論語，舜承堯之天下而後，對於用人，有「衆舉選某某」……；這豈非選舉一語的原始。現在的選舉法，以廣攬人材拔選舉用爲原則，蓋本此義。日本所採用其他各種西洋的文物中，因玉石混淆的結果，亦可看出有不適用於日本的。今後如再檢討日本現狀，應留意此種分別。又如以日本文化介紹至西洋時，應使西洋人曉然日本如何能採取西洋的長處，而消化發達才好。



二

余（廣田自稱）就任外相以前，曾充駐荷公使及駐俄大使。荷蘭爲最安定的國家，蘇俄則今尙在試驗中的國家，人類社會的演進，可以此爲兩中心點，余竟得研究的機會，誠大爲有益，余前駐荷時，因得該國民之教訓不少，今環顧日本國內的現狀，每一回想，頗覺痛心，茲略述在荷蘭任時感想如次：

荷蘭面積，尙不及日本九州之大，但有巨額的貿易，在歐洲亦足稱爲經濟上有力的國家，且於太平洋擁有較本國尤大的殖民地。雖僅人口七百萬一小國，其國民的孜孜不倦，介於英、法、德三大強國之間，毫無遜色。目擊該國國運發展的現狀，每一回顧祖國，輒痛感在東亞孤島的日本，沒有得到地理上的天惠。荷蘭頗多幹練有爲的政治家，例如內閣總理，沒有自備的汽車，某總理到署辦公，竟以腳踏車代步，其生活之樸實有如此者。所以荷蘭的政治家，極爲人民所尊崇，且政治家治理公務甚勤，且極負責任，官民相處如一家，以質樸剛健爲要旨，毫無奢浮的習尙。

今舉荷蘭政治家崇尙實際的一個例子，前荷蘭內長加寧氏，曾任內務次長十餘年，當前內閣成立時，女皇再四懇其就任內長，加寧氏固辭不獲，乃就此重任。但在就任之際，提出二個條件：第一，彼任內長時，因已熟知次長的事務，可毋庸再設次長。第二，內閣更換時，彼須辭內長之職務，而仍返任次長，留於內務部。其後內閣更迭，加寧氏終得遂其志願，仍返任現內閣內務次長職位。即此一例，已足證明荷蘭政治家的崇尙實際。荷蘭位於歐洲的中心，雖深受諸文明國家的刺激，而全國國民均能以沉着堅持的意志，打破任何國難。在十六、七世紀的時候，荷蘭曾握世界海上的控制權，其所以能雄飛於世界，亦即此故。

### 三

予在駐俄大使二年的任期中，得以莫斯科為中心，研究新興蘇俄種種的機會。若單從主義及五年計劃或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數字，而觀察蘇俄，則完全是謬誤的。因為數字與主義，都是抽象之物，是以循此而欲察知蘇俄的真相，誠莫乎其難。然欲知蘇俄，不能不着眼於現實，以觀察其

實體；欲知蘇俄的實體，更應明瞭蘇俄是擁有由侵略主義家羅曼諾夫所佔領的全世界六分之一的領土，以及一萬萬六千萬不同人種的龐大國家，同時根據其民族史，以觀察其過去迄今的變化爲必要。

蘇俄因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而成立了新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但仍沿用昔日的舊組織，以實行新思想的社會主義，兩者的調和，是否可能，尙難逆料。

斯拉夫民族的性格，頗爲溫和，羅曼諾夫嘗用壓力統治之，但赤俄在俄羅斯政治的實體，從未變化，赤衛軍仍擁有龐大的勢力。若自單純的馬克斯主義而言，軍備應全行撤廢，而蘇俄對此，並未中止其野心。

斯達林氏掌握政權後，即轉向於一國的社會主義之實現，如齊諾維夫、布哈林等企圖世界赤化的第三國際派的人物，皆已宣告失勢，此愈足證明蘇俄並未以馬克斯主義實行政治的鐵據。現在蘇俄的首領，均在建設國家的意念之下而努力。最近日本共產主義者的轉變方向，實不外以蘇俄的現狀與態度爲轉移。

並且蘇俄的將來，無論是在思想方面，政治方面，均有數度激烈的變化，這是我對蘇俄的一個根本觀念。

馬克斯在倫敦寓所構思的主義，實際上是能否適用，由蘇俄現狀觀之，已足代為說明。蘇俄目今正努力於產業的發達，將來其產業的中心人物，結果必占支配者的地位，再經若干年之後，或將變成產業的封建制度。各產業的領袖，決不許以產業占為私有，但其結果，必得掌握永久經營的實權。蓋在蘇俄，經濟即為政治，並無政治家之名，共產黨員即為政治家，結果經濟的實力，將集中於政治支配者之手。

#### 四

以蘇俄與隣邦的中國試一比較，實一甚有趣味的對照。中國本為家族本位的國家，東亞式之縱的文明，極為發達，軍人政治家各割據一方，而一般人民對於軍人與政治家之衝突，雖患亂類仍均漠然不甚關心，一若與個人生活毫不發生聯繫的關係。反之，蘇俄國內之西洋式橫的文

明，頗爲普遍。尤其近年來根據其五年計劃，統制國家產業的組織，全國一致促進計劃經濟的完成。

日本在德川時代，「火災」稱爲「江戶之華」。（註：江戶爲東京舊名，德川時代曾起大火，故現在日人仍沿稱火災爲「江戶之華」。）然當時各家均有井，可以防止大火之蔓延，邇來因歐西文明勢力之浸入，始有自來水、煤氣、電氣等設備，於是水與燃料、電燈之供給，乃爲日常所必需，頗感便利。但當昔年關東大地震發生之時，所有布滿各地之水管、電線，均被震斷，釀成江戶時代所夢想不到的大慘禍。

是故吾人不可不知，由於橫的、文明、制度、發達之地，如政治上、經濟上、發生變化，其影響較之昔日，必更有過之。

余於一九三一年（昭和七年）十一月，因駐俄任滿，奉令歸國，以極關心的情緒，瞻望祖國現狀，而踏上了本國國土，第一使我發生感慨的，即日本青年的驕氣橫溢，自負不凡，有動輒與人爭鬥之狀。究其原因，良以日本國土狹小，加之人口增加，不論政界或財界，以及社會各方面，對於

後進者應有活動的範圍，都異常狹仄，此種情形，必使青年大失所望，而國家的前途，亦殊堪憂慮。更以一般青年人在各方面的活動加以剖析，若不使青年們有一種希望，則於國家的進步，豈非有所阻礙嗎？這當然是很可慮的。

## 五

綜觀內外的情勢，今後日本應走的路線有三：（一）在經濟上，股份、公司、運用的改訂；（二）政治上，政費的節約，議會政治的改善；（三）外交上，切實謀中日「滿」三國的提攜，以確立東亞和平的基礎。因此對於日本社會一切的現狀，有重加以檢討的必要。此種國策的實行，不能不有待各方面的人材輩出。際此非常時期，對於有爲人材的網羅，其爲迫切，在日本外交界，如已往小村、齋藤、山座、圓次郎、加藤、高明、伯、諸氏的人材，非常需要。

自信及國家觀念極強的小村侯爵外交官，堪稱傑出，現在日本這種人材，極感缺乏。該氏締結樸登、芬斯條約歸國之時，國民對於這位英明有識的外交家，未嘗感謝。然至今思之，小村氏能

與蘇俄鐵腕外交家威特氏折衝其間，得締結此項條約，追懷往昔，愈覺小村侯爵的偉大與不凡。其次山座圓次郎氏，亦是一位偉大的外交家，余曾受其訓誨，不幸這幹練有為的外交家，夭折其年，沒有給他充分發揮能力的機會，實在是非常扼腕！山座氏曾任政務局長，輔助小村外相，應付外交難局，其苦心決非一般所能及。迄今思之，猶覺悲從中來。加藤高明氏，亦為外交家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前任駐英大使時，余亦供職使館，同赴該國履任，得親仰其豐采，因此得知加藤氏是具有偉大的人格及外交的手腕，確可使人敬服的。

## 六

滿洲事變，在前年九月十八日突然爆發了，但事的起因，必有所由來，而其影響所及，自亦非常重大。日本國民，今後對於「滿洲國」的將來，已負了一種重大的任務，這種任務，非全賴日本國民努力完成不可的。

總之，日本今後對華、對俄、對美、對英的政策，決不離開滿洲問題為中心。

對英，對美外交的要着，有在緩和兩國的輿論，以求該國國民充分的瞭解。

日本在國際方面，絲毫無感覺不安的必要，更無須恐懼，這些是不值憂慮的。所謂非常時期，不過係國家興盛時一種磨折而已。

政治不必向理想方面勇進，要在對於現狀，施以適合的改革，決不是一蹴可成，必須徐圖改革，方爲有效。

現在是日本全國國民力避抽象的論爭，而應努力具體的改善的時候了。（載日本中央公論一九三四年一月號）

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譯於上海





## 蘇俄之外交政策

楊幼炯

### 一 緒言

蘇維埃俄羅斯是構成蘇維埃聯邦主要的國家；蘇維埃聯邦是近世一個特殊的組織，與現代普通的聯邦國家不同。因為蘇聯不是幾邦聯成的聯邦，而是兩個聯邦共和國和四個單一共和國聯成的聯邦。依據聯邦憲法第一條規定：外交，對外貿易，郵電，交通，陸海軍這五項不但由中央規定方針，並且由中央各該委員會直接指揮與直接管理。但是在實際上蘇聯中央常務會議中委員的人數，蘇俄占絕對的多數，能任意處理全聯邦的一切政務。所以名稱上雖為蘇聯，而蘇俄實為蘇聯之核心，其他各共和國不過附屬於蘇俄統治之下，以成功全俄的統一而已。所以本文所論的雖然是蘇俄的外交政策，但是也可以作為蘇聯的整個外交政策看。近來日俄形勢異常緊張，對於俄國歷來的外交政策，國人應有明白認識的必要，特撰此文以論之。

要論述蘇俄近十餘年來的外交，並不是很容易的事。蘇俄自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後，在內亂外患掙扎中的外交，全是以環境的變異與經濟情狀的改觀而轉移的。我們要敘述蘇俄的外交政策，決不能憑吾人主觀的臆斷，而應以他的客觀事實，作為我們論述的基礎，這樣才能說明蘇俄外交政策的真諦。

蘇俄的外交政策，是建築在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策略之上的。他的政治組織，既和一般的國家不同，她的外交政策，更全然是在打破普通的國際關係之傳習。所以我們不能拿一般的國際法上的基本觀念來說明蘇俄的外交。換言之，蘇俄的外交政策，實有她的特殊之點：第一，蘇俄外交政策的背面，是有她特殊的使命，她的外交上的根本計劃，在引起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企圖蘇維埃政治的普及。所以蘇俄一方面企圖世界革命的爆發，他方面又在謀鞏固蘇俄政府的地。其次，蘇俄的外交政策，又根源於她的經濟上特殊的地位。她與各國的關係，常因其特別的經濟狀況而改變的。在革命之初，俄國經濟在國內是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在國際又是處於受列強封鎖的地位。所以蘇俄外交政策第二個目的，就在以種種退讓步驟，與各資本主義

的國家合作企圖獲得經濟上的援助。但是近年以來，蘇俄五年計劃漸次完成，已使其整個的外交政策起了變動，而摒棄國外經濟之接濟。十餘年來蘇俄外交政策之改變，全是以上述兩種爲根據的。

本來蘇俄如果要促成世界革命，單獨一國實行共產主義，必不能永續存在，必須全世界共同實行，才可以保證成功。所以在革命之初，列寧便決定了西進的路向，採取「赤白不兩立」的外交方針。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國家與社會主義的國家不能並存，或是前者白化後者，或後者赤化前者，二者必居其一。」列寧政府所以有這樣的決心，也是因爲當時環境的壓迫，勢逼處此。因爲俄國自革命後，不久即遭受列強的封鎖，所謂「二十四國的白色聯合軍」四面包圍，赤色的蘇俄，當時幾有被強逼白化的形勢。同時國內又內亂蜂起，列強更扶助反列寧的勢力，爲推翻蘇俄政府的企圖。列寧政府遂抱定「先清內亂，再講外交」的宗旨，以謀其勢力的鞏固。迨後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之間，蘇俄政府既將境內各反對勢力先後消滅，內患既平，蘇俄政府便進行其向歐洲西進的策略。這種策略最初表現的，就是一九二〇年蘇俄與波蘭的戰爭。波蘭本

與德國爲鄰，若能取得波蘭，德國也不難就範，則歐洲的社會革命之成功，便易如反掌。但是等到蘇俄的軍隊，在波境敗退以後，蘇俄政府所籌劃由西向歐洲，以完成世界革命的計劃，也因受了一個極大的頓挫。加以匈牙利、德意志共產革命失敗，第三國際所企圖的計劃，無一成功。因是不得不決定了退却的戰略，捨棄強襲作戰的手段，而採用持久作戰的方法。此後對於列強的外交政策，注重於與各國通商及承認兩大問題。

俄國在經濟上與各國的關係，非常重要。俄國南部的氣候與北美南方諸洲相同，宜於種植。其餘各地盛產毛革、油類、糧食，而林木及鑛產、煤鐵、銅、鉛等產類亦富。歐洲各國都視俄國爲供給他們原料的外府；同時俄國除西伯利亞沿鐵路及數河流一帶外，其餘都沒有開墾。革命以後，需要外來機器與投資，而資本之接濟尤爲急需，於是俄國又變成了列強貨物銷售的唯一場所。在這種情況之下，蘇俄的外交政策完全是以她的國際經濟政策爲背景的。而列強對俄國問題，因其利害關係之不同，意見極不一致。英國因爲從俄國可以購得大宗的原料，銷售大宗的商品，所以願意承認蘇俄。法國因戰前對俄投資獨多，俄國既不承認其舊債，法國的損失很大，所以法國

仍持強硬政策，法既助波蘭以抗俄，復與政策相同的日本，在制俄的總目標上聯絡，締結日法密約。歐洲列強在戰後的十年中，無時無刻不是在謀聯合一致以制俄。一九二一年列強在基諾亞（Genoa）與海牙（Hague）所召集的兩次國際會議，可以說是歐洲列強對俄外交動作的中心。這兩次會議除一部分爲改造歐洲經濟問題之外，大部分是列強協同討論對俄問題，而其主要的目的，就在使蘇俄政府在經濟上屈服於列強某種條件，甚至某種要求之下；更藉承認蘇俄問題爲承認外債與退還私產的要挾。在當時列強本想用種種手段，於折衝樽俎之間，使俄國承認一切的要求，但其結果不獨不足以脅蘇俄，反使蘇俄巧妙的外交政策，得以操縱於歐洲列強之間。

## 二 蘇俄之對歐外交

蘇俄政府對於歐洲的外交政策，是用分離的手段，以促起列強間的鬥爭。本來各國政府對於俄國雖有共同的利害，而隨時引起各國相互間經濟上政治上的傾軋，還要比這個共通利害

更、大、而、且、深。利害的共通是表面的，相互的傾軋則是實質。因為互相傾軋的結果，列強反各有與俄國結合的傾向。一方面以俄國為共同的敵國，而籌劃共同戰線；同時他方面又為勢力均衡起見，利用俄國與之結合。俄國看透了列強的弱點，利用這種傾向，以打破歐洲列強共同的戰線。自從基諾亞會議與海牙會議之後，列強對俄意見，不相融合，已早無可諱言。他們便各拋棄共同交涉的方法，由各國資本家單獨與俄國進行協議，以謀獲得新利權。俄國也正乘列強的分離，可以操縱其間而求取外交上的成功。

俄國分離歐洲的外交政策，首先在聯德，以抵制歐洲列強對俄的壓迫。俄德兩國在戰後同遭列強的侵迫，是由患難而結合的。加以在經濟上德國欲恢復本國國民經濟和保障其國家的安全，除在歐洲大陸與俄國聯合以外，別無他路可走。而俄國適當處於國際孤立的地位，國家的生產，既不免於過滯，非得到一個切實能夠幫助的德國不可。德國是產業先進國，人材機械，都是非常豐富，俄德的結合，實足以對抗協約國的控制而有餘，這可算是俄國外交家高妙的手段。其次，俄國分離歐洲的第二策略，就是與英簽訂通商協約，此是蘇俄外交上最得意的政策。俄國欲

打破歐洲列強的協調，不得不用「擒賊先擒王」的手段，先與歐洲列強之霸主的英國結合，其他各國自不難一一就範，所以當時俄國外交部長齊采林（Chicherin）說：「英俄協約可以作爲蘇俄將來與其他各國訂交的基礎。」其用意如何可想而知。至於英國所以亟亟與俄國恢復邦交者，別有原因在，其中顯著者，是因爲英國的製造品，缺乏銷售的市場。按戰後英國在美洲及東方的市場，大半被美國奪去。在中歐大陸，又因經濟生活困難，購買力缺乏，英貨未能暢銷。因此戰後英國產業界衰落不堪。加以工業停滯，失業人數日益加多，成爲最緊要的關頭。英國要想解決這種困難，就只有有在復興的俄羅斯的廣大市場上，求推銷其大宗的貨品，這是英俄恢復邦交的重要原因。自此以後，先後獲得意法日各國的承認，使蘇俄在過去的十年中，得以恢復前俄國在國際上的地位，這不能不說是蘇俄政府「打破歐洲列強協調」的外交政策之成功。

自從一九二四年「徐諾維夫（G. Zhinoviev）的書函」事件發生後，對於俄國與歐洲列強的外交上又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所謂「徐諾維夫的書函」事件，據說是莫斯科第三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徐諾維夫致英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封信，英國保守黨內閣便藉口



這封信是煽動英國臣民，顛覆現政府，實係有意干涉英國內政。俄國雖竭力抗辯說是假造的，但無效果，卒使英俄國交發生破裂。自英俄絕交後，法國方面又因俄國駐法大使頓戈夫斯基（Rakovsky）署名於「對無產階級市民宣言」事件，法俄的關係又日趨於惡化。歐洲各國對俄的態度一向是唯英法馬首自瞻，此次歐洲列強又以英法爲主動，重新建造對俄的聯合戰線。在這種情勢之下，俄國的外交，又處於極危險的地位，對於列強的聯合戰線，自然圖謀破壞的方法，不然蘇俄政府本身，就將陷於極危險的境地。所以凡是資本主義各國間的聯合行動，蘇俄必設法破壞。當一九二五年保安公約將簽字的時候，蘇俄政府認此次公約，是歐洲列強相互諒解的一種結合，無論如何，是不利於俄國的。因此，俄國於一九二六年與德國締結中立條約，此項條約也是蘇俄對於英法列強的一種威脅的表示。

近年以來，俄國對於歐洲的外交政策，是軟強並用的政策。對於外交處處用軟化的手段，來謀與各國拉攏。一九二九年英俄邦交的恢復，使俄國得以回復其西方外交的地位；去年俄與法有簽訂攻守條約的醞釀，俄與波蘭又有互保條約的談判，這在俄國外交上是一種新的努力。同

時對於軍事方面，更積極進行。蘇俄政府雖數次宣言，主張裁撤各國全部的軍備，在日內瓦的俄國代表，更提議激底的縮減軍備案。但是這祇是蘇俄的一種表面上的文章，實際蘇俄軍事之準備，近年來更趨積極。在國境各地設置常備陸軍、兵士及軍官，約計六十萬，同時嚴重警戒國境及鐵路，為戰鬥的準備，於此可見蘇俄外交之強軟並用的政策了。

### 三 蘇俄對亞之外交

蘇俄政府的外交政策，西進向歐洲的發展，既如上述。今試進而論述蘇俄政府在東方的外交政策。東方是弱小民族的棲息地，是工商業國消費投資的場所，又為列強殖民政策實施的根據地。蘇俄政府在東方的外交，就在利用東方民族，從事背面的攻讐，以完成她世界革命的使命。斯達林(Stalin)對於東方外交政策的目的，有很具體的說明。他說：

「帝國主義猶如一件物體的兩面，西方是這物體之正面，東方則是這物體的反面。我們進攻的路線，無論是正面或反面，但其結果都是一樣的。我們如果能夠煽動殖民地的民

族起來從事於反帝國主義的運動，這簡直是截斷帝國主義的後方，使他正面大受影響。到了相當時期，便可以變管齊下，前後一致進攻，結果使帝國主義的大本營歸於覆滅。」

斯氏的話已經把蘇俄東方外交政策的用意，很露骨的說出來了。

蘇俄、東方、外交、政策、最大的、目的、在、剷除、英國、在、東方、的、勢力。因為英國是帝國主義的霸主，在東方領有印度波斯埃及各民族的統治權；並且把中國及土耳其阿富汗等地劃入其勢力範圍。所以俄國假使能取得印度、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或中國的聯絡，可以滅殺英國在遠東的勢力，動搖資本主義祖國的基礎。蘇俄這種政策的成功，最先是在土耳其。自大戰停止以後，德國在近東的勢力，既已開始破壞，變為英國獨霸近東的形勢。土耳其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完全陷入英帝國主義者掌握之中。當時英國的政治家，想乘戰勝的聲勢併吞土耳其，卒因基瑪爾將軍與所領率的安戈拉政府的軍隊，經四年的血戰時，把大不列顛帝國的代理人——希臘——在士麥拿以上的勢力，掃蕩無餘，而獨立建設新政府，造成土耳其在國際上的新地位。蘇俄政府想乘這個機會，在近東打退英國的勢力，首先聲明君士坦丁堡須歸土國所領，有博得土耳其人的歡心，使

歷史上的敵人，一變而爲良友。一九一八年與土耳其結「回教解放同盟」。一九二一年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更與蘇俄結重要的條約，宣布廢除國際帝國主義一切強姦三國的條約。一九二一年三月莫斯科政府與安哥拉政府正式締結俄土同盟條約，俄土的聯盟告成，是蘇俄在東方的外交政策第一次的成功。

同時蘇俄的東方外交政策，在中東方面的進行，尤見猛烈，而以波斯阿富汗爲中心。蘇俄政府對於波斯，起初是在鼓勵波斯的革命，以企圖顛覆波斯親英主義的政府，結果由賽特謝（S. S. S.）組織內閣，放棄英波條約，於一九二一年在莫斯科締結俄波修好通商條約。在這條約中，俄國放棄了在波斯的許多主權，以換得一種軍事同盟。一九二七年更成立俄波中立保障條約，更增加了俄波在中東外交上的聲勢。其次蘇俄又由波斯侵入阿富汗，想由此煽動印度的獨立運動，以狙擊英國的要害，這是俄國外交上最重大的政策。本來阿富汗自一九一九年國內的親俄派成功以後，接着一九二一年俄波條約成立，於是阿富汗又變爲蘇俄進攻印度的前哨地。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俄國在阿富汗的勢力，逐漸增加，一九二六年更成俄阿協約。英國

從十九世紀到二十四世紀經過了三次大戰所培植的勢力，幾乎根本消滅。俄國的勢力，並且有由阿富汗侵入印度的傾向，使印度邊境直接感受了蘇俄勢力的脅迫。

蘇俄的東方外交政策，本是以印度爲中心點，他除計劃從近東中東方面以壓迫印度外，更大興軍事，圖謀侵略，特在土耳其斯坦訓練軍隊，又在阿富汗募集兵勇，在薩羅文康特設立宣傳學校。一九二五年夏季已有九百印度人及五百阿富汗人卒業。又有赤軍在阿富汗設置輸送機關及聯絡機關。他們對於攻擊印度一事差不多已完備周密。但不幸他這個假道阿富汗攻擊印度的計劃，終於不成，這是因爲一九二一年夏季以後，國內發生饑荒，並且有許多事務牽制他，不能專心於東方政策。而且英國統治印度的政策，非常老練熟手，對於經土耳其阿富汗波斯而侵入蘇俄勢力，時時加以警戒，因之蘇俄對於印度很難有多大的發展。

總之，蘇俄的東方外交政策的第一着，即在從近東與中東方面謀滅英國在東方的勢力，以進迫印度而動搖英國在東方的地位。蘇俄勢力由波斯阿富汗南下，其勢汹汹，對於印度有直接威脅的局面，這種險惡的情勢，是英帝國主義者萬難坐視的。於是英國外務大臣於一九二三

年向蘇俄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要求蘇俄撤回駐波大使與駐阿大使；同時更向阿富汗政府發了一道最後通牒，對於阿富汗政府大加恐嚇，結果仍舊歸於失敗，反因之促成了俄阿兩國的接近，訂定俄阿協約，使蘇俄政府對於阿富汗的外交政策，到了一九二六年可謂成功。

蘇俄在近東與中東的外交政策，既經如此；而她在遠東的外交政策，就是以我國爲中心，日本，便成爲她在遠東外交上勁敵。俄日的外交，始終是反覆無常。俄日交涉的開始，不可謂不早，其會議的次數，也不可謂不多，自一九二二年以來，由大連會議，到長春會議，又到東京會議，以至北京會議……這種種會議，所以不能成功的原因，實因日本當局始終沒有改變「仇俄」的觀念，日本常自詡爲天皇萬世一系的君主國家，其畏懼俄國的宣傳，較他國尤甚。加以日本與俄國所結的條約，有樸茲茅斯條約，即日俄戰爭後之媾和條約，可謂日本以鐵血換得者。漁業條約也是日俄戰後所訂結的。日本在俄國境內得有四百三十漁區，投資額已達三千五百萬元以上，對於日本水產上極爲重要，所以不願放棄帝俄時代所得的權利，因此之故，日本對於俄國始終保持強硬的態度。

蘇俄政府的對日外交，始終是一種「拉攏」的政策。她所以要拉攏日本的原因，不外兩種目的：第一是與日聯合，以共同處分滿蒙問題，以求控制我國；第二是俄國企圖與日妥協之後，足以牽制列強在遠東的勢力。所以一九二四年的日俄協約，經二年多的醞釀，卒以俄國讓步，宣告成立。協定的大綱大多是照日本方面所主張而定的。其中庫頁島利權問題，撤兵問題及禁止宣傳問題，素稱爲日俄交涉的難關的，俄國政府都照日本政府的要求予以接受。俄國所以這樣讓步的原故，就是因爲國際情形突變，對俄險象環生，所以不得不委屈求全，以促成日俄邦交之早日恢復。自日俄協定成立後，各國列強均以日俄條約不僅是關於經濟的協定，實爲日俄聯盟，且是進而爲日俄德大聯盟的先聲。自此以後，俄日兩國因地域的接近與供給上的密切關係，兩國間貿易非常發達。雖然兩國的糾紛時起（如漁業權利的互爭），但常因雙方讓步，而不致釀成軒然大波。

近年以來俄日兩國對於滿蒙的侵略，各趨積極，日俄的提携，更增加其程度。俄國在最近四五年中，在遠東的外交，採取消極的急進政策。不僅集中目光於我國的外蒙，且有亟亟南侵內蒙。

的、傾、向、而一九二九年的中東事件，蘇俄更顯露其對華政策之積極，企圖以武力攫取中東路的主權。在這次事件中，我們尤可以看出俄國聯日以控制我國之計劃。俄國欲以中東路爲對華宣傳中心，以爲對華施行各種侵略的工具。而在日本方面因中東路在經濟上，運輸上與她在南滿所經營的鐵道有密切的關係，兩國對於該路的意見，大有接近的可能，於是乃有採取共同行動。中東事件發生之後，俄國便以恐嚇爲手段，立即添加軍隊於中俄邊境，二次通牒與中國絕交後，使正式召回在華使領，並聲明斷絕中俄交通，其結果乃有一九二九年九月蘇俄大舉進攻我綏芬與滿洲里兩路之事。這次事件發生後，已顯然表示其對華強硬的手段，同時日本在南滿的軍隊更向北移動，希圖乘火打劫，這已經證明俄國在中東事件中，對日本已十分的妥協。近來日本在東北的暴行，已有侵略北滿的形勢，使俄國不得不增兵邊境，集中糧秣，以爲之備。俄日的妥協，幾有破裂之象。但是事實上俄國一時絕不至與日破裂，在她國內經濟基礎未完全鞏固以前，對歐的合縱連橫的外交政策，未十分順利時，俄國必不致輕動干戈，向日開釁。因爲蘇俄在遠東的外交政策，儘管面目猙獰，但表面上仍不得不以和平爲號召。



#### 四 蘇俄外交之特徵及其趨勢

關於蘇俄政府十餘年來的外交政策，已簡略的加以歷史的敘述。我們此刻所要注意的，就是他的外交政策的背面與特徵，都與一般國家的不同：第一，蘇俄的外交，是一種二重的外交。所謂二重外交，就是蘇俄政府對各國的外交政策與第三國際在各國的活動是互為表裏的。換言之，第三國際在各國的活動，是以蘇俄的外交政策為掩護的。蘇俄政府與第三國際的關係，到底怎樣，這是我們應該知道的。我們通常以為第三國際與蘇俄政府，當做一個東西，實際他們真正的關係，恰如堂房兄弟一樣。組織蘇俄政府的分子與組織第三國際的分子，雖有不同，因為在第三國際裏面，還參加有別的國家的代表，但是蘇俄的共產黨在第三國際裏，實有很大的勢力。俄國共產黨派遣到第三國際的代表，實施最有利蘇俄國的政策，因此第三國際無異是蘇俄政府的委託人。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斯達林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中，提出共產黨曾經這樣說：

『我想本黨的工作，以他的意義爲標準，可以說有兩方面：第一方面是在我們的世界革命運動；第二方面是在蘇俄政府的外交政策。什麼是國際的工作呢？那不外第一鞏固在西歐的共產黨，然後用他們的力量，征服勞動階級內的多數黨。第二鞏固西歐職工同盟的團結，使俄國的無產階級與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增加友誼。第三鞏固本國的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聯絡，因爲他們在解放的立場上無異是我們的同盟。第四使本國的無產階級得到勝利，征服資本主義的分子，因爲非如此不能達到世界革命的成。……本國的共產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基礎……』我們由此可以看出蘇俄政府與第三國際實際是採取連環戰略的方式。

這種連環的二重的外交，對於資本主義的國家，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在英國方面曾於一九二四年因爲第三國際的代表在英國的活動，使英國當時保守黨的政府，得到口實，廢棄英俄間以前一切外交關係，後來雖得恢復兩國邦交，英國政府始終惴惴於第三國際之宣傳。美俄關係之所以遲遲未能恢復邦交，其最大的原故，仍是由於蘇俄未能接受美國「停止在美國作共產

活動」的要求。一九三〇年美外交部發表第三國際首領徐諾維夫給美國共產黨的命令，除詳細的開示組織革命團體的方略外，並且贊揚美國共產黨工作之成功。這使俄美兩國將成的邦交，不得不依舊保持斷絕。但是我們以為英美各國一再要求蘇俄放棄共產黨的活動，放棄蘇俄與第三國際的二重外交，其實都是不明瞭俄國外交之背面。蘇俄政府，第三國際與共產黨可以說是三位一體，這三個組織是構成有機的關係，如何可以分開呢。

其次，蘇俄政府外交政策的第二個特徵，就是曲線的外交，虛偽的外交，他的外交政策，是光怪陸離，變化莫測的。蘇俄外交政策主要的特點，與其成功的原因，全在他能運用牠的詭異的外交。蘇俄政府看透了帝國主義的心理和弱點，採用詭異的虛玄的外交方式，使帝國主義的列強，受蘇俄的玩弄而不自知。她一方面打破現狀，漠視國際的規則，取消國際條約，否認國際債務，可是在他方面牠又以偽善者的態度，裝起和平的面具，宣言維持現狀，使帝國主義的列強，莫知其真意之所在。她在歐洲正與英國謀親善謀恢復邦交的時候，而在東方，却煽動東方弱小民族，攻擊英帝國主義者在東方的勢力。這種聲東擊西的手段，是過去十年中蘇俄在歐洲的外交成功。

的總訣。我們認定蘇俄這種詭異的外交政策，是對付帝國主義列強最有效的手段。帝國主義列強的外交政策，向來是以強硬的、壟斷的、簡捷的手段，而蘇俄則對以偽委的、延宕的、不可捉摸的方式，結果使帝國主義不得不陷入蘇俄的圈套，與之締結邦交。在過去十餘年中蘇俄之所以能回復其國際地位，全是由於其在外交上玩弄虛言的成功。

再次，蘇俄的外交，表面上雖高唱和平，但實際上，她未曾忘却「外交以武力為後盾」的策略。蘇俄政府於一九二七年向國際聯盟的裁兵預備委員會，提出各國立時撤廢全部軍備案，內容狠是娓娓動聽，看來似乎非常和平，而實際蘇俄的軍備，無時不在拚命擴充，她的外交政策的後面，還隱藏着雄厚的武力。俄國代表明知此種極端的主張，決不為列強所採用，不過故意宣傳，藉以為主張和平的幌子而已。自一九二七年英俄絕交以後，蘇俄政府對於軍事方面，積極準備進行。尤其是一九三〇年中東路事件，蘇俄的軍事行動，更見猛烈。近年來蘇俄無時無刻不是在做對外軍事的準備。全國舉行所謂「防衛週」(Defense Week)採行義務徵兵制，其常備陸軍士兵及軍官約計六十萬，曾受軍官訓練的後備兵，則達六百萬。一九二八年蘇聯人民軍事委

員會正式宣布，俄國可於下動員令後二星期內徵發陸軍二百五十萬人。可知蘇俄政府是時時在備戰之中，現在日俄在我國東北情勢已日益緊張，將來蘇俄在東方的政策，受到日本阻撓時，終有破裂的一天。最後，我們應該注意的，就是蘇俄幾年來的外交政策，已趨於有計劃的一方面。自一九二八年蘇俄政府開始實施所謂「五年計劃」，這種計劃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在增進生產，以求達到經濟上自給自足的地位，牠是想鞏固本身的經濟地位，同時更積極進行對全世界革命的宣傳。在這裏我們知道蘇俄的外交政策，在經濟方面，已走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新時期中最顯著的特點，就是蘇俄政府，從前以宣傳與外交的方法，求各國承認，並冀得各國經濟上之合作，現在已放棄了這種政策。牠現在着重於經濟上的自保政策，求使一切生產的基本原動力，如土地、鑛產、工廠、鐵路等，得循一有系統的科學的軌道前進，俾蘇俄得一躍而為工業國，以奠定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她這種經濟政策，足以促進她的外交政策向新的方面去發展；她並未絲毫放棄她的世界革命的策略，前年在里卡（Riga）搜獲共產黨員的祕密文件，內有第三國際鼓動世界革命的五年計劃，其中的內容怎樣，我們無從知道，但至少是與蘇俄經濟的五年計

劃同時並進的。蘇俄的經濟的五年計劃的目標，不僅在消極的經濟自保，而且生產率增加的結果，必以其節省消費所得的產品，賤價銷售於國外，足以招致世界市場的不安，使資本主義的經濟的騷動，日益增加；而第三國際的鼓動世界革命的宣傳，更將依其所謂「共產革命的五年計劃」與蘇俄經濟的五年計劃，兩相呼應，向世界各國極力進展。則今後蘇俄外交政策發展，更足以驚人。我國處此時會中，更當國難方殷，日俄在東北情形緊張之際，應該有一相當應付的方策，才能避害趨利。否則遠東戰禍勃發，影響於中國民族整個的生存，實在是非常重大。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日上海



## 蘇俄外交政策概述

徐公蘭

### 一 蘇俄革命的外交政策

一九一七年蘇俄革命成功，共黨執政，即宣稱：（1）即時媾和，（2）民族自決，（3）放棄舊債。蘇俄彼時外交，蓋充分表現共產革命之精神，而一反從前帝國時代之政策，蘇俄憲法曾規定：「爲了要抑壓有產者廢止人對人之榨取，並爲實現無階級區別無國家權力存在之共產主義，而保證無產階級之獨裁。」欲謀無產階級之獨裁，非推翻資本主義之國家，造成世界革命，決難得到最後之勝利。故列寧曾謂：「沒有世界革命的支持，無產階級的革命是不能勝利的。」列寧又謂：「蘇維埃聯邦要想和帝國主義諸國家永續地並存於世界之上，這件事是不可能的，然則結局究竟那一方占勝利呢？這是祇能由於兩者間之衝突來決定的。」可見世界革命不僅爲蘇俄之一種外交政策，亦且爲蘇俄國內革命成功之條件。故蘇俄於一九一八年即通告各國



沒收外國私產，廢棄舊債。其時歐美各國，因受歐戰之影響，國內民心浮動，經濟疲弊，蘇俄乃乘此時機，向各國實施共產宣傳，策動世界革命之進行，第三國際執行委員長李維諾夫且有「一年以後全歐將被赤化之波所捲入」之豪語，各國對此赤化運動之威脅，堅決抵抗，初則與蘇俄斷絕邦交，駐俄各大使相繼被召歸國，繼且聯合日、美、英、法、意軍隊，行使武力干涉，實施經濟封鎖，蘇俄外受列國之威脅，內感白俄之騷擾，加之生產低落，經濟破產，不僅世界革命事實上已無成功之希望，蘇俄政府亦且有不能維持之可慮，然蘇俄處此內憂外患之時，尚於一九一九年進兵波蘭，作最後之試驗，波蘭得法國之援助，擊退共產軍隊，從此蘇俄遂變更方針，對內採取新經濟政策，對外則放棄世界革命政策，而與各國謀取妥協之態度。

## 二 協調主義的外交政策

一九二一年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其時內戰平定，得注全力於農村之改善，經濟之復興，同時謀與鄰近各國恢復邦交，避免外來之威脅，一九二〇年已先後與愛沙尼亞（二月二日）立

陶宛（七月十二日）、塞多維亞（八月十一日）、芬蘭（十月十四日）、各國締結和平修好條約。新經濟政策確定之後，復與波斯（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阿富汗（同年二月二十八日）、土耳其（同年三月十六日）、波蘭（同年三月十八日）、締結條約，蘇俄政府已漸由孤立而入於國際協調之途。

一九二一年蘇俄參加基諾亞會議，是為蘇俄參加國際政治之第一聲，此次參加會議之原因，據列寧所云：係與資本主義國家協議恢復貿易關係，與謀得此項國家對於蘇俄放棄舊債會議之時，各國對於蘇俄提出之要求為：（1）蘇俄政府須承認一切舊債；（2）蘇俄政府須返還歐洲資本家在帝俄時代的資本及企業，或為相當的賠償；（3）應即成立一種對於彼此的商業契約，以及其他種類的契約，予以充分的和平的，保障的司法制度，蘇俄代表對於上述要求之答覆為：（1）對於舊債在展期的條件下承認支付；（2）已經收歸國有的外國財產，難以返還，但承認以某種形式來代償；（3）各國立即借債於她。基諾亞會議，雖因雙方意見不能一致，卒致決裂，然蘇俄之外交政策，已顯然變更。一九二三年列強為解決土耳其問題，在瑞士之洛桑，

召集會議，所討論者，均爲政治問題，蘇俄政府只遣派代表參加出席，亦足以證明蘇俄外交政策之轉變。

其時蘇俄因注力於內部之建設，有賴於外來之援助，歐洲各國，亦正需要東方之市場。以謀發展貿易，挽救工業，資本主義之國家，與共產主義之蘇俄，因有互相利用之必要。自一九二四年起，歐洲各國相繼承認蘇俄，是年二月一日英國首相麥唐納首先無條件承認蘇俄，關於英舊債與損失賠償，均『留待後日交涉』。同月七日，意大利繼英之後，亦無條件加以承認，自後先後承認蘇俄者，計有臘威（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奧國（同年二月二十五日）、希臘（同年三月八日）、瑞典（同年三月十五日）、中國（同年五月三十一日）、丹麥（同年六月十八日）、阿勒巴尼亞（同年七月六日）、墨西哥（同年八月一日）、漢志（同年八月一日）、匈牙利（同年九月十二日）、法國（同年十月二十八日）。日本於一九二一年，即與蘇俄交涉，先後有大連會議，長春會議，東京會議，及至一九二四年北京會議，交涉始告成功，至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六日，日俄締結條約，恢復邦交，當此之時，蘇俄已完全脫離孤立而入於國際社會，於是更由妥協的

外交，進而採取和平主義的外交政策。

### 三 和平主義的外交政策

蘇俄和平外交，最顯著之表現，厥爲互不侵犯條約之訂立，一九二五年，蘇俄首先與土耳其締結所謂巴黎條約，一九二六年又先後與德意志（四月二十四日）立陶宛（九月二十八日）次年又與波斯（十月一日）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巴黎條約訂立之後，蘇俄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曾有下列之說明：『此條約（指巴黎條約）在和平的方面最好證明，就是蘇聯政府與其他通常往來的國家，很願意的成立同類性質的條約，國與國之間，惟締結類似蘇土所成立的條約制度，方能避免政治集團，或其他的結合以互相對抗之可能，亦惟如此，方能真正得到戰爭的避免，這種事體，非國際聯盟的運用，或羅迦諾一類的條約所能奏效。』『避免政治集團，或其他的結合以互相對抗之可能，』此實爲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之真意，觀於此類條約之種種規定，愈益明顯：（1）爲阻止締約國相互間之侵犯，並避免政治集團，或其他結合足以對抗締約國之

一方；互不侵犯條約中，遂有簽約國不得互相侵犯，及嚴守中立之規定。關於互不侵犯之規定，例如蘇土條約第二款載明：『締約國雙方約定互不作一切侵犯，並約定互不參加其他一國或一國以上之國家，因反對他方締約國而成立之同盟或政治協定。不得與其他一國或一國以上之國家，組織同盟或協定，以反對他方締約國陸海軍之安全，此外締約國更雙方約定不加入其他一國或一國以上之國家，對他方締約國所採取之敵對行為。』關於嚴守中立之規定，例如蘇土條約第一款載明：『如一個國家，或一個以上的國家，對締約國的一方，而有軍事行動，則締約國的他一方，應守中立。』（2）為避免締約國之一方，對他方行使經濟封鎖計，互不侵犯條約中，更有阻止經濟封鎖之規定，例如蘇土條約附文載明：『政治協定（係指條約第二款規定『締約國的一方不得參加其他之政治協定』而言）係包括財政的與經濟的兩種性質之協定，』換言之，即締約國之一方，不得參加第三者對締約國之他方，行使經濟封鎖；又如蘇波條約第三款之規定，則更為明顯：『……復次締約國雙方拒絕參加第三國因反對締約國任何方面而組織的經濟排斥與經濟封鎖。』（3）為明白放棄世界革命政策，俾得樹立國際間之和平關係。互

不侵犯條約中，對於防止赤化問題，亦予以明文規定，例如蘇阿條約第三款之規定：「締約國雙方尊重彼此國家的主權，對於彼此國家的內政，不得作武力的或非武力的干涉，更且絕對的不能協同或參加其他一國或一國以上的國家對他締約國所行使之干涉運動，締約國雙方各在本國境內，不獨不能容許，並且須取締凡足以危害其他締約國的政府制度之私人或團體行動與組織，及取締對抗他締約國的武力之招募與集中……」又如蘇波條約第四款之規定，則更為詳細與嚴密，如「鑒於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條約第四與第五兩款所規定之雙方義務，為避免干涉彼此內政及抑止對於他一方不利的宣傳或爭奪起見，締約國雙方應嚴格的禁止其所屬人員，在對方領土境內不得從事於此類工作。」

「假使締約國之一方的人民旅居他締約國境內從事於有干禁令的宣傳或爭鬥，則他締約國有禁止其行動及按律懲治之權。」

「並且根據上述各條約的規定，締約國雙方允許在本國境內，匪獨不予贊助，並且不能容許：（一）利用暴力革命或恐怖手段以反抗締約國他方之政府為目的之團體組織與行動，姑

無論此團體的名稱爲如何，(二)利用上項手段以對抗締約國他方之政府或以擾亂和平安全或以危害領土完整爲目的，且自稱係他國政府或他國所屬領土政府的團體與組織。」

『基於上項原則，締約國雙方更相互約在所屬境內禁止招募軍隊暨軍械軍需以及一切軍事用品之輸入以作上項團體之用。』(4)爲調解締約國間所發生之爭端，互不侵犯條約更有組織調解委員會之規定。

觀於上述互不侵犯條約之各種款項，關於阻止武力干涉，阻止經濟封鎖，咸有嚴密之規定，蘇俄和平的外交，蓋已有顯著的進步。

一九二七年國際聯盟曾召集二種會議，一爲經濟會議，一爲裁軍預備會議，蘇俄均派代表參加，在經濟會議開會之時，蘇俄代表奧堡倫斯基曾謂：『列席國家無分勝敗之別，應聯合宣言在經濟方面資本主義國家和共產主義國家的共存爲可能。』蘇俄世界革命之政策，蓋又明白表示放棄矣。同年十一月裁軍預備會議開會蘇俄提出完全廢止軍備計劃，藉以表示蘇俄之愛好和平無帝國主義之侵略野心。

一九二八年蘇俄五年計劃實行之初，因蘇俄之反宗教運動，資本主義國家曾一度反抗，提議組織新十字同盟軍，以謀顛覆蘇俄政府，惟其時蘇俄五年計劃，既已開始，正有賴於外來經濟之援助，更有需於國際和平之保持，故蘇俄之和平外交，不僅不稍變更，抑且愈益堅持，觀於非戰公約之提前批准及互不侵犯條約之繼續訂立，可以證明。巴黎非戰公約成立於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蘇俄因法國之邀請，亦參加簽字，惟認為公約預定批准之時，為期太遠，乃先後與波蘭羅馬尼亞磋商將該公約提前批准，故非戰公約在蘇波羅等國間，先其他各國而發生效力。蘇俄政府同時又與芬蘭波蘭伊色東尼亞先後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而一九三一年蘇法互不侵犯條約之訂立，又為蘇俄和平外交之最大成功。蓋法國素為反赤化國家之領袖，一九二八年且頒布蘇俄貨物入口檢查條例，目的在禁止蘇俄貨物之輸入，今蘇法條約竟告成功，蘇俄與歐洲大陸之和平關係，業已確定，從此西顧可以無憂，蘇俄所願忌者，僅為一遠東之日本耳。

蘇俄之於我國東北疆界毗連，關係密切，自東北事變發生以來，日本侵佔滿蒙製造偽國，對於蘇俄實為一重大威脅，然蘇俄初則嚴守中立，以保持日俄間之和平關係，繼因日本軍閥強欲



攫奪中東鐵路，且不惜違背中俄協定，行將出售中東鐵路，承認偽國，凡此均爲避免日俄間之衝突，以期第二次五年計劃之完成。蘇俄所標榜之和平外交，其意義竟至於此，蓋與革命時所標明之外交政策已大相逕庭矣。

#### 四 結論

觀於上述各節，吾人可得到下列之結語：

(一)蘇俄外交之演變，係屬適應國際環境與國內情勢。按蘇俄外交最初之目的，如推翻資本主義之國家，造成世界革命；後因各國之堅強反抗，世界革命已無成功之希望，反視國內則又政治紊亂，經濟破產，內憂外患，相迫相煎，蘇俄乃變更政策，對內謀經濟之復興，對外則設法避免外國之敵視，於是放棄革命的外交，而採取妥協的外交；妥協的外交，既告成功，國內經濟政策亦已確定，乃更進而與各國樹立和平關係，並藉以謀取經濟上之合作，俾得專心注意於內部之建設；於是更由妥協的外交，進一步而實行和平的外交，是蘇俄外交之由革命的變爲妥協的，更由

妥協的改變爲和平的，全係適應環境之轉變，故蘇俄外交實爲一種適應環境的外交。

(二)蘇俄外交雖爲適應環境之外交，然自有其一貫的主張與一定之目標。蘇俄之放棄革命的外交，而採取妥協的外交，實爲環境所迫，而其真正之目的，仍爲世界革命之成功。嗣後由妥協的外交，進爲實行和平的外交，亦係利用環境，俾得注力於內部之建設，以期達到世界革命之目的。史達林曾謂：『我們蘇聯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如果實現，即是阻止資本主義各國的干涉與維持蘇維埃制度的前提條件，那麼各國無產階級對蘇聯的同情與支持的態度，當然充分，而世界革命的勝利亦有把握了。』一九三一年蘇聯國家聯合出版部所出版之爭取工業化的最高速度一書中亦謂：『……由此看來，很明顯的，當我們的經濟力量還沒有強迫敵人的時候，當我們在經濟方面還沒有脫離資本主義而獨立的時候，帝國主義之威逼我們，妨礙我們，危害我們，是隨時都可能的，我們需要在最短時間內，使我們的國家，在經濟方面能夠獨立，我們需要將我們的國際能力，提高到帝國主義強盜不能侵入的那樣堅強的高度。』又謂：『同世界資本主義的最後戰鬥的限期，眼看着一天天的到來了，我們對蘇聯工人和農民的責任，是要求在同帝國』

主義堅決的肉搏時，我們要強過敵人，要使我們的勝利，確保一定不移。」於此可見蘇俄和平外交最後之目的，仍爲世界革命，無疑義。外交月報月波君對於蘇俄外交之用意，有下列之解釋：「總而言之，蘇聯是在各帝國主義的國家敵視中間，建設他們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因為被各國所敵視，所以不能不準備相當的國防，因為想有相當的國防，以保護他們社會主義的建設，所以不能不努力與各國維持和平，努力維持對各國的和平，所以完成他們的國防，努力完成他們的國防，所以保護他們安心的建設社會主義，他們的社會主義完成那一天，就是資本及帝國主義崩潰的那一天，所以他說：（按指一九三一年終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屆會議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託夫關於一九三二年經濟計劃報告中之言論。）「吾人努力實行和平政策，吾人努力警備邊疆，吾人努力社會主義建設。」這就是蘇聯對各國的態度。」此即蘇俄和平外交真正的用意與蘇俄外交最後之目的。

（三）蘇俄和平外交最後之目的，仍爲世界革命，已如上述。故其和平外交，實爲虛偽的，而非誠意的。蘇俄和平外交之用意，在於避免蘇聯與各國之衝突，俾得完成其內部之建設，然如蘇俄

與他國間之利害，如有衝突，而其武力足以戰勝他國時，則亦不惜破壞和平，以謀一己之利益，此於一九二九年中俄中東鐵路之戰事，可以證明。蘇俄在裁軍會議席上，更屢次主張完全廢止軍備，此亦足爲蘇俄虛偽的和平外交之佐證。蓋蘇俄未嘗不知各國對於完全廢止軍備，決不肯輕予贊同，即蘇俄國內亦正在擴充軍備，蘇俄國出此驚人言論，無非表示其愛爲和平之賊意，反映資本主義國家之侵略野心耳。

蘇俄今後之外交，將何如乎？蘇俄外交，既爲適應環境之外交，此後仍必利用環境，以確定其方針。按國際情勢，危機四伏，未可樂觀，在遠東則自東北問題發生以來，日美關係益趨緊張，在歐洲則自希特勒登台之後，法德衝突，更爲顯著，世界戰禍不起於太平洋上，必將爆發於歐洲大陸。蘇俄外交將靜待資本主義國家自相衝突，自相殘殺，然後以局外之身，利用情勢，左右操縱，擄去和平外交之假面具，重行激起世界革命，以期坐收漁翁之利，而達到其最後之目的，斯則無可疑者。至於我國既受資本主義國家之侵略，復爲社會主義國家所欺侮，軌近軍事與外交方面，亦已至最嚴重最困難之關頭，當此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短兵相接之時，如何詳審國際情勢，確

定週密計劃，以應付國際未來之危局，此乃外交當局所應盡之責任，抑亦吾人所企盼者也。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南京

## 拉狄克論蘇聯對外政策之基礎

Korl Radek 著  
李 琴 譯

### 一

著者自己深知向本刊讀者解釋蘇俄對外政策之重要方針及支配此政策之基本觀念，實非易事。第一個困難就是蘇俄政府與其他列強對外政策不同的程度，適與此首創之社會主義國家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對內政策之互異相等。一般久受資本主義陶鑄之人，既難於瞭解社會主義國家之對內政策，當亦不易明悉其對外政策。並且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大家公認一國之對外政策要較對內政策有優先性，公認一國之對外政策有傳統性。雖然這些理論未必都能毫無疑義的站得住，而本文之解釋却又更加困難了。讀者為便於瞭解蘇聯之對外政策計，就應當先確定我們對於以上兩項理論的態度。我們認為它們完全是錯誤的，因為它們與普遍的歷史事實是互相矛盾的。

對外政策是對內政策的一種機能，可以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下解決因某種社會或某種國家之發展所產生的問題。

近代資本主義產生時期之戰爭——如克林威爾 (Oranwell) 戰爭，如路易十四 戰爭——均係於重商主義制度下獲得實力之初期資本主義，由專為滿足農民及其封建地主利益之農村經濟為基礎的國內市場壓迫中，尋求解放奮鬥之產物。初期資本主義即有攫取殖民地，以為原料來源，及推銷新興工業產品，鼓勵製造品進步之市場的需要。上項製造品之進步即為機器工業最後發展之基礎。工業資本主義放棄了爭奪殖民地的政策，因為它本身可以產生一個龐大的國內市場及聚集財富之方法，並能以低廉之大量生產，由殖民地獲得原料之供給。

工業時期之戰爭一方面可以作為擊破障礙落伍民族與資本主義世界之中國 壁壘的工具（如中英雅片戰爭，英美對日本之威脅），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完成國家統一之方法——即在國內為幼稚工業準備國內市場——例如德意志，意大利，美國 之統一。

在獨佔資本主義之下，積極掠奪殖民地之行動又復盛極一時，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世

界大戰的動機就是想要依照參戰各帝國主義國家之實力，將世界地盤重新分配一次。雖然二十世紀之帝國主義政策與重商主義時代之對外政策，因同具帝國主義色彩而表面上有些相似，但兩者之目的與方法均不相同。英國於製造時期中，儘量防止殖民地工業之發展；而近代帝國主義政策則主輸出資本——輸出生產工具。這種輸出資本的政策，姑不論其創始者的用意何在，總會使殖民地在相當程度以內工業化的，雖然封建之殘餘勢力及擁有殖民地國家之剝削行為，隨時都在阻礙着殖民地之工業化及解放。至於殖民地新興無產階級之革命運動，也可以顯示出重商主義與帝國主義政策之區別，並且中國同印度的命運也能供給不少證明。

在這種方式之下，所謂對外政策之優先性與傳統性究竟何在？對外政策目標之決定是隨着社會之政治及經濟基礎而變動的，所以對外政策並不是一成不變而是常有變化的。

有些資產階級作家以爲蘇聯之對外政策就是沙皇政策的延續，這種主張實在很滑稽，他們甚至於連蘇聯對外政策的外表都認不清楚。沙皇政策的原則是用各種方法希圖取得達達尼爾海峽 (Dardanelles) 及太平洋不凍港之所有權。蘇聯現在不但沒有攫取達達尼爾海



「峽的意思，並且自始就與土耳其培植最友好的關係；至於奪取旅順，大連一層，在蘇聯政策中從來就沒有這樣一個目標。此外，俄國在沙皇或任何資產階級的治下，一定要繼續其征服波蘭及波羅的海國家之政策。這是上述各國任何有思想的資產階級政客都很明瞭的，而蘇聯却極力設法與上述各國發生友好關係，認為各該國獨立之完成是一種積極及進步的歷史事實。

有人以為地理環境可以決定一國的命運，可以決定一國的對外政策，這也是很愚昧的見解。沙皇政策之產生並不由於地理環境，實由於俄國貴族之特權，及新興資本主義之要求。各國對於因地理所引起的問題均有其應付方法，這種方法都要根據它本身之特殊的政治及經濟目的而決定。

## 二

現在我們討論第一個基本問題：什麼是為樹立社會主義，並以社會主義為基礎之社會所必採之目標？

作者在此地並不想對蘇聯的對外政策加以歷史的敘述，不過我們總還記得蘇聯政府自從取得政權之後，就很迅速的由世界大戰之狂熱中進行救國的工作，這個工作經過重大犧牲才得完成。以後又在三年以內，從事於防禦本身之獨立，使之不受各帝國主義列強的干涉。至於各國干涉的原因也就是想將蘇聯重新牽入大戰的漩渦，想要摧毀資本主義世界視爲對資本主義制度有重大威脅的第一個勞工政府。這種事實使得蘇聯不得不對防禦的問題予以初步之解決，但是蘇聯對外政策就在這個很早的時期以內，已經很明顯的把它與社會主義制度下之對外政策完全吻合的基本方針表示出來。

蘇聯外交所努力的重要目標即是和平。現在「和平」這個名詞已經被人濫用了。各國外交家，雖然他們自己就是備戰最力的帝國主義國家代表，而在他們的正式宣言中，沒有一個人不是再三提到和平的。但是凡不能瞭解和平努力在蘇俄對外政策中所佔之特殊地位的人，是決不會瞭解蘇聯對外政策之一部或全部的。蘇聯政策之中心目標爲什麼要爲和平而奮鬥呢？最初是因爲蘇聯——引用列寧的話——「爲組織社會主義之社會，認爲一切事物都是需要

的。」

列寧於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準備奪取政權的時候，就認為在俄國境內有建立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他看到俄國幅員之大，天產之富，並且料到俄國未來之工業發展，一方面可以保障勞工階級之領袖地位，另外又可以供給一切為社會主義建設之必要技術智識。

在列寧生前，蘇聯已經勝利的把反對干涉的戰爭告一段落，並從事於建設工作。以復興已往曾受毀損的工業，並與農民恢復通常關係，因此，無產階級對於發展工業所必需之原料及食品供給以及農民之贊助各點，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列寧死後，斯大林繼之為蘇聯領袖，確定樹立社會主義於帝俄境內之目標。這個目標不但為一般資本主義國家所認為過於理想，即在共產黨內之托洛斯基派也對之表示不滿。

斯大林的政策在黨內爭論中是佔勝利的，並在五年計劃中見諸實現。五年計劃完成以後，工業上有了大規模的發展，因此而解決了三個問題。第一，五年計劃使蘇聯能夠單獨的繼續發展工業，換言之，即將來於必要時，無須由外國輸入物品，因為蘇聯在五年計畫之下已經擁有偉

大之重工業，及各種製造機器之設備。

勞工階級因第一問題解決之結果，現在已能以大批機器供給農民，此足以證明甚至一般落伍農民已知集產制度的好處了——此即第二問題之解決。在農業集產制度之下，要想將農民中使農業遵循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之階級清除出去，遂成爲可能的事。壓迫農民之階級的消滅，以及農民採用大批工人國家所有之機器工業產品——如曳引機，割稻機及其他農業機器——以發展農業，遂使農民依循社會主義之方向以求進展。今日農民之地位仍係列於小土地所有人，與以社會公有之生產工具，經營集產企業者之間，惟農民因使用曳引機，電氣，煤油，較使用馬力，犁，鏟刀有利之結果，其幸福已逐漸仰恃於社會主義社會之生產力。而不再仰恃於私人所有生產工具所生之勞力。農民階級中之生產標準及經濟標準之差異將會廢除，農民均將成爲社會主義之大衆；農民之幸福將繼續改進，而農民本身亦將逐漸與無產階級接近。以上這些結果，我們由鄉村之工業化以及工業化係增高鄉村文化程度，使與都市無產階級平等之事實，可以得着保證。第二問題之解決（農業集產化）及第一問題之解決（農業工業化）聯合起

來，使五年計畫的第三目的也有完成之可能，換言之，即蘇聯可以具備國防之必要條件。

國防能力須以能將近代戰爭之防禦利器供給國家之重工業為基礎。並須消滅一切反對樹立社會主義之階級。雖然這些階級的殘餘份子仍舊存在，甚至小土地所有人仇視社會主義之心理在全國人民的腦筋中仍不能立即喪失，而它們畢竟是失敗了。但是我們如果問到將來進展的趨勢究竟如何的問題，我們可以很明瞭，五年計劃之成就以及第二次五年計劃之建設方針的發展，已經可以證明蘇聯於奠定社會主義基礎後，即可從事建築一完整的社會主義社會，換言之，即以近代技術發明為基礎之無產階級社會，其社會及文化典型均非資本主義所能完成。

蘇聯為樹立社會主義，究竟是否需要戰爭？我們可以說它並不需要。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堅決的以為蘇聯自成立以來，就想要由戰爭中尋求一個解決困難的機會，這種論調已經為蘇聯成立十六年以來的歷史所推翻。我們在最初取得政權，實力不足以樹立社會主義的時候，就已經下了最大的決心，要為國家求和平。我們深信——這一點很重要——為樹立社會主義社會，

我們需要一切事物。我們現在曉得在蘇聯國內樹立社會主義是可以有實際結果的，並且這個問題的大部份已經解決，所以蘇聯政府之和平政策實建立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堅固基礎之上。蘇聯的敵人要想從兩方面毀滅上述事實之重要性。一部份人責備蘇聯，說它已經放棄了它的國際目的。依照他們的意見，這些目的一定會引起蘇聯為幫助國際無產階級，及殖民地人民之解放的軍事干涉。另外一些人以為現在統治蘇聯之布爾希維克黨生來就是一個國際政黨，所以一切蘇聯的和平宣言純粹是暫時的，將來蘇聯達到足以甘為侵略戰爭戎首之經濟程度時，必將和平宣言放棄，而首先發難。至於答覆以上兩項責難的最好方法，就是引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斯大林所說的話：

『與農民維持二十年至四十年之親善友誼，我們就可以獲得全世界之勝利（雖然無產階級革命之進行還很遲緩）否則，我們就要在白色恐怖之下痛苦二十年至四十年。』——  
“Leninski Sbornik”，第四卷第三七四頁。

列寧這個議論是不是承認「我們決不能在二三十年中樹立社會主義」之結論？我們以

爲不是這個意思。從他的議論裏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

(一) 如果我們能夠與農民維持親善的關係，那麼，在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內，一定可操必勝之權——即社會主義之勝利。

(二) 這種勝利不僅是在蘇聯共和國中之勝利，並且還是全世界的勝利。

(三) 如果我們在這個時期以內不能得到勝利，換言之，就是我們已經失敗，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被白色恐怖之制度屈服，這種制度會要延長到二十年至四十年之久。

何爲「全世界之勝利」？是否即指一國社會主義之勝利？我們以爲不是這個意思，列寧在他著作裏很仔細的將一國社會主義的勝利，與「全世界社會主義之勝利」區別出來。列寧所謂「全世界之勝利」是指我國社會主義之勝利是有國際重要性的，它不但不能僅限於我國，並將引起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社會主義運動。即或我國社會主義之勝利與其他各國無產階級革命之勝利不能完全一致，但是它一定會引起其他各國向世界革命勝利中途進行之無產階級運動。如果我們想明瞭革命勝利之真義（本黨注意之問題），此即列寧所主張之革命真

義。

上述各點，即蘇聯和平政策之基礎。

### 三

社會主義社會在蘇聯境內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其完成亦頗有把握，並不需要戰爭。這種事實，在最初列寧生前於熱內亞會議（Genoa Conference）蘇聯向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要求全部裁軍之提案裏，就可以表示得很清楚。以後蘇聯在軍縮會議的主張也是以和平政策為中心的。軍縮會議經過了多年的籌備，以及兩年多毫無結果之討論，它的命運竟證實了列寧的理論——「在資本主義之下，特別是在帝國主義的階段裏，戰爭是無法可以避免的。」

資本主義世界初由戰後混亂中恢復，達到經濟暫時穩定的時候，而新的軍備競爭又已成為事實。各國均在極力發展作戰利器，如航空，化學戰具，坦克，並且陸軍之機械化及海軍之近代化亦已普遍實現。裁減軍備至某種範圍之努力，因受一原則之阻礙不能成功，這個原則在列寧



所著帝國主義爲資本主義之最後階段一書中所擬定的。

『財政資本及託辣斯不會減低，反而要增加世界經濟各部份發展速度之差別。如果均勢一旦破壞，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除了武力行動之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使糾紛得着解決？』

列寧還說：

『在資本主義之下，瓜分勢力範圍，利益範圍，殖民地之標準，除了對參與瓜分各方的一般經濟力量（財政及軍事力量）加以估計外，實在沒有其他的方法。但是各方實力常有不平等的變化，因爲在資本主義之下，不同的企業，託辣斯，工廠，國家都不能有平均的發展。如果我們將五十年前的德國資本力量與英國的資本力量加以比較，德國實在是一個荒蕪無用的地方；日本與俄國的比較也是相同的。將來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後，各帝國主義國間的關係是否仍能不變？我們決不想信它是不變的。

『在今日資本主義世界之實況下，帝國主義間或極端帝國主義間之聯盟——不論聯盟之形式如何，例如一帝國主義集團對抗其他一帝國主義集團，或是所有帝國主義國家之大聯

盟——一定與戰爭的相距是間不容髮的。」

列寧於一九一六年大戰期中所表示的這種意見，已經為戰後的歷史所全部證實。這些意見說明資本主義國家不能有效裁軍之理由，將來實無法避免一為重新瓜分世界之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工業自得英、美、荷、瑞各國借款協助後，已經大有進步，但因迫於世界市場之衰落，不能在凡爾賽和約所定之限制中繼續生存。德國之要求軍備平等也就是要希圖尋得一個為修改凡爾賽和約的戰爭。

日本最初發展工業是以半封建式剝削鄉民的方法（現在還在繼續使用）以後就以因大戰而獲得的軍費作為補助，但日本迄今仍在受着阻礙國內市場發達之封建殘餘勢力的限制——日本明瞭美國為本身經濟發展之結果，不得不在中國增加其經濟力量之奮鬥，日本也很恐懼西伯利亞工業化之結果，將使日本喪失其遠東惟一工業國之獨佔地位，因此不惜破壞華盛頓及倫敦條約，佔據中國之東三省，並準備於美國在華經濟統治完全成功以前佔領中國。

她自命爲亞洲之霸主。這個目的已由荒木陸相公開宣布。

意大利，「在凡爾賽和會裏曾受過侮辱，」也想在對她有利之情況下重行瓜分殖民地。

美國及英國之關係，自美國一躍而爲世界第一工業國，宣佈平等海上統治權以後，亦有重大變更。

戰後資本主義不平均的發展，使各帝國主義國家都想要依據本身利益，重新瓜分世界。

蘇聯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戰爭的，但是也承認一種爲保衛社會主義之戰爭——

被壓迫民族自求解放之戰爭。這個見解決定了我們對於帝國主義制度，以及對於帝國主義備戰政策所生結果之態度，並且還操縱着我們對帝國主義聯盟——在進行重新瓜分世界之戰爭中發展的聯盟——的態度。

蘇聯對於重新瓜分世界之門爭決不參加。

斯大林於蘇聯共產黨第十六屆大會中說：「我們決不貪圖外國的領土，但同時亦永不失寸土於任何國家。」這就是蘇聯政策之精確解釋。

蘇聯對於重新瓜分之鬥爭是不參加的。它因爲注意到全世界勞工的團結，所以不能參加掠奪外國土地之行爲，並且它也不需要外國土地來繼續樹立社會主義的工作。蘇聯的這個政策在它對中國東三省事件裏表現得很清楚，它爲保護本身與中東路有關的經濟利益，永不承認東三省被瓜分成勢力範圍。它在波斯也採取同樣的政策，雖然這種政策會使蘇聯與英帝國主義的關係有些惡化。因此，蘇聯對外政策第二個重要原則就是不參加掠奪外國領土之帝國主義聯盟。

但帝國主義之備戰是個事實，帝國主義聯盟之存在亦爲事實，蘇聯不能對於帝國主義的目標以及帝國主義之聯盟，僅表消極的態度，必須要積極預防資本主義國家之侵襲，因爲它們是計劃着要奪取蘇聯的領土，並顛覆此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組織。

蘇聯的和平政策不但在爲軍縮努力——要求裁減最大限度之軍備——，同時還在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中表現出來。此項條約就是蘇聯於資本主義國家衝突時嚴守中立的保證，但各資本主義國家亦須不攻擊蘇聯或干涉其內政，蘇聯第一次與土耳其締訂互不侵犯條約的事

實並不足令人驚奇，因為實際上兩國於最初蘇聯幫助土耳其獨立時就已經有了友誼關係。以後蘇聯於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與德國訂立一與互不侵犯條約相等之條約，也並不奇怪，德國於反對凡爾賽和約之奮鬥中，設法與唯一反對壓迫其他國家之蘇聯樹立友誼關係，一九二六年蘇聯與阿富汗，一九二九年與波斯所訂之互不侵犯條約，都是它主張以平等待遇東方民族及尊重其獨立的政策所促成的。

蘇聯許多年來所以不能與西方鄰邦締結相似的互不侵犯條約，也並不是偶然的事，因為那些國家早就直接或間接的參加一般不能放棄干涉蘇聯的帝國主義國家行列裏了。只有經驗才告訴它們這種政策不但不能保全獨立，反要減弱它們的地位，要它們自己去應付德國帝國主義與日俱增之奢望，這樣才使他們對蘇聯有了和平的趨勢，並在蘇聯、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芬蘭間成立了互不侵犯條約。在歐洲大陸上也有同樣的情勢變化，德國欲修改凡爾賽和約給它加上的束縛——可能的話就用和平的方法，必要的話就訴諸武力，這也是使法國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一個原因。意大利是各國與蘇聯最先恢復通常關係的國家，她為增厚她

對法的地位起見，不但與蘇聯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並且還締訂了一個友好條約。蘇聯與日本締結同樣條約的計劃，至今仍無積極結果，這似乎可以表明日本有一種想要在將來與蘇聯發生衝突時而維持整個自由行動的趨向。

蘇聯在歐洲同遠東都遇到一種彼此仇視之備戰壁壘。它對於它們取中立的地位，並以不干涉它們的事務，與各方約定互不侵犯的義務，以保障其本身和平。這些義務在含有侵略國定義的條約中解釋得很精確具體。蘇聯決不以其陸海空武裝軍隊超過負有同樣義務國家之疆界，亦不直接或間接的干涉其內政。以上這些都可以向世界說明蘇聯所持之和平政策及中立態度，並不僅只是一種外交姿勢，實在是一種毫無疑義之具體政治義務。

蘇聯與任何願訂互不侵犯條約之國家締結此項條約，換言之，即蘇聯可與任何將來應付戰爭之國家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因此，蘇聯必須要考虑它對和平及中立態度之保證，是否會增厚一交戰國的實力，而使另一方蒙受不利，結果將使後者設法否認其與蘇聯所訂之互不侵犯條約，違反其義務而進襲蘇聯。此外，凡拒絕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國家，它們任何種的行爲都是

可能的，而蘇聯對付任何的外來攻擊，無疑的是出以奧斯太林所聲稱「永不失寸土於任何國家」相當的軍事行動。蘇聯將與其仇敵之仇敵採取共同行動，或於共同行動之下積極合作之情勢也許可以發生。列寧在討論與德國在布里斯特利多佛斯克（Brest-Litovsk）之和平談判時，就已預料到將來要採取這個或有的政策。列寧於完全迥異的情況之下（當時蘇聯軍力很弱，）就已擬定了解決這個問題的大綱。這個解決方法迄今仍為蘇聯政策之主要原則。列寧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的單獨議和論文中說：『從一國社會主義建設完全成功之日起，這個問題必須不要由此帝國主義或彼帝國主義認為滿意的眼光去解決，務必要由已經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發展最適宜的眼光去解決。』

列寧又於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之論文（O chesouke）中，為批評反對與協約國締結對付德國帝國主義協定的人，發表了以下的言論：

『如果克倫斯基（Kerensky）——資產階級統治者（即剝削者）之代表與英法劍削階級訂立協定，依照協定規定，他可以得着軍火及食糧之供給，但背地却另將亞美尼亞（Arm

menia) 加里西亞 (Galicia) 君士坦丁堡 (如果成功的話) 拱送給一個強盜, 另將巴格達 (Bagdad) 敘利亞 (Syria) 送與其他一個強盜——無論從克倫斯基或從他的朋友的眼光看, 要明瞭這個協定是虛偽, 可惜, 反動, 是不是困難的事? 我們以為並不困難, 任何農民, 甚至最落伍無智識的人都可以明瞭的。

但被剝削階級之代表如將剝削階級推翻, 公佈一切秘密協定並否認其有效之後, 德國帝國主義陰謀攻擊之目的究竟是什麼? 他 (克倫斯基) 是否有勾通英法強盜, 以木料與軍火食品交換之罪? 這種協定是否可以認為不忠實, 可恥, 卑污? (列寧以為德國較英法尤為可懼。)

列寧對將來蘇聯是否能與一帝國主義國家締結協定之問題, (此國專為本身利益, 願助蘇聯抵禦其他一進襲之帝國主義國家) 所下之積極答覆, 同時答覆了另外一個問題——即蘇聯政策於未來之帝國主義衝突中, 是否有超過中立地位以外的可能。

列寧以為凡向攻擊蘇聯之帝國主義國家進行戰爭者, 蘇聯並不拒絕與之訂立協定, 但蘇聯於締結此項協定之後, 並不對協定另一方之帝國主義國家所採特殊目的接受任何責任。蘇聯



永久不會，也不在任何條約之下，參加掠奪其他國家之行動，因為參加這種行動足與國際勞工團結之原則相反。但為抵禦帝國主義之攻擊起見，可以同敵人締結擊退侵略蘇聯領土國家之協定。

我認為我已經把蘇聯對外政策的基礎大略敘述了一下，並已解釋了它們的相互關係。這些原則完全是由於帝國主義不能解決目前人類所要應付的大問題而產生的。新的帝國主義非但不能解決這些大問題，反而要引起生產力之絕大損失，使人類感受罕有之痛苦，除了重新瓜分資本主義世界而外，不會有別的成功。

蘇聯是反對資本主義國家因不能繼續發展人類的生產力，設法為某一國之資產階級剝削而攫奪土地之戰爭，因為這種事實就是使世界陷於新糾紛的原因。我們相信一切陷於戰爭混亂中之大眾，一定會依照着一九一七年蘇聯無產階級所循的途徑而開闢一條新的出路。

蘇聯政府的目的是要使此首創之無產階級國家，不受此未來戰爭之影響。它為達到此項目的已下最大決心奮鬥了十六年，所以蘇聯對外政策之中心問題就是要維持其本身和平及

中立，不致捲入世界戰爭之漩渦。

蘇聯遵守和平政策的原因，不外是以它爲樹立社會主義之最良條件。蘇聯雖一面爲維持和平而奮鬥，對掙扎中之帝國主義對立局面採取中立政策，但同時仍將國內軍備準備至足以應付國防，及近代戰爭必要條件之程度。凡是瞭解現實之帝國主義國家對於蘇聯之中立必能認識是一個積極的原則。其他不能認識蘇聯中立之重要，或因本身地位不能解決之困難，對此擁有數千萬爲和平努力人民之國家；如敢甘冒不韙而起釁的國家，它們最後一定可以曉得這一個已經種下社會主義基礎的大衆，必將堅決從事於保衛自己的。我們更相信，不論戰爭進程如何，不論何人負開釁之責，戰勝的必是領導全世界工人之蘇聯；因爲只有它才有一種在戰爭時代表全世界大衆的旗幟。（載美國外交季報一九三四年春季號）

二十三年一月二十日於南京



## 戰後法國外交政策

袁道豐

法國三面環海，東界萊茵，東南部以阿爾卑斯山爲邊疆，西南部則以比利牛斯山爲國境。法人之所謂『天然疆界』(Frontiers naturelles)者，至今已完全實現，宜其眉飛色舞，慶幸其傳統國策之成功。惟法國之所以有今日，並非從天而降，實曾費鉅重的犧牲，以作代價。過去人之爲謀得『天然疆界』而作戰者，不知凡幾。只就最近六十年的史實而論，亞爾薩斯與勞倫二州之失而復得者，如喪失亞勞二州，則法國國境不能達到萊茵，反之，如獲得亞勞二州，則法國得完成其『天然疆界』。故萊茵之得失爲其『天然疆界』之成否所繫。這是我們研究法國外交政策時所應注意者一。

一八七一年以前，法以德意志四分五裂，萊茵疆界一經獲得，即能高枕無憂。可是從此時起，德意志統一完成，國運日隆，勢力日盛。於是法國應如何運用外交，以應付此偌大帝國，而收復已失領地，實爲一煞費苦心的問題。『誠摯協商』的成立，即肇端於此。厥後歐戰告終，亞勞二州雖

告恢復，然而德國人口衆多，實業發達，猶處處駕法國而上之。她不願長此爲凡爾賽和約下的囚奴，更爲人所預見之事實。法國有鑒於此，而且百年來曾受四次侵略的慘痛教訓，故戒懼備至，亟思謀求安全保障，以防患於未然。這是我們所應注意者二。

法既以要求安全保障，換言之，卽要求維護和約的完整，爲其基礎國策，則其所以謀求實現之道不外乎此：（一）竭力壓迫德國，使她一蹶不振；（二）擴張本國的軍備，保持對德的優勢；（三）增強國際聯盟的實力，以資制裁破壞條約的國家；（四）結盟友國，以維護彼此的利益。這都是法國外交政策之要點，而爲我們所應注意者三。

然上述三點僅是法國大陸政策而已。她既是三面環海，而其殖民領土，又滿遍五洲，則她宜講求海洋政策，自在意中。但欲講求海洋政策，就不能不聯絡英美。英美而助法，則法能消釋其海上之憂，並能集中全力與獲得她們的援助，以對付德國；反之，英美而反法，則法以海軍實力有限，必不能保全她與殖民地間的交通。於是海陸受敵，卽欲拼死掙扎，法恐難免簽城下之盟。故英美兩國亦爲法國「安全鍊子」上的兩個重要連環。這是我們所應注意者四。

此外，法國的這種安全政策，歷屆政府——無分左右之別——均能恪守毋違。保守的普恩嘉齊與激進的赫禮歐均以安全爲重，毫無二致。所異者只是口吻的不同而已。普恩嘉齊與泰迪歐之流，喜以強硬的態度，對付敵國的要求或建議。『不，我們不能接受……』這就是她們的慣用語。而赫禮歐與彭古則嘗用。『可以，但是……』之語句，以應付對方，其辭令雖比較委婉，然其維護法國利益的堅決意志並不減於普達二氏。所謂『但是』按其意義，無非提出條件，作爲拒絕他國的要求罷了。故作者認法國左右派的外交政策只有語氣剛柔之分，而毫無實質之別。這是我們所應注意者五。

明乎此五大要點，則我們對於戰後的法國外交政策，庶可作更進一步的研究了。

## 一 和會中法國安全政策的失敗

法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後幸有英美諸國的援助，纔獲得歐戰的最終勝利，其歡欣欲狂，豈待贅言。然瞻念前途，實不寒而慄。她自己以受佛朗克條約之恥辱，纔有一九一四年的復仇之

戰，則今日德以受凡爾賽條約之桎梏，又安知他日德不舉戈雪恥。所以戰事前告結束，法即着手於安全保障之獲得。

在巴黎和會中，最使法人不安者厥爲英法協調的破裂。所謂共患難，共利難，衡之於當日的英法關係，實切中要旨。唯因英法步調不能一致，所以法國的安全政策一無所成。當此之時，法曾提出將萊因蘭組織一獨立國家的主張。如此獨立國家得而實現，則德國在萊因蘭的巨大工業勢必喪失淨盡，將永無恢復元氣之一日。不寧惟是，萊因蘭獨立國且將成爲一德法間的緩衝國家，使德國無從侵襲法國。從法國立場言，則其安全之保障實無更勝於此者。乃不幸英以深懼萊因蘭國將成爲法之附庸，以及過度削減德國之經濟勢力，於己不利，故毅然拒絕法全權的提議。而威爾遜總統因萊因蘭國的成立，有違民族自決的原則，且足種下德法間無可妥協之惡感，亦拒絕表示贊同。在這場合之下，法遂不得已打消其要求。

要法國放棄其建立萊因蘭國之主張，自不能不在別方面予以相當的滿足，威爾遜與路易喬治於是提議英美法三國簽訂一軍事保障條約，以替代萊因蘭的佔領與獨立。此後法如遭受

攻擊，則英美須出兵相助。惟軍事保障條約須經英美兩國國會批准，纔能生效，美參議院因格於門羅主義的拘束，竟拒絕批准載有國聯約章的凡爾賽和約，而含有軍事義務的保障條約的不能得到它的贊同，更是不消說的了。因此，英美法軍事保障條約便等於曇花一現。

法國失望不僅此兩端而已，她在別方面也遭受同樣的失敗。國際聯盟的組織雖由威爾遜總統提出，但是她未嘗不表示贊同，希望她能成爲一保持和平的國際機關。不過，和平的保持，如專賴一紙公約，是不成功的，必須有制裁的實力才行。所以法國提出的國際聯盟組織方案含有兩大要點，爲其他方案所不及者，這就是國際聯軍與國際軍事參謀部的組織。法國之所以有此提議，其目的無非想藉國際的力量，以制裁破壞和平的國家。其有利於法，自不待言。乃不幸法國方案未經採用。結果國聯盟約雖有冠冕堂皇的第十條與第十六條之規定，然按其實際，亦不過一紙具文而已。

在和會中法國所欲獲得者安全保障而已，然除德國裁減軍備而外，所得到的安全何在？保障何在？她於是不得不另圖新徑，以謀自固了。



## 二 法國的結盟政策

從前在普法戰爭後的翌日，俾斯麥爲了抑制法國，曾大施結盟政策，以謀自固，於是始則有德奧同盟的締結，繼則有三國同盟的成立。現在法國爲了維持她的優勢與和平條約，也襲取俾氏的故智，而採行結盟政策了。難道結盟友國必能保障國家的安全嗎？證諸史實，實不盡然。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法國總選結果，右派的『國民團結』（Bloc national）大獲勝利。此後至一九二四年政權便完全操在右派的手中了。它的外交政策極其簡單明顯，就是反對蘇俄，與維持條約的尊嚴。一九二〇年法政府派遣魏甘（Weygand）將軍，援助波蘭，以抗俄軍，就是爲了這個原故。

法國的基礎外交政策既是維持歐洲現狀，則其結盟的對象當然只有戰後占了便宜的國家。英國的合作本是她求之不得的。可是不幸的很，唐寧街不待和會結束，就漸漸回復到「光榮孤立」的傳統政策了。厥後在一九二二年正月甘納（Carnegie）會議中，白里安與路易喬治維

曾有保障條約的擬議，但因兩國意見不一，同時又因華盛頓會議爲了海軍問題，惡感頗深，也是毫無結果。英既不願締盟，而俄意又或因主義方面扞格不入，或因戰後所得未償夙願，滿肚牢騷，不願與法攜手，於是格多賽（Quai d'Orsay）法國外交部所在地，不得不掉首而求次要國家了。

最先承蒙法國光顧的就是比利時。她在戰後從德國手裏奪得歐本與馬爾米地。戰前她因受一八三九年中立條約的束縛，不能與任何國家締結軍事盟約。現在可是不同了，她已經解除了中立國家的義務。爲了防範德國的捲土重來，她便在一九二〇年九月七日與法簽一軍事協定，載明如盟國中倘有一國被德侵犯，則其他一國應即舉兵相助。這是法國的「安全鍊子」上的第一個連環。

法國在東歐素來就保有一盟國，以便兩面夾攻中歐的國家，遠之則有土耳其帝國，近之則有俄羅斯帝國。現在帝俄既被推翻，而蘇俄又是臭味不相投，於是在東歐有可結盟者當然以波蘭爲最適宜。波蘭之所以能復興建國，法國斡旋之功實非淺鮮，而最近波軍之所以能打退俄軍，

亦有賴法國軍官之援助。故從波人的眼中看來，法國實不啻爲其護身符。否則以一新興國家生存於兩大仇國之間，終將難免爲她們所吞併。波蘭而滅亡，則法豈僅喪失一東歐盟國而已，抑且和平條約勢必全部毀滅。反之，與波結盟，則波東向可以阻止蘇俄的西侵，西向亦可以夾擊德國。一九二一年正月簽訂的法波同盟條約就是基於這些理由而成立的。這是法國「安全鍊子」上的第二個連環。

捷克斯拉夫亦爲戰後的一新興國家。她的領土都是由奧匈德三國手裏奪過來的。所以她也占了歐戰的便宜。但是就因爲她占了這種便宜，她便不能不求助於利益相同的強國，以爲後援。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她與法訂立一同盟條約，其性質與法比間和法波間的協約甚相類似。法之所以願與捷國結盟，其目的無非想在戰時捷能助法以攻德。這是法國「安全鍊子」上的第三個連環。

此外，在一九二〇與一九二一兩年間，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和巨哥斯拉夫曾彼此互訂盟約，成立一『小協約』(La Petite-Entente)這『小協約』雖以匈牙利爲對象，似與法無關。

然因其主旨在維護和約，而同時『小協約』的構成分子又與法情感甚洽，所以對法的安全政策實大有補助。綜合波比捷羅巨五國的人口計之，其總數不下八千萬，加以法國人口四千萬，總達一萬二千萬有餘。是法國在歐的勢力爲任何歐洲國家所不及，宜其能維持霸權於不墜。

凡此盟約都是法國『國民團結』內閣一手簽訂的。當此之時，歐戰方終，法人以戰勝之餘威，凶饑逼人，仇德甚盛，所以大施結盟政策，冀陷德國於孤立。一九二三年德國無力償付賠款，普恩嘉齊竟出兵佔據魯爾，以致引起世界之非議。同時英、美、意諸國以不直普氏的鐵腕政策，態度亦丕然一變，轉而同情於德。故當法國安全政策成功之日，亦即『協約國』精神崩潰之時。

### 三 法國外交轉趨緩和

普恩嘉齊的佔領魯爾，以保證賠款之償付，不僅在外交方面疏遠了英意諸國，而且在國內也頗爲人所訾議。須知佔領魯爾實爲一種掠奪德國經濟的行爲，一方面固使德國的經濟陷於破產，社會制度因而崩潰，他方面於法亦未嘗有所裨益，國際地位的孤立固不待說，而佛郎的暴

跌與德法邦交的增劇也深受其影響。所以一九二四年五月衆議院改選結果，「左派聯合」大勝，普恩嘉寶就被請下台去了。

赫禮歐繼起執政。他是一位主張國際協調的政治家，在他的眼中，德法關係一日不改善，則歐洲——甚至世界——和平即一日不確固，而經濟復興更是談不到了。所以他就位不久，始則與俄恢復邦交，繼則促成道威斯計劃，終則於一九二五年八月撤退魯爾駐軍。因此，德法邦交漸有日趨協調之勢了。

不過左派內閣雖主張國際協調，然對於法國的安全保障仍是一步不放鬆的。所以當互助條約失敗之日，赫禮歐就在日內瓦與英相麥克唐納商同發起一維持和平的議定書，仲裁，安全，裁軍就是這議定書的基本信條。一切爭議，無論是司法的，抑是政治的，均須依仲裁解決。如某簽約國拒絕仲裁，而逕行訴諸戰爭，則其他簽約國須協力防止之與制裁，以保障彼此的安全。這議定書如能見諸實行，則其結果不僅對於法國的安全，就是對於其他國家的安全，也有莫大的裨益。可是繼工黨而起的英保守黨內閣以格於自治殖民地的反對，却拒絕接受，所以日內瓦議

定書終變爲廢紙了。

然而，議定書失敗的喪鐘，却是羅加諾成功的預兆。

當此之時，歐洲充滿着協調的空氣。由戰後一直到一九二五年，歐洲風雲之所以陰霾瀰漫，混沌有加，推其原因，無非由於德法兩國彼此猜疑，冰炭難容。在法國方面，亞爾薩斯與勞倫兩州的收復固完成了她的『天然疆界』，但是她未嘗不知在武力迫簽下的凡爾賽和約，終必爲德人所撕廢。所以她所希望的就是德國能自動的承認萊因邊境的現狀，並由旁的國家加以保證。這麼一來，她的東境安全既有保障，則其東顧之憂自可消釋，而她對德的政策也就可由強硬而轉趨協調。在德國方面，她一日不能獲得法國的諒解，她就一日休想恢復國家的元氣。萊因邊境既爲德代表簽署的凡爾賽和約所接受，則今日再予承認，也未見得有何害處。並且撕廢和約橫豎是要靠武力纔行，而在目前情形之下，她是無力言戰的。所以與其長此明爭暗鬥，徒傷元氣，曷若彼此相安無事，力求復興。德法既有協調之需要，因而一經英國斡旋，羅加諾協約就有水到渠成之勢了。

羅加諾協約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在倫敦簽字。這協約於法蘭西的安全當然很爲有利。第一，萊因邊境的現狀已爲德國自動承認。第二，法國倘被德軍侵襲，英意將出兵援助，以保障其安全。第三，德國加入國際聯盟。此後，德法間的爭議提交國聯，用和平方法解決。不過此約對法還有美中不足的地方，這就是她的盟國波蘭和捷克的國境並沒有獲得英意的保障，而德國也未曾予以法律上的承認。所以波捷兩國萬一被德侵犯，法以盟約關係，仍有捲入漩渦之可能。這是我們所應注意之點。

總而言之，羅加諾協約的簽訂，可說是戰後歐洲政局的一個轉變的階段。在此約未成立之前，法與德在表面上雖已休戰，但是實際上兩國間的戰爭狀態却仍存在，只是戰爭的方法不同罷了。反之，在羅加諾協約成立之後，則法德惡感暫告冰釋。而法以萊因邊境已得保障，便可集中心力，以鞏固和平的組織。須知和平是法、人、希、求、最、殷、的、和、平、一、日、得、而、維、持、她、的、優、勢、就、一、日、得、而、確、固。因是法蘭西的外交政策又轉入一新階段，而歐洲——甚至世界——風雲也就爲和平空氣所籠罩了。

#### 四 法國的和平政策

萊因邊境既由羅加諾協約保障，而同盟國家又遍佈歐洲，則法國除和平而外，更有何所希求？所以一九二六年後的法國外交固嘗以充實安全保障爲着眼，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已注意到和平組織了。白里安就是這和平政策的象徵。

此時法國的安全概念也跟着和平的政策之採行，而稍有進步。一九二六年六月簽訂的法羅（羅馬尼亞）協約，與次年十一月成立的法巨（巨哥斯拉夫）協約即其明證。從前法比間和法波間的協約概含有軍事協定的性質，現在的法羅間與法巨間的協約對於軍事一層却完全擱置不提。固然，我們不能否認法聯羅巨自有相當的企圖，蓋欲在巴爾幹半島發展勢力和借此掣肘意大利，但是我們在別方面也不能抹煞法國外交政策的演化。

一九二八年白里安和美國務卿凱洛克發起非戰公約，而八月二十七日簽字於巴黎格多賽。這哄動一時的公約雖在實效方面毫無意義，但亦不失爲法國和平政策的一貫結果。平情而



論。此時的歐洲實比任何時期更充滿了和平氣象。所以歐戰遺下來的懸決問題都比較能順利解決。一九二八年九月國聯大會開會時，白里安答應斯脫萊斯曼的要求，表示願重新整理賠款問題，與提前撤退萊因駐軍。一九二九年初各國專家於是龐集巴黎，研究一新賠款計劃，以代替道威斯計劃。結果楊洛計劃成立，賠款總額減至三十餘億。接着各國代表集會海牙二次，決定將楊洛計劃付諸實行，法國亦允將萊因駐軍提前撤退。

一九三〇年的五月確是戰後歐洲外交史上的一個蜜月，曾給與歐人以很大的興奮及希望。楊洛計劃從那時開始實行，萊因駐軍亦在那時全部撤退，而德國的經濟與領土也在那時纔恢復獨立。這種種事變都可說是法國對於提倡和平的貢獻及其愛好和平之表示。白里安以此後的國際風雲定必日趨緩和，他的歐洲聯盟計劃容或有成功之希望，故於五月十七日將歐洲組織計劃，除蘇俄和土耳其而外，分送歐洲其他二十六國。

然而『法國式的和平』——即維持法國霸權的和平——是否能穩定歐洲政局，德國的要求是否就此滿足？法意衝突是否就此消滅？凡此種種均屬疑問。所以一波甫平，一波又起了。

## 五 動搖中的法國安全

在昔賠款計劃尙未澈底解決，與萊因駐軍尙未撤退的時候，德人以西顧之憂未釋，尙不敢公然提出重劃東邊之要求。現在可是不同了，經濟財政既已解除束縛，而萊因區域又已恢復自由，於是舉前所未敢行者，今敢運動於國家之內，前所未敢言者，今亦敢高唱對於國人之前。一時修改緬波邊壤之聲，甚囂塵上，歐洲風雲亦頓呈緊張。希特勒領袖下的國社黨就是在那時開始顯露鋒芒的。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的總選結果，它竟由十二席驟增至一百餘席。這種主張，毀和約的勢力，如此風起雲湧，咄咄逼人，怎能不使法國憂心如擣，惴惴不安呢？

法德協調從此時起固頓呈破綻，而法意間與法英間的邦交也未見得轉佳。因為倫敦海縮會議中海軍平等問題未獲解決，和殖民領土問題兩國爭執不休，所以法意間惡感甚深，時呈決裂之勢。慕索里尼在里福納（Brivona）與福羅倫斯（Firenze）的演說，甚且以戰爭威脅法國。加以此時在英國方面，親法仇美的保守黨早已出位，換來了一個親美仇法的工黨內閣，更

使法蘭西的國際地位陷於孤立。一九三一年六月胡佛延付戰債一年的宣言雖曾得獲法政府的接受，但是這種接受與其說是出於她的情願，毋寧說是她的孤立處境迫使的結果。到了這步田地，格多賽方始恍然於羅加諾協約與非戰公約的精神已若曇花一現，不復存在，它於是不能不戒懼備至，以防萬一了。

## 六 最近一年來的法國外交

一九三二年六月總選結果，右派失勢，左派赫禮歐登台。當時擺在他眼前的有四個嚴重問題：（一）賠款；（二）裁軍；（三）法意衝突；（四）德國法西斯蒂運動的進展。老實講來，法國對意的要求是願在可能範圍之內予以讓步的。原來法國的最大隱憂不在意，而在德。故只須慕索里尼不強人所難，她是願意給予代價，以買得他的好感的。乃終因慕氏要求過奢，和法國堅持雙方不讓，雙方無法妥協。於是法國在德國之外，又增加一個可怕的敵人了。

德既世仇，意又交惡，而俄又素欠好感，於是在歐洲強國中法尚可引為己助者厥為英。在這

一年當中，法國的外交政策全以聯絡英國爲主旨。如英助法，則以兩強之勢力，不難應付德意兩國，反之，英而守中立，反法，則法勢難抵抗德意的聯合戰線。洛桑會議中，法之所以情願取銷賠款者，亦爲英國脅迫之結果。然法亦希望能由君子協定之成立，而復活「誠摯協商」之精神。洛桑協定，原是格多、登想用以緩和德國、法、西、斯、蒂運動的一種策略。詎知法國愈讓步，德國的要求愈苛刻，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德政府竟照會法國要求軍備平等。如法接受其要求，則法之軍力勢必遠遜於德。這因德國人口之衆與工業之盛遠非法國所能望塵而及之故。所以法政府毅然覆文反對，而英亦不以德之企圖重整軍備爲然。

德國軍備平等的要求是與法國的安全有密切關係的。法政府在裁軍會議中始終斤斤於安全之要求者，就是爲了這個原故。先安全而後裁軍，這就是法國恪守毋違之原則。我們一觀其歷次提出之裁軍計劃，即可了然。現法以迫於英美的要挾，雖曾於上年十二月承認德國軍備平等之原則，但是原則上的平等予法國的安全未見得有多大的危險。所以，她此後在未獲得英、美切實保障其安全之前，對德的實際軍備平等是不願輕予讓步的。

正當法國需要英美允予保障其安全之時，她忽以戰債問題與美構怨。平情而論，洛桑協定既准許德國不續付賠款，則法之停付戰債，似亦理所當然。不過美法兩國政府在事先既無諒解，而英又願踐約照付，則爲法國之榮譽着想，自不能不償付十二月十五日之到期戰債。要如此，她纔能博得華盛頓之好感，也要如此，她纔不致一面高唱維持條約的尊嚴，一面自己違反條約的規定，言行矛盾。眼光遠大之赫禮歐所以力排衆議，主張償付戰債者其因在此，而最近法政府所以避選赫禮歐赴美談判者其因亦在於此。

一九三三年二月希特勒登台掌政，法德邦交因而更形緊張。接着喜登堡（Hitlenberg）運械事件，德意匈締結密約之傳聞，與四強公約的擬議又接連而來，四強公約之主旨爲修改和約，實無異一反法的結合。須知和約爲法國優勢所寄託的，法寶和約一日得而維持，則法國的優勢即一日得而確固，此爲極其明顯之事，故慕索里尼之提議一經發表，法國與其盟國即首先提出異議。後來法政府雖曾接受四強合作之原則，然按其覆文之內容，則所謂接受實無殊一變相之拒絕耳。

## 七 結論法國外交之回顧與前瞻

由上所述，可知法國在戰後的外交政策始終一貫，曾未稍有轉變。即時至今日，她的政策亦尚未脫前此的窠臼。安全、保障、與維護和約，就是她的兩大國策。她所以結盟比波捷諸國，以反對修約之政治集團者，以此她所以不願輕予裁減軍備者，亦以此。

法既佔有歐洲的優勢，而其國運之隆盛又爲自拿破崙第一以來所僅見，則其所希求者當然只有和平。和平而能維持，則其優勢即日臻鞏固。區區物質犧牲——如賠款之取銷——不在乎，撥款救濟奧國亦不在乎，只須不滿歐洲現狀的國家願放棄其擾亂歐洲和平之企圖。

法既亟求和平，故努力於和平組織，始終不懈，非戰公約之締結，與歐洲聯盟之擬議，要亦爲其努力和平之象徵。而法俄不侵犯條約之成立，亦爲其致力和平之明證。

惟和平非一國之力所能維持，必須羣策羣力，共同進行，而且彼此的安全有所保障，方有濟於事。於是除結盟比波和「小協約」外，法猶竭力聯絡英美，以厚和平勢力，並以遏制法西斯蒂。

之猛進。須知法英美三大民主勢力如能站在同一戰線，則法西斯蒂之德意雖躍躍欲試，企圖推翻歐洲現狀，恐亦不敢輕動干戈，孤注一擲。故十四年來聯絡英美失敗之法國外交政策日後究能否有所成就，不僅爲其安全所繫，而且爲歐洲現狀之維持所繫。

過去、永遠、不會、完全、過去、的、它、伸、張、到、現、在、胎、育、着、將、來。這是凡具歷史知識的人所不能否認的。從過去的史實看來，以及從歐洲的現狀看來，作者敢說法國此後的外交，必仍循舊轍，以國際聯盟爲其播音機，以維持和約爲其護身符，以確保盟國爲其發展勢力之工具，以聯絡英美爲其安全保障之台柱。這樣，她的優勢纔能保持於不墜了。

二十二年五月八日上海。

## 戰後德國的對外政策

賴希如

——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二年——

### 一 引言

德國國家社會黨專政以後，希特勒支配下的德意志，對內政策，對外政策，根本澈底更張，而貫以新大日耳曼主義運動。這種運動，不僅使民主共和的德意志，展開一新局面，且為歐洲政局變遷與和平前途的新關鍵。故對於戰後德國對外政策之史的檢討，實為研究國際政治者當前的重要問題。

戰後的德國情狀，內而俾斯馬克帝國基礎之崩潰，二度流血革命，財政金融破產，經濟恐慌，雖然在社會民主黨領導之下，產生魏瑪憲法，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而其政治的基礎，却在社會民主黨國家保皇黨國家社會黨人民黨民主黨天主教中黨以及共產黨各種不同傾向運動



之下，始終還不會確定鞏固。其國外關係，停戰以後，交付戰器，割裂國土，放棄殖民地，負擔賠款，聯軍進駐萊茵河區域，凡爾賽和約的鐵券文書，把德意志的驕悍民族好如絆了一個約束的圈套。加以匈牙利與意大利脫離德國關係，波蘭捷克斯拉夫獨立，則更使德國不勝四面楚歌之感。德意志的民族怎樣從這戰敗破產之後，內憂外患艱難之中復與他們的國家？德國當時當局的政治家外交家怎樣提出和考量他們的問題？他們採取什麼政策一步步解除凡爾賽條約的鐵練，恢復他們國際的地位？在什麼情況之下，他們獲得外交的勝利？他們依靠什麼力量而獲得此種勝利？當今的德國與列強關係究竟怎樣？在歐洲政局上佔何等的位置？這些都是作者個人在今年暑假短期柏林旅行中所注意及的問題。茲篇僅爲論述歐戰以後，希特勒專政以前，德國的對外政策，作歷史的檢討，而追溯當今新德意志對外政策之發展來源。

## 二 德國外交的傳統精神

拿破崙、失、敗、維也納、會議、與、威廉、第二、出、亡、凡爾賽、和、會、爲、歐洲、百年、政治、變、局、的、兩、條、鴻、溝。

維也納會議的結果，使法國疆土回復革命戰爭與帝國戰爭前的原狀，確定歐洲的均勢。而法國與德奧對峙的新局亦以形成。普法戰爭的結果，法割亞洛兩省，德意志帝國興起，實開歐洲大戰之初源。俾斯馬克爲維持其普法戰爭所獲得的勝利，孤立法國，握大陸之牛耳，以是有德奧俄三帝同盟，續而轉變爲德奧意三角同盟。依據政治地理形勢，德國位於中歐，欲使東陸無後顧之憂，則必聯俄以自固；欲得海上之聲援，則應結英而作助；故有『東熊』、『西鯨』之稱。或聯『東熊』或結『西鯨』，這是德國歷史上習用的政策。然而歐戰以前的德國外交政策，常受兩種情緒之支配：一面極端自信德意志之超越；一面又極端蔑視他國。其結果遂使失去同盟，而自陷於孤立。俾斯馬克爲溫慰法人的情緒，雖嘗鼓勵法國當局向東京發展，以中國屬領陪送人情；然而法人處心積慮，法俄聯盟告成，實奪德國東熊之後援，德屬波蘭因之受危。皮羅繼俾斯馬克主政，雖屢圖收西鯨之助，然而德國帝國主義之發展，與大英帝國主義衝突日以激增，卒無效果。法俄英三國協約告成，繼而意大利與匈衝突之增進，脫離同盟，遂使德國完全陷於國際之孤立，唯有持武力而求解決。這固然是強國外交，雄視獨步，必不可免的結果，而亦與當時國際形勢大有關。

係的。

惟德意志帝國的外交，常有勝於他國，而爲衆口所共贊者，乃其步趨之嚴整，與方法之精細，殊值得我們重視與加以研究者。

### 三 自凡爾賽到羅加諾

怎樣分別一八一四年維也納會議與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會？這不僅是一世紀前後戰爭狀況的絕然懸殊，與德法兩國所處的地位適爲相反；而且戰爭結果情勢之嚴重，協約戰勝國與戰敗國會議的形式亦完全兩樣，甚至會議之組織規模與技術亦絕難相比。維也納會議席上，法國代表泰列琅尙可逞其外交天才，與梅特涅爭一個旗鼓相當；而凡爾賽和會上，德國代表郎查却祇得接受簽字，雖然是申明抗議的。當然普嘉賚，克勒蒙梭是眼見當年法國接受俾斯馬克和約的歷史悲劇，五十年後的此時，是決心要替法蘭西民族爭回一次光榮。

凡爾賽和約以後，一切德國政治家外交的努力，不用說是集中於求國家的自由，找尋最快

捷和最有效的方法，以解除條約的束縛，獲取政治上的平等，而恢復其國際的地位。一九二二年德俄拉柏羅條約，是德國戰後第一次的外交活動，使德國打斷對外之均衡，轉而「東傾」。然而使德國恢復國際政治地位者，實爲一九二五年的羅加諾安寧公約。羅加諾會議的結果，使歐洲政局得以穩定，同時德國加入國際聯盟，其對外政策亦從此開展。與羅加諾會議同時進行的德俄協約，復於次年簽字於柏林。此德國對外政策之成功，遂使其國際地位益以鞏固。在這時期的德國對外政策，實爲「親法」而兼「聯俄」，爲戰後德國外交最重要的階段。中經賠款問題，由道威斯計劃，而楊格專家委員報告。一九二九年與一九三〇年，兩次海牙會議，審查賠款問題，協定減少賠款，並實行提前萊茵河撤兵，這時期德國外交的成效，又開一新段落。降而一九三一年，德奧宣布關稅聯合議定書，實予協約國與凡爾賽條約一大打擊。一九三二年德國對軍縮會議軍備平等之提議，與同年洛桑會議，德國對於解決賠款問題強硬之要挾，在外交的策略上，又不祇由守勢而轉變爲「攻勢」，此誠爲國家社會黨專政後希特勒向鐵腕對外政策而邁進之序幕。

在凡爾賽和約簽字以後，舊德皇駐美大使璧士多夫公爵（Comte Bernstorff）於八月間在民主黨柏林大會報告中，曾對於當時德國對外政策方針，作一詳確的說明。他說：我們認凡爾賽和約是事實，但政府已爲有抗議的簽字，則法律不能限制我們用一切方法使其修改。德國第一個目的在獲得加進國際聯盟，其次在國聯中進行修改和約。然所謂國聯者，自然不是不完整的疆體，由反德同盟前身而來的今日國聯，可變爲適合德國理想，包含世界各國，建立於平等基礎之上的明日國聯。另一根本的需要，則直接恢復與各國經濟的關係。解除武裝後的德國，政治不能向外發展，但他能夠以經濟和平的方法獵取世界的市場。所以與各中立國和新國家經濟協作以外，應急切恢復與舊敵國商業的關係。我們已與意大利開始實行，應同樣急切與英法恢復經濟關係。

就此說明，凡爾賽和約以後的德國對外政策，實具三主要目的：第一，承認凡爾賽和約爲事實，而以各種方法進行修改和約；第二，獲得加進國聯，使變爲適合德國願望有利於己的國聯；第三，恢復與各國經濟關係，以和平方法競爭世界市場。一九一九年以後的德國，雖已失去實力，而

其實力的觀念却永遠存在。

這時德國唯一的同病相憐者是蘇俄，因為革命後的蘇俄，正如德國同處於艱難孤立地位，尤其於經濟上急待德國的援助。故其時聯俄派的主張甚盛，特別於軍事將領中占勢力。惟是德國大總統億北（Bebel）獨持相反的政見，使之復歸沉寂。就他的政見，在若干年以內，德國應採取親善政策，留自由選擇之手，以候時機。億北此種政見之影響，終使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蘇俄對德聯盟之原意，歸於失敗。

由凡爾賽和會到羅加諾會議中間，歐洲政局最艱難搖動的時期，却為一九二二年。法國內閣普嘉賽當政，為賠款保障問題，作種種威脅。英內閣路易喬治的政策却正與法國為正面之衝突，努力於吉諾亞會議活動，擬邀蘇俄參與歐洲經濟財政之建設。德國在此新局勢之下，因德代表拉得那（Rathenau）之堅持主張，在吉諾亞會議之中，突與蘇俄代表訂立拉柏羅條約（四月）。西蒙斯（Simonds）在他的歐洲戰後史（Histoire De L'Europe D'Après Guerre）中，稱此條約的消息，為「未聞的晴天霹靂。」就法國而觀，此條約不祇為俄德直接軍事同盟。

在法國安寧上，一方面法國本國，別方面波蘭，實爲雙重的威嚇。其實，一切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所確立的中歐國界制度，因之危急。『拉柏羅條約』是戰後德國外交政策開展的頭一步，不僅使德國獲勝，在此時期，與西方列強進行協商之艱難更明顯的使德國東境得有一利益而需要的保障。此『東傾』的政策，實爲後來德俄柏林條約之張本。惟其影響的結果，却使波蘭，捷克，拉夫，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比利時，在新恐怖之下，更確定地站在法國方面，又爲後來羅加諾安全會議之序幕。

#### 四 斯特萊斯曼與羅加諾公約

一九二三年，斯特萊斯曼 (Stresemann) 接任外交總長以後，德國的外交政策別開一新時期。他爲保障德國，常放棄其所屬人民黨的利益，主張整個德國對外之一致努力。在德國外交史上，嘗有以比之俾斯馬克者。斯氏當德國內政外交最艱難的時期，鼓其無上的勇氣，內與國會中反對黨奮鬥，外與列強作和平的外交戰。國內各黨派常集中攻擊。然而却無人敢倒其外交政

策之否，這固由於他的任勞任怨，非常能力與柔軟精神，有以致勝；而其實事求是的外交政策，正切合時代的需要，此實其成功之由來。斯氏根本的目的，在維持德國與列強條約的平等。他所進行的政治路線，而且是他所信爲捷徑者：首使德國加入國際聯盟，和簽訂羅加諾公約。在繼續維持德俄關係之下，同時對波蘭進行鄰國的親善政策。

斯特萊斯曼不僅是機會主義者，而且是唯實主義者，當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德國與歐洲政治最險惡的時期。道威斯計劃接受問題，尤引起德國內部政變。當一九二五年初，路得（Luther）內閣和斯氏確定對外政策的新形式，那時德國政見分爲兩派：一爲「東向」派，一爲「西向」派，前者以國家主義各黨爲中心，主張永遠抵抗凡爾賽條約，拒絕加入國聯，不與戰勝國協作，而力主維持德俄聯盟，求將來武力解決。斯氏的「西向」政策，則以爲欲使德意志復興不得不與協約國協作，而後始能達到。適當其時，英國麥唐納組閣，法國白里安繼赫禮歐主持外政，復以倫敦會議的經驗，遂使歐洲輿論爲一大轉變。英外長張伯倫尤深知法國的內衷，和表同情於德國。以是在斯特萊斯曼，白里安，張伯倫三頭密談之下，產生著名的羅加諾公約。



羅加諾會議舉行於一九二五年十月，而公約至十二月始完全確定於倫敦。羅加諾安全公約分兩部分，包含五條約，首爲親善條約，與一切衝突求公正之解決，或由於司法解決，或由於強制執行。次爲安寧保證條約，以司法與實力爲裁判。再次爲德國與波蘭、捷克斯拉夫關係條約，及德國與法國、比利時關係條約，而最後德國與法比條約，却參加以英國和意大利的簽字，爲安寧之保證。羅加諾公約不僅使德國東境西境安寧問題得一保證文書，同時歐洲政局，自凡爾賽條約以後，重新得到一個穩定。白里安後在一九三一年演說：「羅加諾公約是補足凡爾賽條約，因美國拒絕簽字，德國未給與的保證，得代以新的保證。此條約確定德國與法國、國境的關係……」然而許多法國人之視羅加諾公約，又認白里安太讓步，尤其參加凡爾賽和會的巨頭克勒蒙梭，在他的勝利的偉大與可憐 (Grandeurs Et Miseres d'une Victoire) 中，直詆羅加諾公約爲脆弱的精神。反之，許多德國人之詆毀羅加諾，也視斯特萊斯曼過於軟弱。但斯氏却又是一種見解，在稍後嘗答覆廣問說：羅加諾絕不放棄德國的領土和人民，羅加諾的結果使萊茵區域獲得安全，承認殖民地代管德國的宗主權，羅加諾不是終點，而是新進步的開端。雖然當

時國家主義各黨拒絕分擔條約責任，終而退出路得內閣，但其他大多數政黨領袖，則聯合贊助爲萊茵河撤兵，沙霞投票公決，德奧聯合等共同奮鬥，同時在國聯中進行新的活動。左派的報紙，對於德國脫離特殊情況，加入國聯，尤多滿意的表示。

羅加諾政策之確定，自然斯特萊斯曼受了不少英國駐德公使達白龍爵士（Lord Abernethy）的影響。『維持大陸均勢，』爲大英帝國傳統政策，雖各自治邦的對外政策未能與英國本部盡同，而凡爾賽和會後法國勢力之膨脹，實使英國側目，在和會尤其在吉諾亞會議中，已引起英法不斷的衝突。當一九二六年達白龍旅行柏林之際，一時遂盛傳英德同盟之議。且其時英國與蘇俄之衝突，尤給德國傳統之外交部以最適當的機會。斯特萊斯曼雖很難堅持其政策的觀點，然卒效憶北總統拒絕莫斯科的精神以拒絕倫敦代表，寧保持德國自由選擇之手，等候時機選擇同盟者。

在西向政策進行中，斯特萊斯曼同時不能忘記歷史上的『東熊』蘇俄。他同時於一九二四年開始與蘇俄協商，這協商與羅加諾政策進行相照應。羅加諾公約宣佈以後，蘇俄明瞭德國

與西方協約並未有若何政治軍事協約，俄德的協商轉以順趨直下，根據拉柏羅條約而來的德俄柏林條約，遂於一九二六年四月簽訂成立。德國國家主義黨的報紙，對於羅加諾公約大為責難，而對於德俄柏林條約却深為贊許。但斯特萊斯曼在此對東俄條約中，同樣維持他根本政策的觀點，即是在不防礙與西方列強協作之下，對蘇俄訂立可能的條約，而保持德國自己的自由行動。

斯特萊斯曼整個的對外政策，簡單地說，是憶北總統政策觀點之回照。斯氏鼓其餘勇，最後復努力於海牙會議。海牙會議同時解決兩大問題：一為賠款問題，一為萊茵河撤兵問題。然而一九二八年八月巴黎公約簽字之後，日內瓦國聯會議對萊茵河撤兵問題已特別重視。因為巴黎公約之精神贊助，德國對外政策積極左傾，集中於修改凡爾賽和約，與萊茵河撤兵問題。這予法國回頭反攻之開始，白里安在日內瓦演說之受質問，乃是羅加諾精神之壽終正寢。

## 五 西方問題德法關係與萊茵河撤兵

德法問題的中心，爲凡爾賽條約保證與賠款保證問題，而問題之關鍵却爲萊茵河駐兵問題。佔據萊茵河左岸，設置軍區，爲和平保證之議，原爲福煦將軍所提出。原議爲分割以附屬於法，比以爲防德國報復之保險。法代表發揮此論於和會，擬使萊茵河左岸與德國分離，另建獨立國，受國聯監督。英美代表反對法國採用此種路易十四和拿破崙侵略政策以分割德國，尤其路易喬治絕不願法國建立「相反的亞爾薩斯，洛林」兼之萊茵區域產大量之煤，以之供給洛林鐵鑛之用，尤足助長法國經濟帝國主義之發展。經長期的爭議，結果定萊茵區域國際共管制度，由法比英美共同駐兵，劃分三區，按每五年撤兵辦法，應至一九三五年，始能撤盡。但凡爾賽條約四百三十一條載明，如德國能切實履行條約時，則可先期撤兵。

萊茵區域，淪爲國際共管，對德國並實行武裝監視。目視耳聞，實令德人以太難堪。德人嘗專辦萊茵視察雜誌 (Rheinische Beobachter) 以研究考察，直至一九三一年撤兵後，始易其名。一九二三年以賠款問題，普嘉寶當政，進佔湖夏河，隨之以萊茵分裂運動，在法國軍事保護之下，嘗有萊茵共和國運動，尤爲德人對法惡感之頂點。

德人之對凡爾賽和約，已有如德人肯尼 (F. Kern) 在其德國輿論與法國 (L' Opinion Allemande et la France) 論文中所說：『凡爾賽條約中的法國思想，實際即拿破崙或路易十四的思想，非常可惜，已深深銘刻於德意志的靈魂中。』復以萊茵河駐軍問題，益使世仇的德法惡感日劣。而且德法之衝突，固亦不僅限於西方問題。戰後的法國，亦正如普法戰爭後的德國，為維持凡爾賽條約的神聖，為鞏固其戰勝國執大陸牛耳之地位，復於東方：一面極力提攜波蘭，一面極力援助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小協約國之組織。此於法比協力控制德國西方之外，復為東方對德同盟新陣線之佈置，實使德國陷於孤立包圍地位。凡爾賽條約限制德奧之聯合，尤令德國大不滿。故肯尼復云：『法蘭西永遠是德國前途的障礙。』

從一九二四年起，開始德法接近的新時期，德國政局右傾，而法國同年大選舉結果恰相反，左黨赫禮歐、白里安相繼組閣，對德政策大為改變，遂使德法日以接近。此即羅加諾精神所由產生，亦即斯特萊斯曼和白里安的德法親善時期。及至一九二八年，德法雙方政局變更，法國右黨執政，德國政治左傾，德國關係日形惡劣，復以巴黎公約影響，已如前述，萊茵河撤兵，與賠款問題，

這時實爲德法爭論之中心。道威斯賠款計劃重新請專家審查與實施問題，和萊茵河提前撤兵問題，遂於是年九月提出於日內瓦。德法雙方各持論據：德國視直接撤兵爲德國主權之所在，而法國則認爲撤兵問題與賠款密切相關。兩國觀點恰相反，法國所依據者爲凡爾賽條約，而德國則根據事實，認列強維持駐兵德境與現行國際和平政治相背馳。結果兩事同時進行，爲後來海牙會議之根據。

楊格委員會專家報告，於一九二九年六月完就，將道威斯計劃暫時的性質，重新確定按年支付賠款辦法，並創設國際銀行，以爲國際付款機關。是年八月海牙會議，提出審查，決算賠款。在會議進行中，德國內政發生兩重變動：內閣改組之下，同時財政恐慌。海牙會議在艱難情況之下，進行協商，最後依英代表財政總長史懋當之議，將楊格專家報告賠款結算，核減爲百分之八十。結果成立楊格計劃議定書，與萊茵河撤兵協定。一九三〇年正月，第二次海牙會議，簽訂楊格計劃確定議定書，同時成立撤兵動員協定，賠款與撤兵兩大問題，至此始告一段落。

萊茵河駐軍，究竟留給德人何種感想？國際共管首席委員法人提那（Tiran）在其所發

表的法人代管下的萊茵 (La France Sur le Rhin) 中曾述德國關員嘉多夫 (Kardorf) 一九二八年在國會演說云：「一八七一年的佔據史已經寫着，德國軍隊能克盡其義務，實足爲德人尊敬人道之自豪。湖夏河之侵佔史，與萊茵區域之佔據史，將有一日公佈，使全世界人驚訝，聯軍在佔領區域，所盡的義務是何種粗野。」

海牙會議與萊茵河實行撤兵，是西方問題之一大結束，亦即爲斯特萊斯曼德法親善政策最後努力的收糧。雖然與登堡總統當國老成，亦參預羅加諾與楊格計劃的責任，然而德國反楊格計劃，與修改凡爾賽條約的運動，因內政之艱難，財政恐慌，經濟恐慌，與失業人數之激增，聲勢日形擴大。斯特萊斯曼之退位，是德國對外政策轉向急進的明顯表示。

萊茵河撤兵以後，萊茵觀察雜誌因時更改標題，名爲德意志的前進 (Deutsche Grenzlande)。在一九三一年四月號中，德國關員維士 (Wirth) 博士在其短篇中說：「現在萊茵區域已回復自由，你（按指雜誌）應轉向東方，北方，南方。」這很明顯地指示德國對外政策的新方向。

## 六 東方問題波蘭長廊丹澤

萊茵河撤兵以後，開始一個東方問題討論的新時期。所謂東方問題，即德波關係、長廊問題、與丹澤自由市。

波蘭現在是一完全獨立國，而且已有十餘年的歷史，可是德人之視波蘭，却深受傳統觀念之支配。波蘭處德俄兩大國之間，受蘇維埃政治與日耳曼主義雙重的影響，而與西方民主政治國家法國親善攜手，實處於最困難之地位，嘗有人說：波蘭為將來世界戰爭的火藥庫，實非無根據之言。

百年以前，普魯士著名史家史當其爾 (Stenzel) 對德波關係，嘗下其結論曰：「普魯士君主國與波蘭共和國不能並列而存。」俾斯馬克生平政策，即是怎樣使波蘭急速地日耳曼化。他於一八六三年嘗於致駐英公使書中說：「波蘭之獨立，是維斯杜拉河上的法國勁軍。」於此足見德之欲永有波蘭，不僅在擴張國土，使與東普魯士聯成一片，同時亦所以奪法國之外援，使無



東顧之憂。俾斯馬克認為普魯士與波蘭是生存競爭，故一八八六年在普魯士國會中復說：『打擊波蘭人直至使其無生存的勇氣為止。我們雖然無限同情於他們的情況，但是，如果我們要生存，我們便應該使之殲滅。野狼不是應負責任的，僅僅上帝使其如此。』這種傳統的觀念，現在仍然存在德人腦海中，待機復活。

凡爾賽條約第八十七條，承認波蘭為完全獨立國。然而德人認波蘭之存在為德國之恥辱。因此視波蘭為朝生暮死的國家，而名曰『季候國』(Saisonstaat)。戰後德國對波蘭的政策，是建立在此基點上，使波蘭的『季候』盡量地縮短。德屬波蘭之放棄，丹澤之改為自由市，與長廊之存在，隔斷東普魯士之聯絡，德人永遠不能忍受。他們說：我們尊重西方的新疆界，但是我們不能允許於東方。我們亦不向波蘭宣戰，但是我們志願有一天改正東方不合理的疆界。斯特萊斯曼一九二七年九月在日內瓦宣言，絕不更改此政策觀點，他說：『羅加諾公約之關係伸及東方一如西方。』這就是說在東方，一如西方，德國不願以戰爭改變其疆界，但此外不能加增一辭。

史莫格其士基 (Smogorzewski) 在最近德國緩和的條件 (Les Conditions del'

Apaînement (Germano-polonois) 文中，指示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當中，德國曾經對波蘭實行經濟絕交政策，禁止波貨入境，同時停止對波輸出。一九二一年俄波和約告成，繼以一九二三年列強承認波蘭國境，復以一九二四年波蘭財政之健康，卒使德國對波蘭第一次的壓迫政策歸於失敗。德國欲以經濟困迫波蘭，復於一九二五年實行對波關稅戰爭政策。這足以表示德國對波蘭政策，雖然僅採取經濟和平的方式，而對波蘭絕不放手，積極干涉的精神，却未嘗稍變。

然而畢蘇斯基 (Pilsudski) 將軍一九二六年的政變，却甚得德人同情，尤其左派報紙因爲畢蘇斯基將軍反對波蘭右黨政策之認德國爲世仇，而法國爲唯一友邦。畢氏是軍事獨裁政治領袖，他唯一的信念，即是『唯有武力始能置國家運命於均衡』。一九二九年海牙會議清理賠款問題，同年以同樣的原則解決德波兩國債務問題。一九三〇年德波商約告成，同時終止關稅戰爭。這是德國對波放棄『朝生暮死國家』的觀念，轉換親善政策的新階段。

雖然德國對波蘭在邦交上已轉向和緩政策，然而對東方邊境却同時實行軍事殖民政策。

羅登道夫在其備忘錄中，嘗確定於白令海沿岸，而延至黑海裏海之間，實行殖民政策。此種成見同樣出現於現在德國的軍事精神中。在畢蘇斯基將軍的波蘭武裝獨立政策之下，德國每年發送於東方邊境之退伍軍士幾四五萬人，容納於警察，稅關，森林看守，或實業之中。此種預備兵皆戰爭經驗軍士，就軍事言固為戰時有組織有紀律之勁旅，就政治言尤所以擴張殖民，預備越界，使邊境日耳曼化。此制非新發明，羅馬用之而獲成功，現在德國又復重新應用。

凡爾賽和會對於『長廊』(Corridor)問題決定之根據，據美國代表及專家之記載，不僅因為波蘭需要一通海之道，其實問題本已存在於語言地理中，因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為波蘭人，但是長廊劃歸波蘭，使東普魯士與普魯士本部失其聯絡，德國始終不能承認。德國國會議主席羅白 (Loebe) 於一九二七年說：『德國抗議反對長廊，雖然全世界共認居民為波蘭人。』於此，足見德人對於長廊之關係，絕不能放棄。

丹澤改為自由市，由國聯監督，德波同時不滿意，而僅利於英國，為商品自由輸入之口岸。德人之重視丹澤，亦正如長廊。

## 七 攻勢的對外政策

一九三〇年七月國會大選，是德國政治轉變新時期之開始。米勒（Miller）內閣因楊格計劃之批准實施，與財政預算之超出，陷於極困難的狀態，卒於三月間辭職。中央黨領袖白魯寧（Brüning）繼起組閣，宣言改革財政，以未得多數，解散國會。是年六月，依海牙條約，爲萊茵河最後一次之撤兵，德國領土遂完全恢復自由。七月大選，各政黨之宣傳集中於反對凡爾賽條約之束縛，反對楊格計劃之重負，反對長廊之謬論，及不公正的東方疆界。選舉結果，國家社會黨大獲勝利，由十二名而驟增至一百零七名議員。自一九三〇年白魯寧內閣，中經一九三二年總統選舉，與登堡重復當選，巴本（Papen）施萊爾（Schleicher）相繼組閣，而至一九三三年國家社會黨執政，在此期間，德國內而慘遭財政經濟之恐慌，失業人數日增，復以國家社會黨勢力之膨脹，爲政治前進之有力推動；外而萊茵河駐軍已盡撤，使德國政治前途得見曙光，復以意國首相墨索里尼對德國修改和約之聲援，與世界經濟恐慌之影響，遂使德國對外政策向前突進。

漸漸由守勢而轉變為攻勢。其最顯著者：一爲一九三一年德奧關稅聯合談判草案之突然宣佈，一爲一九三二年洛桑會議對於賠款問題之強硬要求，次爲德國向軍縮會議毅然作軍備平等之提議。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九日，柏林和維也納政府突然宣布兩國關稅聯合談判草案，事出倉卒，一時使歐洲政局萬分驚駭。殊不知德奧關稅聯合的計劃，醞釀已久。原來協約國對於德奧聯合雖加以限制，但他們不能使奧國在政治經濟地位上獲得獨立國滿足的需要。奧國爲滿足其自身需要起見，遂依傳統的歷史，與德國聯合。溯自一九二〇年奧國君主政體崩潰以來，內政陷於危險狀態，大多數意見均傾向於聯合。嗣因國際聯盟之援助，始使財政復興。此時德國內值金融恐慌，外則患亂相逼而來，與奧聯合之議即告中斷。及至一九二五年，德奧兩國財政復興，羅加諾公約之結果，復使德國恢復其國際地位，德奧聯合之議重新復活。當然一切的德奧聯合運動，德國是其中主要動力；因爲德國對於德奧聯合的傳統政策不但絕不能放棄，而且德奧聯合正爲大日耳曼主義發展之厲階。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九日，德奧突然宣布關稅聯合談判草案，實予協

約國一意外的打擊，怪不得法國白里安手慌腳亂地說：『確然事實的內容是嚴重，而所用的方法尤爲嚴重。』我們告訴德國和奧國，他們的行爲是違背凡爾賽條約和聖日曼條約，特別一九二二年十月的約章，他們沒有權利作此不合法的行爲。『英國以德奧並未諮詢國際聯盟，同樣抗議德國的鄰國，尤其新興的捷克斯拉夫，以德奧經濟聯合，將爲政治同盟之初步，大起反對。結果請海牙國際法庭裁判，結果否決。雖然德國外交總長寇蒂斯（Curtius）宣言，德奧關稅聯合僅爲救濟兩國工商業，實行經濟之協作，並認此種地方經濟之協作，實爲歐洲協作之初階。然而德奧關稅之聯合，實不祇爲德國向匈牙利，向羅馬尼亞，搭一條聯絡東南橋樑，實與整個中歐有關係的問題。

萊茵河提前撤兵，使德國在政治上完全恢復自由。一九三二年七月九日洛桑條約，把德國賠款問題作一總解決，減爲三十萬萬馬克，復使德國在財政上減輕重負。洛桑會議之召集，固由於自一九三一年五月以來，德國財政金融恐慌，經胡佛總統停付戰債一年著名的提議，爲暫時之救濟，最後據戰債專家判斷，認德國暫時無付款能力，因此會集債權國與債務國總揆，而開賠

款問題最後之會議，然而自一九三〇年大選以降，德國是最左黨以至最右黨之積極反對揚格計劃實施，實爲德國要挾取消賠款主要的推動力。洛桑會議誠如張伯倫所說，在極艱難中進行。洛桑會議的結果，固未能如白魯寧之預定完全取消賠款，卒依巴本之最後提議，以三十萬萬馬克解決；然而法國的債務不變論，在赫禮歐的和平政策，「敬禮一切國家」美辭之下，只好實際讓步。在洛桑會議閉會之日，德國代表巴本第一次用德語演說，而且帶着傲慢的神氣宣言：「賠款的時代閉幕。」德國的政治從此又開一新的篇幅。

而尤足以顯示德國對外政策之轉取攻勢者，則爲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對於軍縮會議之提議。凡爾賽條約對德國軍備加以限制，並設置監督委員會。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日內瓦條約，取消對德軍備監督，實使德國廢除凡爾賽條約中最嚴酷的鐵鍊。一九三二年德國的裁軍提議，已經不是爲保持德國軍備，在政策的意義上，是一種反攻。他要求一切國際聯盟的會員國，應該如德國同樣裁減軍備，尊重國際聯盟，實行會員國法律上平等之義務。此德國的軍備平等論，不但發動世界視聽，且復引起意大利的同調應聲，又在英國相當同意之下，一時似使法國陷於孤

立的地位。

總之，自白魯寧內閣至巴本與施萊輒內閣，德國的對外政策已愈趨積極，而巴本和施萊輒內閣，尤爲積極活躍，勇往直前。蓋巴施兩氏爲與登堡總統的親信，其對外政策之攻勢，實兼外交軍事兩種傾向。施萊輒將軍內閣之軍備平等提議，尤有軍事傾向駕乎外交之上的趨勢，此時外交的重心，實由外交部而轉移至陸軍部。然而巴本和施萊輒的對外政策，固不可謂不積極，但究竟還未能滿足德人的要求，因此等到希特勒迎合民意，登高一呼，即不啻望風景從，爲大衆所一致擁護，而步上德國的政治舞台，渴望他實行更積極的對外政策了。

## 八 結論

在這簡括的敘述中，大概可以看見戰後德國的對外政策，是經過東傾，維持東西均衡，與由守勢而轉攻勢之幾個時期，而至現在的新大日耳曼政策。此種對外政策，步步開展的形勢，固然由於時間的進步，然而顯然有一種偉大的力量爲其推動者，是爲日耳曼民族團結對外的精神。



簡言之，即是『國力』。這不僅於人民政治輿論中處處可以發現，而且德國政府就對外政策上，在國家社會黨專政以前，亦常維持各政黨之通力協作。因為現在二十世紀的外交，已經絕然不是百年前維也納會議時代之所謂外交，僅憑個人外交天才，或依靠部份的勢力所能對外；現在實際支配對外政策者，是整個的國家利益，唯能凝聚一切國家物質的精神的力量，而後始能產生健全的國家對外政策。

二十二年七月脫稿於巴黎大學

## 德國新脫萊斯曼時代之外交政策

袁道豐

國人嘗謂弱國無外交。如此說果確，則弱國宜無設立外交機關之必要，而遣派代表折衝樽俎於國際壇坫之上也就變爲多事了。其實，外交之爲物，強弱國家均得而運用，強國固可運用外交，以維持其優勢或增加其聲威，而弱國亦可運用外交，以獲得他國之同情或援助，而完成其政治目標。不觀乎一八六〇年前的小撒丁（Sardaigne）是全靠加富爾（Cavour）的外交智慧，以完成意大利的統一嗎？又不觀乎一八七〇年前的普魯士是全靠俾斯麥的外交智慧，以完成德意志的統一嗎？推而至於戰後失地喪師的德國，又可不是全靠斯脫萊斯曼（Stieglitz）的唯實外交，以謀得解放的嗎？故所謂弱國無外交，直是一掩飾外交無能或失敗的欺人之談而已。

俾斯麥、加富爾和斯脫萊斯曼這三外交家所施的外交有一共同之點，就是「唯實」。他們對其祖國都有不朽的功績。從處境方面言，則斯脫萊斯曼實比俾加二氏更爲艱難。當歐戰告終

時，德國雖曾改換國體，建立共和，然內則瘡痍滿目，政治糾紛層出不窮，外則強鄰壓迫，條約束縛，嚴厲有加。不但民生塗炭，國步多艱，而外交前途，亦滿地荆棘。脫使此時無一傑出之政治外交家出而掌持國政，內奠國本，外固邦交，則德國勢必陷於萬劫不復之境。乃幸有斯脫萊斯曼其人，機智勇敢，忠於謀國，始則執掌閣揆，繼則主持外交（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於是不數年，國基奠定，外力束縛逐漸解除。德國之所以能昂昂然蹈上解放之途，斯氏之功實非淺鮮。自毋怪乎世人譽稱他爲「俾斯麥第二」。惟因主政六年，操勞過度，遂於一九二九年十月三日賁志以終。斯氏雖已長辭人世，然其解放政策，實得猶在外力壓迫下的我們景仰。大陸報且謂新中國之復興，需要像斯脫萊斯曼那樣的人才。故此文之作，或亦可使國人更明瞭斯氏之思想和政策，以作復興我國的借鏡。

## 一 斯氏初期的政治生涯

斯氏生於一八七八年，家道清寒，其父爲一啤酒商人。他秉性好學，博覽羣書，嘗欽羨俾斯麥

之爲人及其功績。他在柏林大學研究政治經濟，獲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爲柏林啤酒業的發展，年尚二十有三，卽任某實業團體的祕書之職。他起初思想左傾，醉心於國家社會主義，後來纔改變思想，加入右派的國家自由黨。當他被選爲國會議員時，年方二十有九，爲國會裏最年輕的議員。但因他口才流利，活動甚力，却已嶄然大露頭角了。

歐戰時，斯脫萊斯曼也是一個極端激烈的帝國主義者。他主張作戰到底，和吞併別國的領土。潛艇戰爭也是他所贊同的。一九一七年國家自由黨首領逝世，斯氏遂起而代之。但戰事一經結束，該黨卽告瓦解。他因而另起爐灶，組織一人民黨，以自己爲主席。當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約草立的時候，他反對接受該約甚烈。愛斯貝舍爾 (Erzberger) 和賴齊諾博士 (Dr. Rathena) 均因履行和約，而遭受他的嚴厲抨擊。一九二一年三月協約國以德沒有履行和約的誠意，卽派兵佔領 Düsseldorf, Ruhrort, et Duisburg。接着又在五月初對德下一哀的美敦書，要求接受一百三十二億金馬克的賠款總額。德政府沒有辦法，只得屈服接受。而斯氏却反對不遺餘力，並促成維爾夫 (Wirth) 內閣的去職。

這一九二二年終古諾（Cuno）內閣成立，斯脫萊斯曼已漸漸傾向德法協調。但是他猶不斷的抗議德爲歐戰的戒首（Kriegsschuld）及反對引渡戰時的德籍「罪犯」。當時他認爲要解決德法間的懸案，就須從這三點下手：（一）解決賠款問題；（二）德法兩國的實業家應謀經濟合作；（三）對法提議訂立一公約，以保障德法間的現存邊境，惟此保障不得超過一代的年限。古諾曾把締結保障公約事的普恩嘉資提出，可是普氏不惟沒有接受，反而說這提議是種「危險的矯僞」（Dangeruse hypocrisie）。

普恩嘉資是法帝國主義的代表者。依他的理想，整個萊因蘭均應割讓於法，以作她的東方國境。這樣一來，法國的安全就可無憂無慮了。普氏既心蓄此意，所以他的對德態度特別強硬。一九二三年正月十一日因德無力賠付借款，他便遣派軍隊，佔據德國的工業中心地——魯爾（Ruhr）。在這武力壓迫之下，德雖無法以武力相抗，可是她也不願聽憑敵國佔領她的國土。所以她立即採取消極抵抗的方法，以對付法國。

在這時候，英美以不直普氏的鐵腕政策，都表同情於德。但是不幸的很，她的統一忽呈分裂

之象了，萊因蘭的居民中有不少的好細受了法軍的利誘或鼓勵，運動組立一獨立國家。斯氏看到國家危亟有若累卵，便主張速謀解決賠款問題。他認為多給三二億金馬克的賠款是不打架的，因為錢財並非國家的生命所繫，但是萊因蘭和魯爾則無論如何須保持德國的主權。如法國志在奪取萊因蘭和魯爾，則德不願與法舉行任何談判。斯氏認魯爾的佔領實有違凡爾賽和約，並且謂法國一面要求德國付款，一面摧殘德國的工業區域，顯係欲陷德於萬劫不復之境，以遂其擴張領土之企圖。

消極抵抗雖不若武力抵抗之慘痛，但也須有鉅大的經費纔能維持長久。當此之時，德國民窮財盡，已達極點，加以馬克跌落，萊因蘭和德國其他部分交通阻塞，更使德政府不易支持。消極抵抗。一九二三年六月六日德政府遂對協約各國致一覺書，要求召集會議，以估量德國的賠款能力。這就是專家委員會和倫敦會議的先聲。八月十二日古諾以辦事棘手，提出辭職。斯脫萊斯曼於是以一從未入閣的閣員，起而掌執閣揆了。

## 二 道威斯計劃

斯氏以內閣總理兼掌外交。從八月十三日至十一月十三日止他執政剛有百日之久，故人多稱斯閣爲『百日內閣』。在這短促的時間當中，斯閣除竭力壓止希特勒的『古鐵打』而外，曾於九月二十四日放棄消極抵抗。斯氏本是主張消極抵抗最力的人，他曾說過魯爾軍隊一日不撤退，則消極抵抗即一日不放棄，而德法也就一日無談判之可能。他執政以後，還想堅持這種政策，以表示德人反抗強暴的精神。可是德國的態度愈堅決，則法國的態度也愈強硬。普恩嘉寶宣稱：消極抵抗一日不放棄，和有關消極抵抗的命令一日不撤廢，則德國休想談判。雙方針鋒相對，堅持不讓。於是賠款問題也就更不容易解決了。

從國際方面來講，此時英美意三國都表同情於德，英政府且曾通牒法國，稱佔領魯爾爲非法。但是她們的態度只限於對法表示不滿爲止，並無反法助德的積極行動。她們並且勸告德政府從速放棄消極抵抗，以利賠款問題的解決。斯氏明知外援無望，而消極抵抗又需費浩大國庫

無法供給，便不得不忍痛放棄對法的鬥爭，以保全國家殘餘的元氣。

第一次斯閣被倒後，他即奉命復組新閣，但就位不到十天，就被迫辭職了。此後閣接雖疊經更迭，而斯氏的外長職位却從未發生動搖。從此時起，德國外交就逐漸開展踏上了解放的途徑，而道威斯計劃的成立，則爲其解放之第一聲。

此時斯氏的唯實外交政策全爲這四大原則所支配：（一）德既無力對法作戰，則應與她妥協以謀祖國之復興。（二）英既與德有密切的經濟關係，而不滿法國摧殘德國的經濟勢力，則應促成協約國間的分裂，以便分而治之。（三）對美大舉借債，使她充分關心其債務國——德國的情形，而在必要時出而干涉法國的行動。（四）基於復興普魯士的功臣赫登堡和斯達因（Hardenberg et Stein）對付拿破崙的政策，德國不應計較物質的犧牲，以謀達到外力束縛的解放。這點是斯脫萊斯曼外交政策的最大原則。所以他嘗說：『多付一億或少付一億，有什麼要緊，只須我們能由此獲得自由！』

斯脫萊斯曼既主張與法協調，而消極抵抗又已放棄，於是一經英美的斡旋，有關各國即於



一九二四年正月召集一專家委員會，以審查德國的償付能力。結果草成道威斯計劃。同年八月她們又在倫敦集會，決定採行這計劃。德國的極右派嘗以斯氏的接受道威斯計劃，而目之爲「賣國賊」。其實，從當日的情境看來，斯氏除接受而外，也別無第二途徑可走。而且他的接受賠款計劃並非全無報償。英國好感之獲得固不待說。而魯爾法軍的決定撤退，尤爲斯氏靈敏外交的極大勝利。

本來倫敦會議之召集是專以討論賠款計劃爲目的，所以法總理赫禮歐離巴黎時曾宣稱凡與賠款無關的問題概不予以討論，換言之，魯爾駐軍的撤退將不在會議討論之列。但因斯氏手段高明，態度和藹，並益以麥克唐納的從旁贊助，法代表便允將魯爾駐軍在一年內（從八月十五日算起）撤退，同時 Düsseldorf 和 Buisbourg 等地斯氏亦獲得撤退協約國駐軍之允諾。可見德國在倫敦會議中顯有重大的收穫。加以此後美國的參加賠款委員會，和該委會的職權不由法國所操縱，則德縱有違反道威斯計劃的措置，賠款委員會恐亦難以全體一致的票數，決定佔領德國領土，以作賠款之保證。所以從某種意義講來，倫敦會議不但解放了德國的

經濟富區而且保障德國領土的安全。由一九一八年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德國無日不在外方壓迫當中過活，現在可是不同了，自由的曙光已經呈現。這種光芒日後只有一天更輝煌一天。斯脫萊斯曼之所以說倫敦會議爲德國解放之開始者，其因在此，而麥克唐納之所以說德國地位終止孤立，和將在權利平等之原則上與其他民族合作者，其因亦在於此。

### 三 羅加諾協約

斯脫萊斯曼的外交政策是一步一步來的：不着急，不苛求，亦不妄想。德國的要求不只在解決賠款問題，乃是人所共知之事。萊因蘭駐軍的撤退，殖民領土的收復，德奧聯合，東邊的重劃和重整軍備，那個不是德人想謀其實現的呢？但是如果將這些要求同時提出，其結果勢必引起協約國一致的反對。所以斯氏雖始終主張各黨各派聯合起來，以謀祖國之復興，而他對極端右派『斯廢凡爾賽和約』的口號則莫不目爲狂妄。原來在他的眼中看來，德國既爲一軍備被裁的國家，則其外交，即不應操切從事，徒增加敵國之壓迫。他在回憶錄中說：自由，只有從工作與犧牲

中得之。如謂自由可用武力得之，這全是蠢話！我們的武力在那兒？既沒有武力，那我們就不得不在別方面去找出路。

斯氏的外交政策之唯實從這點上就可以窺見其一斑。當時右派人物都主張摧毀和約，對法復仇；而他則以右派人民黨首領的地位，獨持異議，主張與法協調。這不能不說是他的眼光遠大，獨有見地，終於他的這種協調政策不久又在羅加諾獲得一更偉大的成功了。

依照凡爾賽和約，則協約國在萊因蘭的駐軍應分三期撤退，以五年為一期。一九二五年正月十日就到了協約國撤退科倫（Cologne）駐軍的時期了。但是英法比均以德國沒有遵守條約，裁減軍備為論據，拒絕撤退。不過英法雖一致拒絕撤退駐軍，可是她們的立場却截然不同。英國所要求於德的，則只以履行條約為已足，而法則除要求履行和約外，並要求安全保障。安全而一日無保障，則其駐軍即一日不撤退。所以德國如欲解放科倫一帶的領土，則對法應予以安全保障之滿足，實為第一要着。

在這時候，德國在外交方面也受了一極大之威脅。英國工黨內閣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下台

了，繼起執掌開揆的則爲保守黨首領包爾溫，其外交大臣爲張伯倫。張氏是一親法仇德的外交家。他以受自治殖民地的掣肘，拒絕接受日內瓦議定書之後，就想別圖良方，以保障法國的安全。因而英法比三國聯盟之說，一時甚囂塵上。脫使三國聯盟果眞實現，則其目的必爲對德無疑。所以斯脫萊斯曼一聞這種消息，卽憂心如搗，力謀破壞這種結合，以免重陷德國於孤立之境。但欲破壞英法比的三國聯盟，則最有效和最機智的手段自莫若自己也加入這種聯盟，並承認德法間的邊疆現狀，以消釋法國東顧之憂。

基於這些理由，所以斯氏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對法送達一照會，申述保障西歐和平的五大要點：（一）英法德意四國相約彼此互不作戰；（二）德法訂一仲裁條約；（三）德國願與其他國家締結同樣的仲裁條約，以解決法律的及政治的爭議；（四）訂一公約，保障現存的西方國境及武裝解除的萊因區域；（五）這樣訂立的保障公約，將擴大爲包括一切國家的保障協約，以達到已告流產之議定書的目的。

德國照會發出之後，英法均表示贊同。但是成功的障礙仍遍滿道途，德國的保障祇限於西

方，而不涉及東方，將何以調解萊因保障公約和法對波捷的同盟義務？將來簽訂的協約既以德國加入國際聯盟，方始發生效力，則德既無充實之軍備，將何以履行第十六條的制裁義務呢？第十六條的制裁將來如對俄實施，德俄又將何以保持其賴巴羅條約之親密關係呢？這些障礙一經談判，即告消滅。十月間保障協約便在羅加諾會議訂立，而於十二月一日簽字於倫敦。同時科倫駐軍也在那時決定撤退。

羅加諾協約的內容以冗長只得從略。但是它對德的良好效果，我們却應加以敘述。第一，法國的安全既獲保障，而德又約定保持萊因邊界的和平（按條約中並無維持邊界現狀的字樣），則法對德之戒懼已經消釋，不僅科倫駐軍應予撤退，即萊因其他區域的駐軍也無維持之必要了。第二，依照斯氏在其回憶錄中所說，則萊因邊境雖不許用武力來企圖修改，但用和平方法來修改是還保有可能性的。不然，這與第十九條的規定根本不能調和。第三，德法既相約保持萊因的和平，則德固不能以武力侵入解除武裝區域或法境，但法亦不能作同樣的侵犯行為。於是法德地位一律平等，實現了『國無勝敗』之理想，而德以法不能捲土重來，侵佔國土，就可以

一心一意謀求復興了。第四，英法從此分離。在羅加諾協約締結之前，英國對法雖疑忌嫉妬，但尚不失爲法之盟國。自該約簽訂後，英已由盟國地位，一變而爲仲裁人的地位，與意協同解決德法間的糾紛。那時德國的外交政策爲離開英法協商，圖進一步聯英以脅法。羅加諾協約的訂定，可說是她實行「分而治之」的外交政策之成功。第五，德國在一九二六年的加入國聯，一方面固可說是增強了國聯的威權，但是他方面於德也有莫大之裨益。德國獲得理事會永久會員席，足以證明她已由戰敗國而變爲頭等強國。同時國聯所管理的種種事務，如少數民族之保護，但澤與波蘭之爭執以及委治領土問題等，從前德國無權加以干涉者，今後她亦可以干涉，以保護其受鄰國蹂躪之同胞。

至謂英法德已團結一致，以抵抗蘇俄，我們從斯脫萊斯曼的回憶錄看來，則其締結羅加諾協約之用意實不在此。斯氏對蘇俄在德積極宣傳共產主義，並鼓勵暴動，雖極表不滿，同時，對她在戰時的援助雖也表示懷疑，但是德俄既有賴巴羅條約之締結，而經濟關係又甚親密，則德不應結怨於俄，乃爲極其明顯之事。羅加諾協約談判時，斯脫萊斯曼之所以以德國軍備弱小爲辭，

竭力避免擔負第十六條之義務，以免與俄衝突者其因在此，而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德俄之所以簽訂柏林條約者其因亦在於此。

從各方面觀察起來，羅加諾協約確是斯脫萊斯曼外交的最大成功。前此德國尙爲一凡爾賽和約下的囚奴，而現在則昂昂然躋於五大強國之林了；前此萊因尙受敵騎的蹂躪，而現在則國土的解放已將全部實現了；前此德國處境孤立，四面楚歌，而現在則『舊敵』均變爲『新友』了。前此德國領土常在敵國佔領的威脅之下，而現在則領土完整已得有保障了。所以羅加諾協約的良果確非等閒可比，它是斯氏協調政策的柱石和德國自由解放的燈塔。

#### 四 非戰公約

爲了簽訂羅加諾協約，以致放棄亞爾薩斯與勞倫，斯氏真不知受了極端右派多少的侮罵與攻擊，然而他却任勞任怨，絲毫不以此爲意，嘗言他的行事全憑良心，以維護國權。斯氏以協調政策而興國，與今日希特勒之鐵腕政策恰是相反。但是就因爲他主張協調，所以對於一切和平

事業均應努力參加。要這樣，纔能表示德國愛好和平的意志；也要這樣，他纔能獲得協約國方面的讓步。

所以美國務卿開洛克和法外長白里安的非戰公約照會一經發出，德國即首先覆文贊同。以斯氏的智慧與唯實，未嘗不知非戰公約實際效用之微渺。然而他贊同猶恐不及者，實因此爲其協調政策之一貫結果。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非戰公約在格多鑾（法外部）簽字時，斯氏且親蒞法都，參與盛會。自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以來，德國關員之足履法土者，要以斯氏爲第一人。故斯氏之親臨巴黎，實開德法邦交一新紀元。自毋怪乎法人對德的觀感爲之不然一變。而斯氏却可利用這緩和空氣，作更進一步的要求了。

## 五 楊格計劃與海牙會議

從羅加諾協約以至一九二八年，歐洲全爲和平空氣所籠罩，可咀呪的殘暴戰爭已經被非戰公約宣佈死刑了。斯脫萊斯曼深知當時的和平空氣可供利用，便於一九二八年九月特偕內



閣總理摩勒 (Muller) 赴日內瓦，出席國聯大會。此次斯氏特請總理前往，是有他的外交作用的。原來摩勒是社會黨的首領，愛好和平，馳名全球。所以他的出席更能予他國的政治外交家以良好之印象，而獲得他們的讓步。摩氏居留日內瓦數日，與協約國代表往還磋商，深為他們所諒解。結果在同月十六日德、法、意、英、比、日六國簽一協定，內含兩大決議：

(一) 正式開一會議以磋商德首相請求之提前撤退萊因駐軍。

(二) 賠款須澈底解決，唯欲達此目的，須組織一財政專家委員會，其委員由六國政府任命之。

這兩大決議是楊格計劃與提前撤退萊因駐軍之張本。一九二九年三月九日財政專家委員會召集於巴黎，中間經過無數之風波與爭執，纔於六月七日草成楊格計劃，呈報各國政府，接着在八月六日她們就集會於海牙，以決定新計劃之取捨。

在海牙會議中，斯氏甚能運用其外交技巧，以保持各國的好感。英代表斯諾為了分贓不均，會和法、意、比、日四國疊起激烈之爭執。斯氏對此均不欲加以開問，聽其演進。原來鷸蚌相持，終

歸是漁人得利的。所以協約國間爭執愈激烈，則德國愈能從中取利。當海牙會議幾瀕決裂之時，英代表宣言無論會議結局如何，英將自動提前撤退萊茵駐軍，益足證明債權國間的分裂於德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不過在這場合之下，德國也得慎重將事，須竭力避免袒護一國，以結怨他國。要這樣，她纔能使債權國競付代價，以博得她的好感；也要這樣，她的解放纔能逐步實現。

無論在經濟方面，或是在政治方面，斯脫萊斯曼實是海牙會議的勝利者。揚格計畫的採用於德國的經濟利益實至鉅且大，其最顯著者爲：（一）賠款年限之確定與賠款總額之減低。從前依照道威斯計畫，則德所償之債款年無定額，且不知付至何時爲止。現在新計畫則特予以切實之規定，並將賠款總額一百三十二億金馬克減至三十八億。（二）德國之經濟恢復自主。依據道威斯計畫，則債權國爲保證債款的償付，得設立一機關，以監督德國財政。現在此種機關將於新計畫施行時取消。今後賠款由德國政府直接交付國際賠款銀行。於是德國的經濟財政得免外力的束縛，而恢復自主。（三）依第二次海牙會議之決議，則如值德國違反揚格計畫的規定，債權國不得逕行佔領德國領土，必須先將爭議提交國際法庭判決。只就這點而言，德國的領土已受

有相當之保障。其實，羅加諾協約既有維持和平之規定，則債權國不應貿然侵佔德國國土，也是理所當然的。

德國的所得不止於此，萊因駐軍的全部撤退。尤其是斯氏外交的成功。依照凡爾賽和約，則第二區和第三區的萊因駐軍須至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五年纔能撤退。然而此時海牙會議已經決定提前撤退了。這提前撤退與其說是楊格計畫實施的結果，毋寧說是羅加諾協約和德國加入國聯的必然結果。因為羅加諾協約既已明文保障法國的安全，而國聯又曾宣言德國已履行其條約義務，則為保證履行條約而佔領萊因的駐軍自無維持之必要。所以各國代表一經協商，海牙會議即決定萊因等二區之英法比駐軍即陸續撤退，至第三區駐軍之撤退則在楊格計畫施行時起八個月內實行。因此，十年來德意志民族認為奇恥大辱之萊因駐軍不久就將撤退，德境以恢復她的領土完整了。

經濟的獨立和國土的解放，這是斯脫萊斯曼在外交上，一生最後的勝利。終因積勞成病，遽爾溘然長逝，未能完成其解除祖國條約束縛的懷抱，這不但是他的遺憾，而亦為德國的不幸。然

斯氏既奠下此解放之基石，則後來此者秉先進之遺策，自更易謀求實現祖國之解放與自由。

## 六 結論

斯脫萊斯曼不過以六年之努力，竟能獲得國土之解放，其偉大之功績爲俾斯麥以來所僅見。自母怪乎 *Vossische Zeitung* 報稱其功績只有俾斯麥纔能與之相埒，而法國右派報紙如 *Ligero* 亦不得不爲文評曰：「從歷史方面看來，斯脫萊斯曼將永留爲一位曾作切實行動以復興德國及分裂歐洲戰勝國家的人物。」可見斯氏的偉業不但爲德人所稱道，而亦爲他國所頌揚。

斯脫萊斯曼執掌外交六年，始終保持着一貫的精神，即所協調政策，逐步謀求國家的解放。他未嘗不欲撕廢和約，但無奈力有未逮。且撕廢和約之聲愈激烈，則協約國對德的壓迫必愈嚴厲。結果不僅於德國的解放毫無裨益，反且足以借事。故斯氏力排衆議，以協調政策相標榜。其見識之高起與眼光之遠大，實非其儕輩所能企及。然而其外交政策之所，以採取協調者，推本溯源，

實由他能實事求是，不妄想，不苛求，不結怨，別國不空言威脅，以維持歐洲和平爲名，而以復興祖國爲實。

論者謂斯脫萊斯曼的協調政策之收穫，實不若希特勒巴本鐵腕政策的收穫之大。賠款之取消和軍備平等原則之承認，卽爲其明證。這種言論驟視之似近事實，然細思之則未有盡然。脫使斯氏不早爲之奠定解放的基石，如經濟束縛的解除和萊因駐軍的撤退，則以希特勒之咄咄逼人，恐欲謀得初步的解放，勢難博得協約國之虛心許肯。故解放德國之功，實爲斯脫萊斯曼而非希特勒和巴本。假使斯氏今猶在世，而長外部，則今日希巴二氏在外交方面之建樹，他必能獲得同樣之成功，殆可斷言。然而希巴二氏以態度頑強，構怨友國，斯氏則以態度和藹，敦睦邦交，計之孰善，不問可知。斯脫萊斯曼之所以爲異國人士所景仰者以此，而所以被認爲維持歐洲和平的三大柱石（白里安，張伯倫和斯氏）之一，而博得 *Bon European* 之榮譽者亦以此。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上海

## 戰後意大利外交政策

周遠

### 一 引言

歐戰以前的意大利是三國同盟的一員。但在德奧戰事勃發以後，却藉口於防禦同盟，宣告中立。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且對奧宣戰，加入協約。意大利態度的轉變，當然爲自己的利益打算，意德的感情並不算壞，而意奧間因爲奧國尙盤踞在他東北境界，和意大利支配亞得里亞海的野心，始終是貌合神離，無從親善。協約國窺破此點，便於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六日，運用甜蜜的辭令，優厚的報酬，和意大利簽訂倫敦協定。意大利便毫不躊躇的站在反德奧的戰線了。

戰後的巴黎和會，把世界的地圖，重新劃定一下；却不能使奮鬥數年，蒙受鉅大損失的意大利，達到預定的目的。美總統威爾遜且以「民族自決」的原則，和意代表烏朗佐（Orlando）爲了阜姆（Fiume）問題，發生衝突，烏朗佐便一怒而離開巴黎。最後的解決，還是意大利退步，

而將阜姆問題暫時擱置。這種情形，意大利是萬分憤恨，而引起一種愛國熱情的嫉視，爲後來主張廢約的張本。

## 二 意大利的結盟政策

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日，是意大利法西斯蒂黨進兵羅馬的一日；從此以後，墨索里尼便掌握着意大利實際的政權。以他不顧的才略，和殖民慾的雄心，當然在內部穩固後，向外發展。他的目標，是在攘奪北非的殖民地，獲得亞得里亞海的霸權，執掌地中海的牛耳。然而這種計劃，是和拉丁姊妹國的法蘭西利害衝突。所以戰後意大利的外交，便以「進攻法蘭西」爲惟一的主旨。墨索里尼曾經說過：「別的國家，人口甚少，而擁着偌大的領土；意大利，人口繁多，却没有使他得到合理發展的土地，不是世界上太不公平的事麼？」所謂「別的國家」，自係暗指法蘭西而言，意法邦交的惡化，於此可見一斑。

怎樣進攻法蘭西呢？便是聯合戰敗國家，結成一個集團，以打破法蘭西戰後獨霸的優勢；提

出的口號便是「修改和約」。

法蘭西雖是戰後的驕子，却也深懼戰敗國家的復興，足以撼動她的基礎。他便在巴爾幹方面竭力拉攏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結成小協約，並與波蘭聯合，以圖鞏固陣線，對抗敵國。意大利則利用各戰敗國，以爲羽翼，而養成自己對法集團的盟主地位。匈牙利是個戰敗國，意大利便與他聯絡；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意匈訂結仲裁調解條約。這在匈牙利尙是戰後第一次與別國訂結含有政治性質的條約。意大利對於匈牙利之條約運動，極力表示同情，這便是意大利「聯匈政策」的開始。

阿爾巴尼亞雖是巴爾幹半島中很小的國家，但是地扼亞得里亞海的咽喉，而與意大利隔海相對。爲控制南斯拉夫起見，不得不把他收置在自己勢力範圍之下。於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雙方訂立地拉那（Tirana）條約，按照這個條約，意大利應當負擔維持阿爾巴尼亞司法上、領域上和政治上的責任。意大利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大使會議中，本已獲得在阿爾巴尼亞優越的地位，又因地拉那條約訂立時，阿國總統特別與意親暱，便惹起南斯拉夫的嚴重反



對。經過七個月後，竟與阿爾巴尼亞實行斷絕邦交。意大利自然是袒護阿爾巴尼亞，而指南斯拉夫此種行動，爲有意的挑釁。南斯拉夫不甘束手待斃，便與法蘭西結合，而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訂立條約。南斯拉夫因獲得與國，對意大利態度，轉趨強硬。人民在慶祝外交成功之際，不免對意大利於此，不僅對南斯拉夫斥爲荒謬，且對法蘭西的外交政策，亦謂係屬脅迫和圍困意大利。意南糾紛，於是形成法意衝突，歐洲的空氣，曾經一度緊張。在南法訂約後的兩星期中，意大利與阿爾巴尼亞復訂立一有效時間二十年的攻守同盟條約。專就文字而論，似乎很爲平等，但在事實上，阿爾巴尼亞已成爲意大利的保護國。意大利、威爾斯、南斯拉夫的政策，又更進一步了。

一九二三年意大利砲轟科富（Corfu）卒使希臘俯首就範，釀成兩國間一條很深的裂痕。但爲實施「東進政策」起見，不得不與希臘交歡。適希臘與南斯拉夫爲薩絡尼加（Salonica）出海問題不睦，意遂進與希臘釋嫌修好。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簽訂友好仲裁條約，並允供給希臘一千萬元的軍火。

意大利外交的奏凱，尤在使希土聯結。一九二六年六月以前，土耳其對意，還是預防他侵佔小亞細亞；而在一九二八年五月間，却和意大利訂立一中立仲裁和協調條約，邦交始趨親善。希土之間，本常處於惡劣的境域，自簽訂交換人民條約後，而情形一變。一九三〇年希相親至土京，卒於十月三十日在安哥拉 (Angora) 簽訂中立和好仲裁友誼條約，並簽訂海軍限制競爭議定書。其間意大利是一個十分盡力的撮合者。從此不僅使一九二九年法土抗意所訂的友誼仲裁條約，失其效用；而且意希土三國另成一集團，足以奪取法蘭西在地中海的霸權。所以意國方面，認此爲意大利外交在東地、中海的大勝利。

意與俄係屬世仇，戰後情感亦並不見佳。但見一九三〇年二月奧總理蕭培爾 (Schoner) 蒞止羅馬，而邦交始轉。是月六日，簽訂友誼仲裁條約。意大利且釋放反對意大利化奧人的奧籍囚犯，及減輕奧對意國的債務，以示好感。最近奧總理陶爾斐司 (Dollfus) 自羅馬返抵維也納，曾謂一九三〇年奧意條約，不僅爲一種形式的友誼行爲，奧國在國際爭議或減輕他苦痛時，已在南部獲得一可以相助的友人。足見意奧間的邦交，於此次條約，極有關係。

保加利亞也是戰敗國之一，以馬其頓問題，與南斯拉夫迭起齟齬，意亦乘機連絡，表示其修改和約的同情。一九三〇年十月間，意保聯婚，雖是歐洲王室間平常之事，但此中當然含有政治作用，而使兩國間的關係，深進一層。意大利在巴爾幹的勢力，也隨着更見穩固。

### 三 意德俄的攜手

意大利的外交，不僅與各小國結盟，且與蘇俄德意志亦竭力聯絡。意與蘇俄，主義是絕不相同的，怎能聯合起來呢？這是因為兩國間的經濟關係，却自有相互貿易的必要，意大利是很需要蘇俄的煤、煤油、木材紡織及穀物等。蘇俄亦需要意大利的機器，一九二一年蘇意已經恢復通商關係。一九二四年繼英之後，承認共產主義的蘇維埃政府，而且與他訂立商約。一九三〇年八月二日，意蘇經濟協定成立；翌年四月，更成立意蘇新經濟協定。意大利從此可由對俄商業的擴大，藉以增高他本國工業方面有利的製造。

斯大林和墨索里尼各為達到經濟上的目的，而出此和平友好政策。但也未必不含有政治

上的作用，蘇俄方面借此使資本主義的國家不能聯合戰線與他抵抗，這是聯德聯土以外的第三要點，值得世人注意者，意大利方面亦可阻止法俄的接近，而使法蘭西去其右臂的助力，而且以後在國際會議上討論重要問題時，可以彼此共鳴，以對付英法。歷屆軍縮會議，俄意與德往往互為聲援，這便是此種互相利用的明證。

德國是戰敗國的要角，凡爾賽和約的恥辱，無時不思瀟雪。在斯脫萊斯曼時代，採取對英法協調政策，維持歐洲暫時的和平。但自國家社會黨勢能高漲後，德國的口號已高唱着反對和約，廢止楊格計劃，收回沙爾煤鐵等。德意之間，本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簽訂仲裁調解條約。墨索里尼因見德國的法西斯蒂黨獲勝，為博取他的同情計，在一九三〇年十月的演說中，公然主張修改和約，他說「修改和約，便是為的和平。修改和約，於意大利並無所利，但却有利於全世界。本來在這聯盟公約亦有規定。現在唯一的阻梗，便是主張那永久維持和約於不變者。然則是誰違反聯盟公約呢？」一九三一年十月在拿帕爾（Naples）演說：「如果對於引起全體人民物質上和精神上損失的若干條文不加修改，歐洲的重建，即無從談起。」墨索里尼又嘗明白的說：「

歐洲現在分爲希、望、改、訂、和、約、和、竭、力、維、持、和、約、的、兩、個、集、團。意大利是屬於前一個集團的。若是後一個集團打算用武裝準備來威壓的話，意大利也可武裝起來。所言更是咄咄迫人，使法國難堪。自希脫勒執政以後，德俄關係大不如前，而柏林與羅馬臭味相投，更有揜鼓相應的情勢。德國的巴本、戈林與國的陶爾斐斯，相率赴意，備受意相熱誠的歡迎；此中豈無政治作用？歐洲政界，當然又有一種新的醞釀。

意俄、德最近對於國際問題，例如條約，裁軍，常趨於同一論調，而相互呼應。德意志是孤立國家，俄羅斯因主義的不同，也感覺到孤立，意大利便與他們聯合起來，共同打破戰後和約組成下的現狀，而造成一個有利自身的新局面。在歐洲掌握霸權，叱咤風雲的法蘭西，便成了他們共同的仇敵。現在的意大利是由巴爾幹沿着多瑙河到了柏林和莫斯科；意德俄三國的攜手，實在是使法國感受到有力的威脅。

#### 四 最近的四強公約

意大利爲增長他的聲勢和力量起見，狠想有堅固的組織。一九三〇年日內瓦裁軍會議時，蘇俄代表李維諾夫突然赴意，與意外長會談，狠惹起世界的注目。當時報紙推測，以爲意、俄、土、希、匈、保諸國，將成立一個七國同盟。一九三二年秋間，南斯拉夫發覺意、德、匈、保四國，借意國皇家學會名義，在羅馬舉行秘密會議。據傳：會議中擬定一種變更中歐及巴爾幹半島形勢的計畫；其中包括着瓜分南斯拉夫及建設二個新邦的企圖。這種傳說，雖未能徵實，南斯拉夫同他的與國法蘭西，却已感覺得十分的不安。可是意大利的勃勃雄心，不得英國的助力，仍舊有孤掌難鳴之恨。意大利在巴爾幹半島的成就，大半的原因，便由於英國的消極政策所致。英國對於法蘭西，也深惡他獨步歐洲的氣餒，所以德法爭執，往往左袒德意志。便是意法衝突，英亦站於旁觀地位，似乎有一種縱意抗法心理。但是英國畢竟不願，至少在最近將來的歐洲再有武力的肆擾，而仍以維持暫時的和平爲主旨。英相麥唐納，也是乘着這種主張，向各方斡旋。三月中提議的四強公約便是暫維歐洲和平的一帖藥。四強公約成立後，便於歐洲造成一個歐洲總裁（Directoire European）之外，再來一個歐洲協調（Concert European）意大利發起四強公約的用

意，原想借助英人之力，造成一種新的勢力來壓迫法國，使她對於修約一事不能不作最後之讓步。可是因爲小協約國之反對，與英法關係之始終不能不保持和善，（英法關係之接近，一半爲對付美國）所以四強公約經過幾次修改之後，已與慕氏原來計畫，頗有出入。意大利本想把四強公約的精神，卓然超脫於國聯盟約之外，今則在事實上已經做不到，不過四強公約之簽訂，對於意大利之地位，依然有益無損。戰後十多年來，意國外交處處獲得勝利，當然是慕氏一人之力。所以我們眞要明白意大利的外交政策，慕氏之思想與事業，實有研究之必要。

## 小協約國的外交政策

袁道豐

### 一 引導

歐洲政局全爲四大勢力所支配，自戰後以迄今茲，未嘗或變。這四大勢力可歸納爲：(一)英，(二)俄，(三)主張摧毀和約的政治集團，和(四)維護和約的政治集團。在這後一種的政治集團中，除領袖羣英的法國外，還包含比利時，波蘭和小協約國 (La Petite Entente) 所謂小協約國，原是指其參加分子均屬小國而言，這與大協約國的命名恰是相反。

小協約國的構成分子爲捷克斯洛伐基，巨哥斯拉夫，和羅馬尼亞。捷巨都是戰後的新興國家，由奧匈帝國崩潰之下而成立，羅馬尼亞在戰前就是一獨立國家，只是她的版圖曾在戰後大加擴張而已。她們雖盡是小國，然而其政治勢力，却未可輕侮。三國的人口共約四千五百餘萬，常備軍共五十六萬。以此人口和軍備，實足左右歐洲政局而有餘。最近四強公約之原稿不得不徇



小協約國的意旨而修改者，其因在此，小協約國之所以成爲歐洲政治的一重要因素者，其因亦在於此。

捷、巨、羅都是和約的產物。她們的國境均由聖日耳曼條約（*St. Germain*）脫里哀條約（*Trio non*）和儂衣里條約（*Neuilly*）詳密劃定。和約是她們的生命線和護身符。和約而一旦摧毀，則她們的生存必受嚴重的危害。所以她們的外交政策，一如法國的外交政策，完全以維護和約爲其主要目標。小協約就是基於這種共同目標而成立的。

一直到本年二月十六日止，捷、巨、羅三國只有協約之簽訂，而無具體的組織。但自是日，小協約國的組織公約一經訂立，小協約國的面目即爲之一變。從前毫無結構的協約，現已變爲聯盟的組織了。這是近來歐洲風雲險惡的必然結果，毫不足怪。然而三國的合作精神和外交政策，却由此更爲堅強，更趨於一致了。

時至今日，捷、巨、羅三國已結合爲一，成爲國際社會間的一個單位，其重要迥非昔日可比。唯其如此，故吾人對於小協約國的外交更有注意之必要。

## 二 小協約成立的原因

和約訂立後的翌日，捷，羅三國政治外交家所殫心竭慮者，就是怎樣去保持她們的戰利品。原來捷羅都是成立未久的國家，邦基未固，國力虛弱，不消說得。而且德匈諸國慘遭戰敗，雄心未死，志切復仇，更使她們惴惴不安。所以她們均亟於取得與國，以保障其領土的完整，與政治的獨立。

當此之時，捷羅三國未嘗不知國聯盟約有保障條項的規定，第十條顯明的說：「盟員相約，尊重與保持聯盟會中各員之領土完整，與現存的政治獨立；對於外來之侵犯，願任保障。值此侵犯發生，或其發生之勢甚逼時，理事會當提議方法，履行這種義務。」但是國際聯盟畢竟是一靠不住的機關。它既無實力，一切決議又須有全體票數的通過，纔能生效。而且戰敗國家都有加入國際聯盟的可能，將來她們如果加入，則國聯的構成分子勢必日趨複雜，而其制裁條項更難付諸實行。所以想在國聯方面謀得安全保障，實無異緣木而求魚了。

不過國聯的保障雖無希望，然而英、美、法，意諸國既同是戰勝國家，似亦不致於袖手旁觀，坐視和約爲德、匈、奧，保諸國所摧毀。可是不幸的很，歐戰甫告結束，列強之間就彼此衝突起來了。英、法與意大利的爭持，美國的拒絕批准凡爾賽條約，意巨交惡，和捷波齟齬，在在均使戰時的聯合戰線，掃蕩無餘。所以在這方面，捷、匈、羅三國也得不到着可靠的保障。

在這情勢之下，她們的安全顯然受到嚴重的威脅，時常有被侵襲的危險。加以她們的國內都參雜有鉅額的少數民族，更使她們咸有戒心。比方在羅馬尼亞一六，七三六，二八三人口當中，有百分之二十五却是異族的人民，又比方在一千三百餘萬的捷克人口當中，德人就佔有三百五十餘萬，匈牙利人七十餘萬。這些少數民族在戰前都是手握政權的統治者，而現在則反受治於曾被他們壓迫的民族，自難免起而反對。尤其是匈牙利人，稟性剛強，不易駕馭。匈牙利國民會議主席賴果夫斯基（M. Rakovszky）且在脫里哀農條約之日（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聲稱：「我們應對曾經共同生活千年，而今慘被劫奪的同胞說：我們分離了，但不是永久的分離。」捷、匈、羅聽了這隱含着復仇意義的話語，當然更感到十二萬分的不安。

此時還有一種使捷巨羅三國感到有結合必要的原因，就是赫布斯堡（Habsbourg）王室的謀在匈牙利復辟。赫布斯堡在戰前爲奧匈兩國的國王，曾經統治過捷巨的人民。因而從他們的眼中看來，它的復辟就是復仇的象徵或預兆。所以他們始終反對它就匈牙利的王位，而且認爲是挑戰的行爲。但在匈人方面，喪師割地，已被視爲亘古未有的奇恥大辱，而禁止他們自由選擇國家元首，更被視爲不堪容忍的慘痛。寧願讓王位暫時虛懸，惟統治匈牙利的則非赫布斯堡王族不可，這就是他們的堅決主張。因爲匈牙利的的態度倔強，威懾逼人，所以捷巨羅三國憂心如擣，更感到欲預防匈人的復仇，非有一致的行動不爲功。

國際聯盟的脆弱，協約國間的決裂，少數民族的騷動，赫布斯堡的復辟，無一不使捷巨羅三國了然於欲維護條約的完整，和保障國家的安全，則非把自己的力量團結起來不可。這樣，戰敗國家纔有所顧忌，不敢貿然撕破和約，中歐和東歐的和平纔能維持於不墜。

### 三 小協約的締結

第一爲捷巨盟約。小協約國的創始者是捷克的外交總長貝尼斯（Benes）自從一九一八年直至現在，他從未離棄過外長的職務。他是個才智高超，眼光遠大，態度沉着，而又機警靈敏的唯實外交家。他深知捷國前途的危機不在奧，而在德，所以她對奧國愛護備至，並貸與鉅款，冀使其日趨繁榮，不復作歸附德國的意想。反之她對德匈二國則戒懼有加。爲了對付德國，她在一九二四年正月與法訂一同盟條約。至於對付匈牙利，則她早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十四日就和巨哥斯拉夫簽了一個防守同盟條約。捷巨都是斯拉夫民族，而其經濟情形亦大都能相互補充，所以他們的結合比旁的國家較爲容易，何況她們的政策均以匈牙利爲對象呢？

捷巨防守同盟條約曾經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的軍事協定加以補充，其盟約內容的主旨如下：（一）締約國中如有一國橫遭匈牙利的無端侵犯，則其他一國應即出兵相助，至於出兵的詳細辦法則留待兩國的軍事當局去規定。（二）締約國中如有一國與第三國訂立同盟條約，則她在事前應通知其他一國。（三）本約從批准文件交到之日起計算，以兩年爲期。

看了捷巨盟約的內容之後，也許有人要問：何以在約中沒有對付德國和意大利的條文？德

國不是捷克的敵國嗎？意大利不是爲了亞德里亞海問題，與巨國構怨絕裾嗎？約中所以沒有這種規定，完全是因爲德捷的交惡與巨直接無關，意的衝突則與捷直接無關之故。但是巨國爲防範意大利，却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與法簽一協約。這正與捷克和法國訂立盟約，同出一轍。由此可見法與小協約國的關係是何等密切的了。

第二爲捷羅盟約。捷巨盟約的簽訂雖出於兩國的自由意志，沒有費多大的氣力，然而捷羅盟約的談判却沒有那麼簡單而順利。這因爲她們的民族心理，傳統關係，和政治經濟的結構均互相背馳之故。同時羅馬尼亞有一部分親德或親奧的輿論主張組織多腦河聯盟，要亦爲小協約談判的一種障礙。幸而羅外長達克約尼斯果（Take Jonesco）力排衆議，獨樹締結小協約的旗幟，纔把國人的視線轉移過來。不過達氏雖贊同捷羅協調，可是他的計劃却與捷外長貝尼斯的完全不同。他主張由波羅的海以至愛琴海的國家——即從芬蘭以至希臘的一切歐戰得益國家，團結起來，簽訂盟約。這樣，東向固可以遏制蘇俄共產主義的侵入，西向亦可以防範德匈諸國的破壞條約行爲。計之完善，實不待智者而後知。然從捷國的立場看來，蘇俄既同爲斯拉夫

民族，而與捷又無芥蒂存於其間，苟與羅發起類似的條約，自難免引起蘇俄的仇視。所以她認為蘇俄問題應屏除於談判之外。

正當談判進行之時，匈牙利突然有復辟的事件發生，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廢皇查理斯（Charles）忽發現於匈國。自此消息傳出之後，捷、羅三國的輿論即憤激欲狂，認為是匈國的挑戰行爲。她們於是一面下令動員，準備向匈牙利進攻；一而對匈政府致一哀的美敦書，限於三日內答覆。匈人遭此嚴重威脅，同時又加以各協約國大使會議嚴厲的反對，當然只有屈服之一途。匈政府隨即勸令查理斯出國，免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境。然而經此事變之後，捷、羅以有感於匈牙利的蠢蠢欲動，便立將盟約正式簽訂。（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而前此僅爲一部分羅人所贊同的盟約，現已一變而爲舉國上下所頌揚的了。

捷、羅盟約的內容與捷、羅盟約的內容毫無二致，完全以匈牙利爲敵國對象。她們也曾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日另簽一軍事協定，以規定預防匈國的軍事措置。

第三爲羅、巨盟約。羅馬尼亞和巨哥斯拉夫曾爲了巴納特（Bannat）的領土爭執，發生惡

感。後來疊經談判，纔把這領土衝突圓滿解決。兩國間的裂痕既告消滅，於是盟約的簽訂毫無阻梗。不過吾人所應注意的，就是羅巨盟約的對象不只是匈牙利，而且是保加利亞。原來保國自戰敗之後，割地賠款，所受條約的束縛甚慘。因此，她對於馬其頓的一般暴徒聽其越過國境，在巨國內大肆劫掠或搶殺。同時，她對於農衣里條約也不願誠意履行。所以與農衣里和約切廣有關的羅巨兩國對保當然戒懼備至，而欲將施之於匈國的政策施之於保。羅巨盟約之範圍所以比其他盟約比較為廣泛者，推本溯源，實始於此。

羅巨盟約於一九一二年六月八日簽訂，其內容大致與旁的條約相類似，所異者只是第一條的規定而已。它這樣載明：「締約國中如有一國被匈牙利或保加利亞無端侵犯，或被匈保二國聯合侵犯，以摧毀脫里阿農條約或農衣里條約所建立的事態為目的，則其他一國應即舉兵相助。」爲了規定出兵的細則，兩國在次年正月二十三日又簽了一個軍事協定。

由上所述，可知所謂小協約者，僅由捷巨盟約、捷羅盟約和羅巨盟約湊合而成的，名詞實際上，捷巨羅三國並未合訂一盟約。故其形式與戰前的「三國協商」完全一樣。「三國協商」之



締結，改變了歐洲的整個局勢，而小協約國的成立則改變了東歐中歐的風雲。「三國協商」以德爲對象，而小協約國則以匈爲主敵。其敵國雖異，然其協力以圖存之旨趣則一。

小協約國的締結完全以維護和約爲目的，由其條文觀之，已昭然若揭。惟該約雖以維護和約爲主旨，然亦反對任何強國思圖染指於中歐或巴爾幹半島，以致危害其生存。所以它一面阻止德國的 Drang Nach Osten 政策，一面防範意大利的大舉侵略。故中歐小國已不復爲戰前的巴爾幹國家，任人魚肉，而不自知。現在他們的民族意識極度發展，而知自由獨立之可寶貴了。

小協約國的外交政策，正與法國相同，也是要求「安全保障」與「維持和平」。原來和平是她們奠定邦基的必要工具；和平如一日得而維持，則他們的國基即一日得而增強。惟維護和平究非全靠三個小國之力，有濟於事，必須聯合志趣相同的強國，共同努力纔行。所以捷、羅、三國均與法有盟約或友誼條約之締結。（法羅曾在一九二六年訂一協約）以期彼此的外交政策趨於一致。在國際壇坫之下，她們的言論所以能互爲呼應者，其因在此，她們形成一維護和約的政治集團者，其因亦在於此。

#### 四 小協約國與波蘭

有些人誤把波蘭當作是小協約國的構成分子之一，實則不然。她只是與小協約國有密切關係的一個國家罷了。她與小協約國間的關係始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四日波羅盟約之簽訂。波蘭之所以沒有加入小協約國，是因為她與匈牙利沒有嚴重的爭執。但是她對東鄰的蘇俄却很戒懼。一九二〇年紅軍的長驅直入，逼近華沙，幾使新興的波蘭化為烏有。幸有法國的援助，纔把俄軍打退。經此慘痛的教訓之後，波蘭方知其東邊國境必有一日為俄國所侵襲。因此，她亟想聯絡友國以防止俄軍之西侵。

波蘭固深懼蘇俄之來侵，而羅馬尼亞的恐懼也不減於波蘭。原來羅馬尼亞在戰後將貝沙拉比省（Bessarabia）從蘇俄手裏搶奪過來，深為莫斯科所不滿。所以邊疆肇禍時有所聞，而外交關係也迄未恢復。因而羅馬尼亞對於東邊的安全亦時常戚戚於心。今波羅兩國既有此同感，則相互保障，為環境驅迫的必然結果。她們遂於三月四日簽一盟約，其內容除第一條指示俄國為假想

歐外，餘均與小協約的基礎條文相類似。

此外，波蘭和捷克也曾簽一同盟條約。波捷均是德意志的鄰國，其領土得之於德國者亦獨多。基此理由，則波捷應聯合防德，似無疑義。乃因受阻於梯遜（Teschau）領地的爭持，和捷克對俄衝突的不欲開問，所以沒有實現。到了一九二一年十月查里斯企圖第二次復辟的事件發生，以及梯遜問題解決之後，波捷的關係纔爲之一變。而兩國的輿論經過一番熟思審慮之後，也深深感到有結盟之必要了。波捷兩國政府有感於此，便於同年十一月六日訂立一防守協約，規定她們當中如有一國被其鄰國攻擊時，則其他一國應嚴守善意的中立，並須讓盟國的軍火自由通過其國境。同時兩國又約定互相保障領土的完整。

小協約國當中既與波蘭緬盟者有二，宜其彼此的外交政策相互影響，趨於一致。加以波蘭的外交方針又同爲維護和約，其在西歐，又是與小協約國有密切關係的法蘭西相友善，自然更使她們的政策大同小異。

## 五 小協約國的演進

從條約訂立之日起，小協約國曾疊經續訂捷巨羅三國的外交總長每年均須舉行會議一次，以交換意見。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國際聯盟容許匈牙利加入為會員國，於是小協約國和匈國的關係突由緊張而轉趨和緩。厥後小協約國除在少數民族的保護方面，間與戰敗國家稍有衝突而外，他們尙能與匈國相安無事。因而她們的盟約關係也就似乎日漸鬆弛。

到了一九二六年德國加入國聯，和次年意匈締結友好仲裁條約之後，小協約國纔感到相當的戒懼，而更加固結起來。原因德國的加入國聯勢必引起少數民族的騷動，以致危及其國土的統一；而意匈的攜手則證明匈國的地位並不若是之孤立。在必要時將能獲得強國的援助。一九二八年一月意匈與俄運軍火的事件，突在聖哥德（St. Gotthard）火車站為軍警所發見，更引起她們對匈牙利的疑竇。所以她們隨即向國際聯盟控告，而匈政府亦向她們提出抗議。因而中歐風雲一時大形緊張。爲了顧全意大利的面子，國聯祇得譴責匈國，敷衍了事。

接着在同年二月，因慕索里尼公然在參議院演說，脫里哀條約應予修改，小協約國更爲之驚駭萬狀，輿論譁然。自歐戰告終以後，政府負責人員敢以修改和約相標榜者，此實爲破題兒第一遭。慕氏唱此高調，一方面固想藉此以威脅其敵國巨哥斯拉夫，而在他方面却想結合匈與諸國，以作其侵略中歐和巴爾幹半島的基礎。這分明與小協約國不讓強國插脚於中歐的宗旨，背道而馳。所以她們對匈牙利的仇視增劇，而對意大利的惡感也油然而生了。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德國希特勒黨總選大獲勝利，於是修改和約的運動，風起雲湧，蔚爲大觀。次年初德奧竟在暗中訂立一關稅聯盟。從歷史的立場去觀察，則德國的政治統系，是曾先以關稅的結合，成爲政治的結合，所以法與小協約國均認爲德奧關稅聯盟就是德奧合併的先聲。德奧而合併，則德國的勢力定必擴展到中歐及巴爾幹。這樣一來，小協約國的處境就將萬分危險了。所以她們跟着法意一同向海牙法庭起訴，控告奧國違犯聖日耳曼條約與一九二二年的議定書。結果，德奧敗訴，乃不得不放棄關稅聯盟。

凡此種種，都是小協約國對外活動之表現。國際風雲愈險惡，修約運動愈激烈，則其結合亦

愈堅固。當小協約成立之日，敵國嘗以其孱弱無能相譏，然而事實所昭示於我人者，小協約國的團結固比任何組織更爲堅強，而其在歐洲所處地位的重要，也隨着她的活動範圍之開展，而更爲人所重視了。

## 六 小協約國組織公約的締結

從前小協約國只有條約的簽訂，而無固定的組織，上文已經講過。現在可是不同了。她們因有感於時局的嚴重，也做效國際聯盟的模範，而組織起來了。這是小協約國外交政策的一極大轉變，同時也是國際風雲日趨暗黯的必然結果。

小協約國組織公約 (Le pacte d'organisation de la Petite-Entente) 的締結，其原因甚多：(一) 喜登堡 (Hirtenberg) 運械事件的發生，使她們了然於匈牙利正在積極準備復仇戰爭；(二) 中日事件證明大國毫無援助弱小國家之意旨，反而盡量壓迫小國。在聯合國中譴責日本的報告書之通過，完全是受小國的脅迫而成。足見小國與大國間的關係已不

若前此之平等，非小國團結起來，不能應付；（三）希特勒的登台，使條約運動更加激烈；（四）德意匈三國邦交的日趨親密，顯然有危害和平的企圖；（五）裁軍會議自開幕以迄今茲，毫無具體結果，不僅未見各國有縮減軍備的誠意，反而日見戰敗國想乘機重整其軍備；（六）中歐與東歐的經濟復興工作，因各國堅持其經濟的國家主義，已告失敗。基此六種理由，小協約國便認為時局的嚴重已到了頂點，戰勝國與戰敗國隨時有短兵相接之可能。如果她們的團結仍是這樣鬆懈，則非僅易受敵國的挑撥離間，且將有被各個擊破之危險。所以本年二月十六日捷、羅三國的外交總長貝尼斯、喜佛里斯（Jevitch）和梯杜勒斯科（Tithleco）在日內瓦簽訂一小協約國組織公約，內含十二條項，原文冗長，不及備述，只得將其要旨摘錄如下：

（一）組織一常務理事會，由三國外長組成之，其決議須由全體票數通過。理事會輪流在三國首都開會三次，在日內瓦開會一次。主席則輪流擔任。

（二）對於一切問題，各盟國間的均等原則須絕對尊重。在必要時，理事會得委託一代表或某國代表團以維護公共利益。

(三) 同盟國的一切政治條約，對於第三國足以變更某盟國的政治處境的片面條約，以及足以引起嚴重政治反響的經濟協定，此後均須有理事會的一致同意，纔能生效。至於同盟國與第三國現有的政治條約，則應逐漸或盡量使之趨於一致。

(四) 組織一經濟理事會和祕書處。祕書處須在日內瓦設一分處。

(五) 常務理事會的共同政策，應以戰後所簽訂的一切國際和平公約的普遍原則為基礎，如國聯公約、非戰公約、仲裁總約、羅加諾協約，以及將來或能成立的軍縮公約。此外，本約對於國聯公約的原則及條款絕不違反。

(六)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捷羅盟約，同年六月七日的羅巨盟約，一九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續訂的捷巨盟約，以及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三國簽訂的調解、仲裁和司法解決條約，均由本約無限期的延長其效力。

觀此內容，可知小協約國的外交今已完全統一。從前三個同盟國中的某國可以獨自與第三國訂約，而毫無拘束，現在，則訂任何條約，無論是政治抑是經濟的，均須有常務理事會的一致。



同意，纔能生效，這顯然把捷、巨、羅三國的外交政策熔為一爐，至現代史中同盟國的結合能如此親密者，實為創見之專。

小協約國的常務理事會類似國聯理事會，但其團結堅固，則遠非後者所能企及。國聯純是一紙老虎，而小協約國理事會則有同盟條約為後盾，具有充分的實力。在必要時，它必能運用此實力，以維護其利益，殆可斷言。

小協約國何為而有今日之組織？對付匈牙利，抑是對付意大利呢？據其前序所述，則組織公約的簽訂純為統一同盟國的外交政策，及確定她們的團結，以維持和平及歐洲的現存版圖。故組織公約絕不針對任何國家（尤其是意大利）而締結。且公約規定任何國家均得隨後加入，尤足表示小協約國聯盟非一閉關自守之組織，何況它必須以國聯公約為依歸呢？然而吾人細想之，則小協約國聯盟之成立，實亦有其深遠之用意：（一）她們想以此為核心，設法邀請波蘭、希臘等國加入，擴而大之，以杜絕德意的侵略；（二）修改和約的運動日見猛烈，小協約國宜有堅固之團結，以備與意向德諸國一戰；（三）小協約國前此各自為戰的外交政策不易在國際

間發生效力，現代表四千萬人口的小協約國既已團結一致，則各大強國勢不能不重視其意見。故聯盟組織的意氣至重且大，未可忽視。

## 七 小協約國與四強公約的鬥爭

聯盟組織公約剛剛簽訂一個月，它的實驗機會就來到了。三月十八日慕索里尼忽提出英法德意四強公約之擬議，裏面有兩點爲：（一）四國確認修改和約的原則。須在國聯結構內行之；（二）法英意三國允許德國改組其軍隊，俾能佔在均等地位。至於奧匈保三國亦將予以同樣待遇。依照第一點，則修改和約可由四國所操縱，小國的意旨如何，她們可以置諸不理。這分明是維也納條約後的歐洲總裁（*Directoire européen*）之復活，與今日民族平等之原則格格不入。修改邊境的主要對象就是小協約國與波蘭。她們果願爲四強之俎上肉，則亦已矣，否則她們必誓死反對四強公約，自不待言。至於德奧匈保四國軍備束縛之解除，其於小協約國之嚴重威脅亦不下於修改和約。德奧匈保而無雄厚之軍備，則其修約之要求自不易實現。反之，德奧

向保而有雄厚之軍備，則她們隨時可用武力作廢約之後盾。是所謂軍備平等者實不啻一修改和約之序幕。小協約國既深知意國提案之危險，豈甘輕易屈受？所以公約內容一經披露，她們即惶恐萬狀，堅決反對。羅馬尼亞外長梯杜勒斯科且啣小協約國常務理事會之命，僕僕於巴黎倫敦道上，勸諫英法兩政府修改或拒絕這擾亂和平的四強公約原稿。而貝尼斯亦在捷京發表激昂之言論，聲稱：四強公約如依照原稿而成立，則小協約國勢必出於退出國聯之一途。態度強硬，不稍退讓。在這場合之下，四強就不得不把公約原稿大加修改了。

四強公約曾於六月七日簽第一字母於羅馬，但其內容已與原稿大相逕庭。一切修改和約與軍備平等的字樣均被刪除，公約亦被納於國聯範圍之內。並且四強公約是曾經小協約國常務理事會在五月三十日發表宣言，認為滿意之後，纔告成立。脫使理事會不宜稱：「小協約國常務理事會，認為新提出條文與本年四月十日法國政府所提之備忘錄，精神相符，即四強公約，僅能涉及該約各簽字國本身之利益。常務理事會以為四強方面，對於小協約各國所提之重要提議，業經予以滿足。」則法國勢必不願簽字，法國而不簽署，則四強公約必告失敗無疑。是則四強，

公約之成敗，視爲操於小協約國之手，亦無不可。小協約國何以能左右歐洲政局，顯然由於本身先能團結一致之故。於此可見保障民族生存之唯一方法，厥在民族自力奮鬥與外交運用得當。小協約國國力有限，處境甚難，且猶不甘爲強國所壓迫，發奮圖強，互相團結，以謀自存。我國號稱大國，而敵軍侵犯，國難重重，幾有朝不保暮之勢。不知國人閱讀此文之後，亦有所警惕否！

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上海。



## 波蘭外交政策

Count Adam Jarnowski 講  
楊 崇 淦 譯

決定外交政策綱領，爲波蘭復興中基本問題之一。戰後的歐洲，依照大戰中對大陸民衆所宣佈的原則，是要領受一個較一九一四以前更完善的結構。國際聯盟之爲一國際的組織，要使它对一切政治問題上具有重大的影響，乃是創設人的初意。經過了多年經驗以後的今日，我可以說，波蘭對於這個日內瓦團體所抱的意見，是積極的，衆爲批評的。我們波人對於國聯所要達到的終極目標，（其中最顯的，就是保證各國和平與友好的共存的一個理想。）充分的同情，還認爲這個團體在構成戰後各國的關係中，應發生極重大的作用。但是我們也見到國聯有一個最壞的缺點，就是實際上它不能強人尊重它的決議。照我們看來，國聯還不足以維持和平。和平必須構成，還要我們能夠維護和平才好。

早自十四世紀以來，波蘭在任何時代都沒有常備軍。它惟一的國防組織，就是一種義勇隊；而其正式入伍服役，又祇能求之於防衛國家，並且還要實際上有這種的需要。波蘭過去之所以

被掃滅於歐洲地圖，就是因為缺乏一強大的常備軍，不足以防衛領土抵抗外侮的直接結果。所以我們不能不牢記，自從我們自願的廢除常備軍以後，波蘭——歐洲第一個退出軍備競爭的國家——竟受了百五十年的外國統治，來領受一個實地的教訓。好幾十萬大軍由鄰邦侵入了我們的國土，在沒有外援時，纔覺得外援的需要。

從此，歷史上的經驗，和政策上的傳習，纔迫使我們爲自身的利益，去和各國求共同及有效保障世界和平的努力，一致合作；同時迫使我們澈底的研究一切裁減軍備的計劃。因此之故，我們認爲裁減軍備與安全問題，有密切的關係；並且以爲前者是從屬於後者的。

波蘭過去曾經一致的努力於非難戰爭。我只用舉一個例子：一九二七年因波蘭的創議，而得到了國聯大會一個著名的決議：凡屬會員國家，均不得承認侵略的戰爭。波蘭這種建議實際上的結果，就是一九二八年在巴黎所締結的非戰公約，其中規定：凡簽定本約的國家，都極鄭重的廢棄戰爭。但是雖有了這種文件，和若干其他的國際公約，而大陸諸國安全的感覺，並不見得因此增高。照我們看來，其原因可歸結於一點，就是大家都覺得，除了反對戰爭的各種聲明與誓

約的重要拘束以外，還要有其他保證和平的工具存在。然後遇着發生了締約國不遵守其神聖的諾言，破壞其誓約，而舉兵侵犯鄰邦等情形的時候，纔能夠有所對付。實際上我們都知道，應付這種局面有效的力量，不能僅爲道德上的，還要能實力的援助被侵犯者，並且對於國際犯罪——自然是戰爭——的侵略者，要能夠予以處罰的威脅。

波蘭認爲，如果祇是爲了在數理科學的現階段，不能具體的規定何者是戰爭工具，何者不是一個理由，而遂用普遍的裁減軍備制度，來求自動的創造和平，實在是事實上做不到的一稱觀念。日內瓦專門委員會，曾明顯的表示過意見說：禁止化學戰爭，在技術上實在沒有可能性。因爲要使禁制有效，勢非毀滅整個的化學工業不可。有了這種情勢擺在我們的面前，而且還有許多其他的政治問題使情勢更趨複雜，然後纔知道，何以日內瓦波蘭的代表，早在軍縮會議的危機爲官方承認以前，就贊成締結一個有限的協定。他認爲最妥莫如離開極度描想的浮沙，踏到目前能夠積極達到目的的實地。

說到實現分期裁軍的原則，便不可忽視去年波蘭政府對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的



「五強協定及所謂『權利均等』的鄭重申述。當時波蘭與許多國家同抱一種堅決的態度，以爲個別國家間的協定，或所成立的互受拘束的諒解，對於軍縮會議這樣集團的決議，是不能具有強制力的，而且更不能拘束未參加此項協定的國家。同樣要表明的，就是遇着危險的時機，不僅對於正式戰爭的爆發，應加考慮，就是對足以引起運用武力的任何行動，也不可忽視。」

關於這點，我可以指出波蘭與蘇聯及其他東歐諸國，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三日在倫敦所締結的公約。這種協定足以證明波蘭對於侵略者，和不僅限於正式戰爭爆發的侵略行爲所下的定義，能夠獲得而且已經獲得本於這種基礎的國際條約。我們認爲軍縮的成功與否，純靠安全，是否有相當保障，以爲斷——不論其保障爲普遍的，或僅係部分的——除非得到了這樣的保障，那我們正如英國對它的海軍一樣，寧願倚賴自己的實力，並且把我們的陸軍當作一筆用於祖國安全與獨立的保險費。

波蘭陸軍二十五萬人的整個預算費，恰恰等於德國十萬人的概算，這自然是很特別的。維持這樣多陸軍的費用，確然要佔國家預算的極大部分。但是以保險費爲喻，我們知道距保險標

的愈近，保險的費用也就愈多；比如與軍械庫或爆炸品及易燃體的材料相鄰近，那所需要的保險費自然是極大的。

還有一件使情勢愈趨複雜的事，就是有許多政治家把修改條約和軍縮安全問題牽連在一起。於此我應當聲明一點，就波蘭說，我們並不是主張國際協定能夠永遠的有效。我們一向就同抱一種見解，認為生活上的急變，就能夠，並且也就常常造成各種國際協定的修改。不過我們主張，——這也就是我們堅定不移的態度——任何條約的修改，祇能本諸參加該約國家的相互同意。而且倘簽約國中有一國認為一切條約的企圖和提議，確有害於國家的完整與獨立生存，而斷然拒絕的時候，那就當然不能有修改有效條約的可能性。

我們認為以法律方式表現出來的通常鄰交關係，隨時而有不同的需要，而條約的修改，就是等於這種需要和政治兩者間關係的進化。一切反乎協定原文的變更和增損，就構成了條約的修改。波蘭根據這種立場曾經締結了若干的補充條約，修改了一九二一年原來的波德通商公約（Polish-German Transit Convention）並且同意於關於那選擇國籍規定的修改。

同時我們相信，如果每一個國際協定，遇着締約國一方以訴之戰爭相要挾，便要加以修改，其結果必至一切協定和條約，都喪失其價值，成爲一束廢紙，而純視締約國一方的意志爲轉移了。無論如何，倘使波蘭的重大利益受有危害時，我們總能知道如何竭其全部實力和財富，來防衛我們的國家和獨立。我所以說到這點，祇是因爲近年來這個事實的重要性，沒有能以適當的評價。

現在我要進而討論另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就是少數民族的保護問題。我們認爲戰後所設立的制度是不公正的。無疑的，大家都知道，波蘭是簽定少數民族保護條約諸國中最先的一個。但要請諸位注意，在波蘭境內的德籍人有八十萬人，其中祇有三十萬人住在從前德國領土以內，而居於德境的波蘭人，却有一百萬以上。除了一部住在德屬上西利西亞的以外，此項波蘭少數民族，是被剝奪了最重要的國際保護。不僅如此，就是上西利西亞波蘭人現有的保護，也將隨凡內瓦公約於一九三七年滿期而終止。

從住在祖國以外幾百萬波蘭人應有適當保護的一點，及從更普通的觀察的一點看來，波蘭

相信，現在具有差別形式的少數民族保護辦法，是不足取的。因此在日內瓦的波蘭代表，最近極力贊成將少數民族條約普遍化的一個提議。這就是說，這種條約應對於一切有他國少數人民住在其境內的國家都能生效，並且有拘束力。這個建議，始終沒有被採納。然波蘭仍然繼續贊助這個要求。如果不能達到目的，那就無異證明現在權利不均的局勢，不能維持下去，而且此項差別所遺下的一切結果，祇見愈趨明顯了。

我既然提到了波德關係中之一端，請再進而略論波蘭對這個重要部分外交政策的根本態度。波蘭西部的疆域，原來是沿易北河（Elbe）線，包括羅琴島（Rügen）科伯格（Kolberg）斯特汀（Stettin）以及但澤（Danzig）在內。在過去一千年的歷史當中，波蘭喪失了二十萬平方啓羅米突的領土於德國。這個面積，大致等於現波蘭之半，等於當日德國五分之一。這樣長久波德關係的歷史過程，無非是兩國共爭波羅的海及其沿岸而已。不過，雖則波蘭西部的領土日見削減，而它的沿海波茅茨（Pomorze）一省，直到被瓜分為止，仍然保持於波蘭一完整的部分。其中僅從一三二八到一四六六的當中，曾一度中斷。而且波茅茨這一省，幾百

年來，就把東普魯士及其他德國領土，截分爲二。

我還要鄭重說明一點，就是在十世紀的波德關係中，波蘭的軍隊，從沒有侵入德國的領域一次。而他方德國操縱波蘭的歷史，是舉世咸知的。舉凡截斷波蘭的入海道，奪取波茅茨，以及瓜分波蘭等等，都事實昭彰，毋待詳致。至於今日的我們呢？可說大戰的結果，從前波蘭聯邦的領土，大部恢復到手了，如此才抵消了瓜分的罪惡。我們一九二〇年戰勝的結果，給與我們一種信念：就是說到做到，我們的獨立是靠着的，我們自己的。關於此點，亞伯龍（Lord Abernon）在他的世界第十八次決戰（The Eighteenth Decisive Battle of the world）一書中，說得很透徹。

同時，我們波蘭人在全國飽受了歷史直接的經驗以後，決定排斥任何重演這種歷史的企圖。而且我們希望更有效的照這樣做去，務使現在的波蘭，在組織與實力上，不再流於十八世紀波蘭聯邦的故套。如果德國明白了這一點，如果德人改變他們一千年來對波蘭的政策，他們也許會覺得，現在的波蘭，祇要使它在和平狀態之下，決不至願意做德國的敵人，或附庸國，而是與

它立於平等地位的國家。這個簡單的公式，是極重要的。它就是我們對德政策的導則，就是說，我們對德的態度，將和德國對我們的態度相當。由此便發生一種信念，波德兩國，既有兩千基羅米突的共同疆界，並且經濟上互濟所無，那麼，爲各自利益計，爲全歐國際社會的利益計，就應當謀兩國常態的共存。

但就另一方面說來。我們認爲過去十四年來德人所提出修改波德疆界的要求，祇是大弗列德力帝（Frederick the Great）吞併鄰邦政策的重演。這種政策，在大戰以後，不過加上一件飾詞的新衣罷了。「走廊」（Corridor）一詞。用於波蘭的波茅茨省，在波蘭是毫無意義的。我們祇知道：我們有一省叫做波茅茨；它的面積，比亞爾薩斯勞關還大；它有一百萬的人口，這就是說，比獨立的愛沙尼亞少不了幾多；全人口中，波蘭人佔了百分之九十，這一省在被德國取得以前，屬於波蘭有了六百五十年；它是我們唯一出海的路，而且我們百分之六十七的海上對外貿易，是由這一省通過；最後，由波羅的經東歐達中歐經由該省的貿易路線，是唯一不受德國管轄的途徑。

以上所說，並不是我們不了解，就德國人看來，像今日這樣的歐洲地圖，他們是不樂睹的，而且幾世紀以前存續過的這種現狀，是和他們尊嚴的思想冰炭不容的。我們很了解這是或許有的事體。但是要記着，就德國人情形說，這不過是不愜意的感觸而已，而就波蘭人情形說來，就要發生極端嚴重足以斷定我們國家生存和經濟福利的問題。

舉一個大家都熟知的相等的例子，或許可以把這種情勢表明得更清楚些。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省之於美國阿拉斯加州，其地位正和波茅茨之於東普魯士一樣。自然，其不同的一點，就是美國從沒有提出這樣無理的要求，說與他的尊嚴有損。但是爲使這個類似的事例更恰當起見，我們要設想，加拿大不是大西洋的岸，而是一個全靠英屬哥倫比亞來和外界接觸的國家，其百分之六十七的貿易，是以溫古華爲通道。假如有一個外國來要求把這一個有一百萬英國居民的英屬哥倫比亞讓與他國，你們將採甚麼態度呢？我可以毫不猶豫的說，自然和波蘭對於德國要求波茅茨的態度，是相同的，就是果斷拒絕的態度。

而且，凡用最新式的交通工具連絡起來的兩塊土地，實際上說來，並不是互相隔離的。波茅

茨一省，有外國的電訊線通過；德國人民經此自由的來往東普魯士，用不着護照簽證，或稅關檢查；好幾千德國貨車和軍需品從此通過，所納的稅正和在德國一樣；可見在交通方面，並不構成一個真正的障礙。在混合運輸法庭存在的十二年當中，僅受理過兩個很小的要求賠償的案件。這個事實，是最足以表示當地的實在情形。

如上所說，波蘭的外交政策，是建立於尊重現存國際條約和尊重自己的權利，使脫離任何統治，波蘭的兩個基礎之上。去年所締結的波蘭但澤協定，就是表明我們這種態度的一個最顯著例子。上一次但澤自由城選舉競爭，希特勒黨得勝。在競選的當中，許多西歐國家對於波蘭處於這種事態下或將採取的外交政策，表示驚恐。實則波蘭的外交政策，是極明白的一回事。我們當時也和現在一樣，認為不論但澤的議會是在何種旗幟之下活動，波蘭仍舊是但澤埠的一個共有人；這爲着經濟上的理由是必要的。所以對於整個維持國際認可其在該處的權利，是直接關注的，一般人也可以這樣的期望它。一九三三年八月五日兩個協定——一個關於波蘭之利用但澤埠，一爲關於在但澤自由城波蘭人民和波蘭少數民族的權利——就是爲我們政策上



此種傾向顯明的證據。我相信，祇須參照我所略舉波蘭外交政策的簡明要件，則去年波蘭總理與但澤議會主席的相互報聘，是用不着解釋的。大家還記得，羅希林氏（Rauschning）在一月以前還重來華沙一次。就這件事說，波但的關係，自然作了我們政治原則的一種實際的測驗；這些原則，是基於過去的傳習，本身利益的尊重，和現實的適當估價而得來的。

至關於波蘭的鄰邦一層，我還記得十一月初間，波蘭總理在國會演說，有下面的一段話：

『無論何處我們祇要見到有改善鄰邦，關係和鞏固相互信念的可能時，我們總是隨時準備開誠的而且積極的通力做去，俾得在所有歐洲國家的共同工作和努力上，加上一個積極的質素。這種種的努力，無非在於杜塞不平的狂瀾，而以穩健的，客觀的，和積極的，重建國際連帶關係的工作為標的。』

後來我們對德的關係，就作了上面一段話的明顯解釋。波總理的言論發表過不久，駐柏林的波蘭公使，就去訪問德總理，開始政治談話。歷次的談話，無不是完全保持着這種精神。

關於另一個波蘭的鄰國，我不能不趁此說到波蘇關係的積極形成。其中進行的步驟，最顯

明的就是去年七月簽定的波蘇不侵犯條約，同年十一月的和解條約，以及今年在倫敦所訂決定侵略者定義的八國公約。十月九日，羅馬尼亞外長蒂杜拉斯哥（Titulescu）訪問華沙時，他就趁此代表政府把這個重要公約的批准文件，遞交駐波的蘇聯公使；這個批准書隨即送到了莫斯科，同月十六日就在蘇外部存案了。駐莫斯科的波蘭公使也代表政府遞送了同樣的文書一件。這種波蘭關係的現象，實在是確求東歐和平與安定的值得注意的表現。

還有波蘭防守同盟的政策，也要一併論及。波蘭對於它的同盟國法蘭西和羅馬尼亞是要特加注意的。我們和法國的關係，已經有了深長的歷史淵源。這種關係，增進了兩國利益的共同性，並且是以保障與維持歐洲和平爲目標。至於說到我們的第二個同盟國羅馬尼亞，祇要請大家注意一個事實：我們和其他國的外交政策上求和平的努力，已經促成羅馬尼亞與蘇俄簽定了一個重要的政治條約，於是在它們相互間的關係上，加上了一個穩定的和平成分。

爲完成波蘭外交政策的描寫，我還要說到波蘭和立陶宛的關係。可是一直到現在，我們和立陶宛不幸還沒有通常的外交關係。但是我相信，並且希望，時間和傳習，能夠助成波立建立一

種經濟上政治上共同利益的關係，使兩個自主國家，能夠在相互置信和相互尊重的條件之下，通力協作。最後還有一個地方——可說是歐洲最重要的地方——該地之應有波蘭的活動和勢力，雖則美國還沒有普遍的認識，卻是很重要的。我所指的就是當前多腦河的問題。我祇用說關於我們在這個中歐通商要道的交叉線上經濟和政治的地位，我們的參與，不僅是增加了歐洲該部有效政治活動的希望，而且照我看來，似乎是純粹必要的。

在這種論題之下，自然不能夠極詳盡的描寫波蘭的外交政策。然我確信，我們傳統的和目前政策的輪廓，已經是說得很明白了。由此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不可否認的結論：

第一，波蘭外交政策的特點，對於任何鄰國毫無侵略的意向。

第二，我們曾經貢獻過極大的努力於鞏固和平之上，而這種種的努力，是出於一種自身利益的深刻覺悟和相當的尊重。

第三，我們的格言是用任何代價求和平，但決不肯犧牲國家的基本權利和重大利益，過去如此，現在還是如此。

★

★

★

★

上項演說詞發表了以後，對於後來的波德關係，有莫大的助力。最好的一個例證，就是今年一月二十六日在柏林簽定關於波德關係的宣言。簽字墨跡還未乾，波蘭半機關報 *Czaszka* 在二月二十七日對於這個宣言有一段言論說：「這個宣言，拘束波蘭至少在十年以內，對相互的和平關係，不得有任何的侵犯。這不但是道德上的拘束，而且是法律上的拘束。它還立定了一個原則，就是將來兩國間所發生的任何問題，祇能用雙方互能接受的方法來解決。並進一步含有一個很合理的正式聲明說，波蘭所加入的幾個國際協定和同盟，其性質是不變的，而且是具有強制力的。」（載英國 *Contemporary Review* 一九三四年三月號）



# 物版出新局書中正

變態心理學	蕭孝燦	精裝二元四角 平裝一元八角
中國土地新方案	殷鷺夏	一元
最近政治思想史	薛品源	八角
唯生論	陳立夫	甲種實價八角 乙種實價四角
國學入門	蔣梅荃	九角
教育研究法	朱智賢	一元五角
英國與其殖民地	姚定塵	一元
掀天動地的蘇俄革命	陳榮橋	八角
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蔣孟武	六角
與國英雄加富爾	王開基	九角
中國小說的起源及其演變	胡懷琛	四角
兒童音樂故事	胡懷琛	二角
西康	宋壽昌	一元六角
風箏	梅心如	四角
	陳澤鳳	四角

期待	王平陵	四角五分
毋寧死	方于	六角
恨世者	趙少侯	三角
波蘭的故事	鍾應民	六角五分
偏見集	梁實秋	六角
山地行軍	鄧陸夫	六角
汽油發動機構造綱要	何乃民	六角
德式機關槍對空瞄準具使用法	鄧陸夫	六角
積極防空	鄧鐵民	六角
戰鬪綱要表解	彭萊父	六角
世界軍備	史無号	六角

以上軍事書六種九月出版  
 新生活叢書已出二十種  
 每種實價一角五分

578  
772222  
(4)



版權所有

(51)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

近代各國外交政策

一册實價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雜費)

著者	周鯨生等
編者	外交評論社
發行人	吳乘常
發行所	正中書局
總店	南京太平路
分店	南京鼓樓
印刷者	正中書局



578

772222

(4)